



1939—1945
(抗战胜利前在延安)

于光远 / 著

大象出版社

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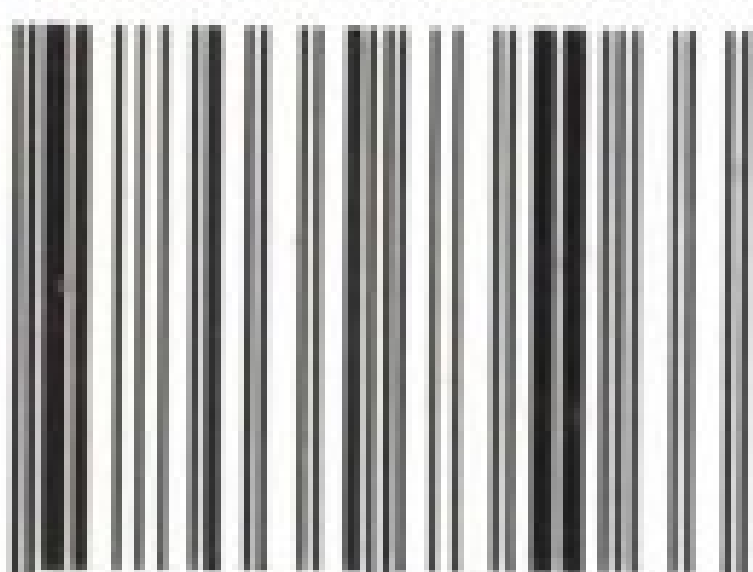
的 编 年 故 事





责任编辑 / 孟建华
封面设计 / 秘金通

ISBN 7-5347-3506-8



9 787534 735066 >

ISBN 7-5347-3506-8/K · 118

定价: 9.60 元

我的编年故事

1939—1945（抗战胜利前在延安）

于光远 / 著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编年故事·1939—1945(抗战胜利前在延安)/于光远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6
ISBN 7-5347-3506-8

I. 我... II. 于... III. 于光远—回忆录
IV. K82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82278号

责任编辑 孟建华

责任校对 李建平 石更新

封面设计 秘金通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经七路25号 邮政编码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制 版 郑州艾乐出版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5年6月第1版 2005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375

字 数 120千字

印 数 1—1500册

定 价 9.60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商城路231号

邮政编码 450000

电话 (0371)66202901



青年时期的于光远

(英年早逝)



1947年冬，山东渤海土改工作团
(第二排右三于光远，第三排正中毛岸英)



1967 年于光远在湖南安化农村调查

作者的话

——关于《我的编年故事》和它的第三册

《我的编年故事》第一册出版于1996年10月；第二册出版于1998年4月。在第二册的出版说明中写道，此书分四册出版：1915～1935（20岁前）；1935～1939（抗战前后在国民党统治区）；1939～1945（抗战八年）；1945～1949（迎接全国解放）。第二册出版后我就动手准备第三册书稿，而且基本完成。可是一直没有发稿，耽误了好几年。最近把书稿找出来，准备发稿。看后觉得除原有各篇的文字需要斟酌外，还要再作一些补充。1998年说明中对这一册所写“抗战八年”四字，我认为改为“抗战胜利前在延安”较好。因为抗战爆发后的一些内容已经在《我的编年故事》第二册里写过了。

欠账总得还。2001年出版社还催问

过一次。我也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2002年夏,我有机会到许多年没有去过的郑州。见到李亚娜同志时,我就答应2003年上半年交出《我的编年故事》第三册。回北京之后,我就开始动手。当时我很有信心按时完成,因为按照我的工作规律,只要机器开动,产品制作出来的时间不会很久,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就可以把改定的书稿交到出版社。事实上我也改出了差不多一半的稿子。可是事与愿违。这个工作又因为种种原因中断了,其中就有2003年1月在体检中发现粪便中有潜血,经过肠镜、肠造影等进一步检查,很可能是结肠癌。于是住院动手术。手术中判断还没有癌变。但是八十八岁的人手术后身体总比较弱,而这时“非典”在北京又很猖獗。直到今天我才重新坐到电脑桌旁,重理旧业。

重理旧业就要从头看起。一看就要补充修改。改一遍当然会好一点,但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接上以前写到的地方。我希望这次能够一气呵成,不再

中断。

《我的编年故事》第三册写的范围是“抗战胜利前在延安”，也就是写了从1939年7月到延安之后，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这六年多一点。

“抗战胜利前在延安”同“我在延安”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因为抗战胜利之后我在延安还停留了短时期，而1946年8月我又回到延安。这时候又到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历史时期，不再写进第三册，该是第四册要写的内容了。

关于这第三册的编写方法，我没有新的想法，还是打算完全按年份来编。每篇都按年份编号，比如1939年的第一篇，就记作“39·01”。一、二、三各册《我的编年故事》写法、编法都不相同。我觉得这一册采取这种编法比较合适。第四册恐怕又会采取另外的写法和编法。

目 录

(一)1939 年	(1)
小引	(2)
39·01 从广东省委机关到延安的途中	(2)
39·02 我一下子喜欢上了延安	(13)
39·03 生活在陕北黄土高原的第一夜	(16)
39·04 “你不去马列学院了”	(19)
39·05 中央组织部训练班	(21)
39·06 第一次听毛泽东演讲	(24)
 (二)1940 年	 (28)
小引	(29)
40·01 陕甘宁边区文协代表大会使我得到 了满意的工作岗位	 (29)
40·02 第一次跳秧歌	(34)
40·03 我兼任延安中山图书馆主任	(37)
40·04 我还兼任“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编审 股长	 (42)
40·05 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的	

	前前后后	(44)
40 · 06	在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里	(52)
40 · 07	毛泽东笑得很开心	(55)
40 · 08	有幸同毛泽东坐在一张餐桌上	(56)
40 · 09	在这里我想插进几句讲讲何思敬	(59)
40 · 10	陈云小组和洛甫小组	(61)
40 · 11	“《自然辩证法》读书小组”	(64)
40 · 12	学做一点翻译工作	(66)
40 · 13	我在延安的读书生活	(67)
(三)	1941 年	(72)
	小引	(73)
41 · 01	1941 年的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工作	(74)
41 · 02	不习惯这个“官”字	(80)
41 · 03	1941 年的《轻骑队》	(81)
41 · 04	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87)
41 · 05	“土包子”和“洋包子”	(91)
41 · 06	西北局第四局	(93)
41 · 07	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一个争论	(97)
41 · 08	宝塔山后沟那个晚间的一件事	(98)
41 · 09	下乡琐事	(100)
41 · 10	在去柳树沟过延河的桥上	(101)

41 · 11	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日子里	(103)
(四)	1942 年	(109)
	小引	(110)
42 · 01	1942 年的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工作	(111)
42 · 02	考察团在去绥德的路上	(123)
42 · 03	到了绥德之后	(125)
42 · 04	去双湖峪途中顺访三皇峁	(127)
42 · 05	于光远夜走凤仪亭,刘澜波谈话五 分钟	(129)
42 · 06	烟筒沟煤窑	(130)
42 · 07	吃糠的学问	(132)
42 · 08	在印斗看地主账本	(134)
42 · 09	我出的第一本书,就是同柴、彭合写 的这一本	(135)
42 · 10	一场空欢喜:《反对党八股》中表扬 《轻骑队》的话删去了	(138)
42 · 11	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始	(142)
42 · 12	用自己“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党”	(143)
42 · 13	“思想自传”	(146)
42 · 14	整风学习期间我的工作	(149)

42 · 15	西北局高干会	(150)
(五)	1943 年	(154)
43 · 01	走向审干	(155)
43 · 02	抢救失足者	(157)
43 · 03	韦君宜的《思痛录》	(159)
43 · 04	西北局宣传部	(161)
43 · 05	《吴满有》和《寻门户》	(163)
43 · 06	有关“抢救”的一个故事	(165)
(六)	1944 年	(168)
44 · 01	“特别班”	(169)
44 · 02	龙儿寺开荒	(173)
44 · 03	从“特别班”到延安大学	(178)
44 · 04	延安大学财经系	(179)
(七)	1945 年前九个月	(182)
45 · 01	一个很特别的消费合作社	(183)
45 · 02	五棍同乐	(185)
45 · 03	第一次享受老人权	(186)
45 · 04	给全校上大课讲自然发展史	(187)
45 · 05	“于光远吆！在延安时就是我的老对头”	(189)

(一) 1939 年

小 引

对 1939 年部分交代几句。

本册中所记的第一年是 1939 年。这一年我只
有五个多月在延安。5 月以前我还在广东。而且初
到延安,特别需要记的事情也不多。即便为了同第
二册衔接,多写了一节 1939 年 5 月从广东韶关到延
安路上的情况,也只写了六节。

39·01 从广东省委机关到延安的途中

1939 年 2 月我从翁源到了韶关,那时广东省委
机关设在韶关。我去韶关是奉省委之命,到了之后
我参加广东省青委的工作。在韶关工作了不到三个
月,5 月省委接到延安中央青委和中央组织部的电

报,要我去延安。我从来没有去过延安,而我们这样的共产党员把延安看作是自己的家,去延安,就有回家的心情。尽管我对在广东省开展工作有很高的热情,想在广东省把自己的根扎下去,愿意看到正在蓬勃发展的广东省的革命力量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这时候广州已经沦陷,我们党要做的工作,就是开展广东的游击战争,发展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建立根据地,从游击战再发展到运动战,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这一套我记得很熟。我愿意在广东省的武装斗争中锻炼自己,显显身手。但是延安在召唤我,我还是高高兴兴地准备出发了。

这次去延安是我一个人走的。走的路线也很简单,从韶关坐火车到衡阳,转湘桂铁路到桂林,去找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党的关系,以后的路程就用不着我自己操心,听从安排就是了。从韶关到桂林不过两天的时间,也是很简单的行程。于是就在5月初的一天,与广东省委和在韶关的青抗先总队部的同志告别后,我上路了。

在衡阳我没有去找什么人,稍事休息就西去桂林,到桂林后顺利地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桂林是我去延安的第一站。

桂林当时的气氛与广东很不相同。战火一时还没有烧到这里,政治环境也还算可以,所以文化界、新闻界的人就集中在这里。有从武汉来的、有从广州来的、有从长沙来的,还有从上海、香港来的……气氛比较热闹,比较活跃。我的熟人也不少。黎澍那时就在“国新社”,我和他在长沙《观察日报》一别,在这里重逢,很是高兴。除“国新社”外,《救亡日报》在桂

林发行,这张由郭沫若创刊的报纸,影响很大。除了这两家新闻单位外,还有一个“青年记者协会”,范长江在那里负责。我和范长江初次见面就是这一次在桂林。1938年在广州当时的军事形势下,几乎谈不到任何文化工作。后来我又到了粤北乡下有半年之久,别说大的城市,连县城也没有到过。我几乎完全是一个乡下人了。

现在到了桂林,别有一番感受。听听朋友的高谈阔论和来自四方的消息,日子过得很快。

在桂林我住在湖滨的一所房子里,是朋友们为我安排的,这所房子似乎就是青年记者协会的。

到桂林后,我的中心任务就是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北上的问题,在八路军办事处,我见到了叶剑英将军。我曾经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见过他。他告诉我,他不久就要去重庆,可以把我先带去重庆,要我在桂林等着,由于出发时间不一定,嘱我不要离开桂林,免得找不到我。

于是我就老实地呆在桂林不动。“桂林山水甲天下”,5月是特别好的季节,但这一次我一个风景点都没有去。“阳朔山水甲桂林”,我知道乔冠华这时在阳朔。乔是民先队柏林队部的,1938年回国后,我们在武汉和广州都有过接触。本来可以看看他,顺便看看“甲桂林”的阳朔风光,可那时我一点闲情逸致也没有,就在住所等八路军办事处的通知。

在桂林有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这件小事后来产生了一个结果,以至这些年来我一直想到它,而且多次提到它。这件事是这样的:在桂林有一个朋友送了我一个日记本,是三十

六开本的,二百多页,是白报纸的本子。每隔二十来页就夹两页画。这种日记本本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当时觉得很贵重。当时没有用,一直带到延安。后来它被我派了一个比较值得回忆的用场,这个以后我再写。

我在桂林呆了好几天,有一天办事处终于告诉我可以向重庆出发了。办事处为叶剑英同志弄了一辆载重卡车,从桂林去重庆的几个人,都是搭这辆车走的。在出发的那一天我们见到了叶剑英同志。他坐在驾驶室里,我们一群人就坐在卡车的上面。我们都穿着灰色的八路军战士的服装,从来没有当过兵的我,这次是第一次穿军装。

顺便讲讲那次去重庆途中过宜山的情况。从桂林出发,当天就到了柳州。在柳州我们停留了一天,然后前进到宜山。到宜山后我们又停留了一整天。那时候行车的速度是很慢的。

我知道流落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我的父亲当时在宜山。我初中时的一个同学不知怎的遇到了他,把他拉到宜山。我这个同学这时候在国民党军队当汽车队队长,驻扎在宜山以东若干里的一个村庄里。我在宜山有一整天空闲的时间,本来是可以找一下我父亲的。我和父亲分开多年,从感情上说我想见见他。可是我不愿意见我那个在国民党当军官的初中同学,因此只好不见我父亲。在即将离开宜山的时候,才写了封信给我父亲,说因为时间关系不能见他了。没有想到汽车开到宜山西边的柳江江畔,有成百辆的汽车在那里排队等着渡轮把它们渡到对岸去。我们的那辆汽车在江边足足排了两天

队,还轮不到让我们这辆卡车过江。而我的那个同学是汽车队队长,非常熟悉江边车子排队的情况,于是坐着汽车一辆一辆地查看,终于找到了我,并把我接到他的驻地见了我父亲。我在汽车连驻地住了一晚,第二天他把我送回江边,又等了一两天才轮到我们过江。

过了宜山的那一条江,走不远就进入贵州省。

贵州穷山恶水、生活贫困我早有所闻。走在贵州境内,对一路的情景进行观察,果真如此。路边的山又大又陡,由于雨水充足,山上有树,可就是没有田地。田地都在坝子——山间的小平原上,贵州这种小平原既小又少。汽车在公路上走,就没有经过这种小平原。那时修筑的公路为了省钱,坡度很大,坐在车上的确有些胆战心惊。有一段公路司机们把它叫做“掉死岩”,这是谐音,本来还有一个好听一点儿的正式名字,可是被弃之不用。走这段公路,只要司机一不小心,车子就有翻下大山去的危险。我坐在车上,亲眼看到不止一辆掉到山下去的汽车的残骸。路上行人不多,但常常可以看到背着一大块盐块的独行人。一块一般一百公斤左右,背盐人艰难地在坡度很大的公路上行走。这块盐一直不从身上卸下,随身带着一个大架子,实在太累了,就用木架把盐块支起,在路边靠一靠,歇歇背和腿。在路上有时还可以看到卖茶水和卖银耳汤的。茶水当然很便宜,赚不了多少钱。那银耳,的确是当地的特产,煮得很好。在大城市银耳是公认的补品,可以卖个好价钱,可是在贵州公路旁边它的价钱一点也不贵。干这些营生的人,不管老老少少,个个穿得破烂不堪。“天无三日

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那是概括贵州当时状况的名言——其实我早已听说过,同我这次亲眼所见完全吻合。

汽车进入贵州,经过独山到了都匀。到都匀后,司机告诉我们,第三天清早离开都匀前往贵阳。这样一个行进安排,对我正合适,因为我正好有一个清华同学、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下简称“民先”)队友傅明弟在都匀,我想见见他,了解一下当时的状况。他是个新闻工作者,抗战后在他家乡都匀搞发展民先的工作,同我一直有通信联系。各地民先的地址我都带在身边,按照我身边本子上记下的地址一下子就把他找到了。他告诉我,贵州的政治局势很不好,只能同特别信得过的人一起工作,同一般青年只是交朋友,不敢打出民先的旗号,但他一直在坚持工作。

就是在都匀,他告诉了我贵阳民先队被破坏的比较详细的情况。这件事我在广东省委已经听说了一些,但没有傅明弟告诉我的详细。贵阳当地人、抗战前在中国大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党员、民先队员张益珊,在1938年2月曾到武汉办事处找到我,告诉我抗战后他回贵阳已经团结了不少革命青年,在贵阳建立民先地方队部的条件已经具备,问我是否同意他把民先地方队部成立起来。我同意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工作。回贵阳后 he 就把贵阳地方队部组织起来了。1995年8月4日《贵阳晚报》登载的一篇文章中讲道:“1938年4月,共产党员张益珊受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派遣,来到贵阳,在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建立了贵阳民先地方队部。”(我可以证明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他们向贵阳国民党反动当

局要求准许民先队合法,反动当局骗他们把名册交上去,并把人员集合起来批准合法,结果就利用这个机会把张益珊和加入民先队的队员全部逮捕,张益珊被杀害。张益珊并不是个很幼稚的人,但还是受了骗。贵阳的国民党因为处在比较偏僻的地方,更是肆无忌惮地镇压革命,这些反动派不怕社会舆论,野蛮得很。这种情况当时傅明弟基本上都告诉我了。听后我的心情很沉重,而且我反思自己没有更多地警告张益珊要谨慎从事,我觉得我负有某种责任。

从都匀到贵阳只有一天的路程。车子在贵阳停留了两天。由于张益珊组织起来的贵阳地方队部已经被破坏,我也就没有法子同原先贵阳队部的人接触。那时从南京、武汉撤退到贵阳的机关不少。我们的不少同志也暂时在这里栖身,其中包括1938年在我主持的民先总队部办事处工作的毛雍如、清华同学民先队员章宏道(也就是后来长期在外交部工作、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文晋)。那时章宏道和毛雍如在贵阳城南的图云关。毛雍如在国际红十字会工作,章宏道在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工作。我去图云关把他们都找到了,知道他们正在考虑自己的去向,多时不见,畅谈了一番。

过了贵阳就到了遵义。那时由反动派统治,遵义会议的旧址,我没有去打听,也没有敢去那里看一看。那时我对党的这段历史并不清楚,只是听到过红军在遵义开过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会上纠正了红军长征中的某些错误,会后毛主席率领红军完成了长征。我想听叶剑英同志讲讲遵义会议的情况,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晚上他住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是分散住

的。那天晚上我被分配到一个有钱的人家,在一个非常特别也是非常好的帐子里舒舒服服地不受蚊子、臭虫、跳蚤扰乱地睡了一个好觉。而一路上我常常在汽车上面露天过夜,被蚊子咬怕了,对这顶帐子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顶帐子好就好在它不但有顶而且有底,睡觉的时候钻在里面,任何虫子都咬不到自己。1995年8月我写了一篇《贵州的两顶先进的帐子》,把这一顶帐子也写在那篇文章里面。

汽车要经过娄山关。娄山关红军的战争故事大家都听说过,早上车子从遵义出发时就有人提出过娄山关时汽车停下来看看。同车的叶剑英同志亲自指挥过娄山关战斗,大家更希望他做点介绍,叶剑英同志同意了。

到娄山关,汽车在一个立有“娄山关”三个字的路碑处停下来,大家都下了车,在碑前站好。贵州山高,起落也大。娄山关地形的确相当险要。那时的公路质量也差,更增加了险要的感觉。叶剑英同志用手指着近处和远处的山头山谷,绘声绘色地讲了当年娄山关这一仗是怎么打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叶剑英同志讲话。以后我见到叶剑英的机会不少,建国以后更是在各式各样的场合见到过他,可是听他讲故事只有这一次。

车子到了重庆,同来的人都分散了。我被南方局办事处人员安置在化龙桥的一个地方,那房子是南方局或八路军办事处接待过路人员的。

我们住的是平房,靠着马路。房子很简陋,有些像临时工棚。这种建筑物当然不会长期保留。建国后,一次去重庆,我

去化龙桥走了一趟,这个地方成了闹市,路边的房屋全是几层的楼房,同当初留下的印象完全对不上号。

重庆是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蒋介石加强统治,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林立,同时我们党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也在这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办的报纸《新华日报》也在这里发行。这个城市是当时中国的一个政治中心,两党的斗争很尖锐,也很复杂。我的熟人不少,清华同学蒋南翔、杨述、许立群,上海大同大学的同学孙少礼、孙幼礼等都在这里。他们有的是做公开工作的,有的是做地下秘密工作的。我在重庆呆的时间不短,要等有合适的、安全的去延安的机会才能离开重庆。

我也不着急去延安,有机会在重庆看看也很难得。我在重庆的活动就是访友。市内各处有朋友的地方都去。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去了不少次。我还去过北碚和柏溪,那是离重庆有相当一段距离的郊区。我都是两条腿走着去的。红岩有时我也去,问问去延安的消息。在这个山城,我会友聊天倒不觉得寂寞,不过我并没有参加那儿的活动,我是个过路人,我知道像我这样的共产党八路军乱跑,出头露面,对在重庆当地工作的同志和我自己的安全都不利。

到重庆听到南方局的同志向我介绍当地的情况后,就告诫自己要特别小心谨慎,特别像杨述、许立群担任当地党的工作,不便同他们有较多的接触,于是定下了一条结识当地一些青年学生的方针。心理学家陈元晖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那时他叫薛尔,在中央大学学习,后来我们成了朋友。

重庆是长江三大“火炉”之一。我到重庆的时间是6月，还不到最热的季节，大概也是因为自己年轻，重庆没有给我留下酷热难耐的回忆。1938年夏天我在武汉，也没有留下酷热的回忆。

我终于从重庆出发了，也是乘坐一辆我们八路军的载重汽车。我还是穿上了灰色的八路军战士的服装。第一站是成都。

从衡阳起，沿途路经的城市我以前都没有去过，成都也是第一次到。

在民先的许多地方队部里，成都队部是比较强的一个。这个队部之所以强，一个重要原因是北大党员韩天石在1936年暑假后到了四川。他也是“一二·九”后南下扩大宣传过程中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发起者，那时民先队还不是全国性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最初成立时没有“中华”两个字。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1937年2月初开过民先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才成立的。从那时开始，民先总队长便是李昌。韩天石的组织能力很强，成都的民先队的基础主要在四川大学，胡绩伟、熊复等都是成都队部的队员。我在民先总队部工作时，同成都队部、同韩天石通信也比较多。1937年我在保定那两天，韩天石作为全国学生代表之一到那里向前线军队慰劳，我曾帮助他 with 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所以在我到成都后，便同韩天石和一些民先队员会面。我在成都生活了几天，由于在成都我有一些可以深谈的朋友，所以我对四川和成都的政局以及当时我们党和青年工作的状况有比较深一点的认识。同时

天府之国成都的一些景象,成都的小吃——开花豆、豆浆稀饭等,还有成都的茶馆,我都体验了一番。祠堂街车耀先办的“努力餐”我也光顾了一下。

在成都呆的时间不长,过了几天就坐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安排的军车向西安出发。

离开成都并不等于离开四川,还要过绵阳、梓潼、剑阁、广元才能到陕西。汽车经过剑门关,开上一段栈桥,使我弄明白“明修栈桥,暗度陈仓”这句话里的“栈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栈桥者也,原来是在直立的石壁上凿洞,把木柱子打进去作为斜的桥桩,上面盖上木板,变成人马可以走的桥。桥下就是万丈深渊,跌下去就粉身碎骨。这次我们去西安,大家不愿坐在汽车上过栈桥,司机也要求减轻车的重量。当汽车在木桥上走时咯吱咯吱地响,真使人惊心动魄。不知道现在汽车还走栈桥不?

剑门关也在四川境内,而且还在广元的南面。到了宁强才进陕西,再向前几十公里,快到勉县,走过这路的同志说到了“定军山”。进陕西后第一晚宿褒城。第二天过昌坝后过庙台子,司机把汽车停下来,让我们观光了留侯祠(留侯就是帮助刘邦取天下的张良)。

过成都后,我就没有朋友可找了。一路上我找人了解情况,目的是想到了延安后,把了解的情况说给中央青委的熟人知道。陕西的情况,自从1937年9月我离开太原后,本来就不怎么了解(因为按照分工,北方的情况由总队部李昌直接抓),这次也就不再去打问了。因此去延安的这一段路程,我

就像一个旅游者那样，一路欣赏大自然风光和注意名胜古迹。我国西部地区的自然风光，那些崇山峻岭、那些险要的地势，长期生活在沿海一带的人看了不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

到西安已经是1939年的6月底或者7月初了。我们住在八路军办事处，一方面让我们休息一下，一方面考虑究竟什么时候出发去延安最好。办事处的同志不让我们到外面乱跑，以免引起特务的注意，但不是限制我们绝对不能出去，所以我还是出去了一下。我是第一次到西安，就看了看市容，这个许多朝代的都城，果然气势非凡。

没有呆多久，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就告诉我们可以走了，说最近的形势也还可以，前一辆军车已经顺利到了延安，而且返回了西安，我们可以坐这辆车去延安。于是又休息了两天，我们才继续北上。

39·02 我一下子喜欢上了延安

许多人误以为青年人到延安去，就是参加革命的开始，或者说到延安去就是参加革命。对于许多青年人来说，这样说是符合事实的。但是也有不少青年人并不是那样。我知道就有不少人——而且不限于年轻人——在抗战以前的土地革命时期，甚至更早在北伐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以后在白色恐怖下与党失去联系。现在党中央到了延安，只要到了延安，就可以找到党。

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自己直接接触的例子。1938年初

我在武汉担任民先全国总队部武汉办事处主任时，延安陕北公学民先队部，就把1926年在湖北黄冈参加过革命的毛雍如同志介绍到我这里。他去延安就是为了同党取得联系。他到延安后没有直接找到党组织，而是到了党中央办的陕北公学，参加了民先，然后被介绍到我这里。他在我这里工作了不长的时间，还入了党。毛雍如年长我几岁。但在1938年他还很年轻，是个青年人。

我在武汉长江局青委工作的时候，也参与了叶南（国民党元老叶楚伦的儿子，在苏联同蒋经国一同留过学）的“中国救亡协会”的工作。叶南的舅子赵梅生，因为在察北义勇军问题上同张慕陶有牵连，失去了党组织关系，也去延安找关系，没有解决。

去延安的情况多种多样，即便青年人也是如此。

我的情况则是在抗战前参加革命，后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了几年之后才去延安的。我参加革命的时间不长。不过在去延安前的好几年，就参加革命的学生运动并在抗战爆发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1939年到延安，是中央青委和中央组织部把我从广东省委机关调去的。

抗战后我在太原和武汉工作的时候，一方面动员了不少青年去延安，一方面根据需要常常劝青年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我也从不少延安出来到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青年嘴里，听到关于延安的情况。我并没有许多青年所有的对延安的那种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当我们乘坐的几辆卡车开进延安，看到从照片上早就熟悉的宝塔山的时候，我还是很兴奋，

想看一看延安的心情陡然高涨起来了。

明、清两朝,凡是设县的地方,在县城附近总要建个宝塔。延安还有一个名字叫肤施(红军就是从国民党的肤施县长那里把人民解放出来的),是陕西北部的一个县,在县城东南山上就有这样的一座宝塔,这一个山头就是有名的延安宝塔山。

延安的名称来自延水。延水主流从安塞北来,水源还在安塞以北,在宝塔山与一股小支流汇合东去入黄河。走近了宝塔山,到了延水主流向东转弯的拐角处,我就看见了左首的延安城。

我事先已经知道在日机的大轰炸过后,城内已经不再是当地的中心了,机关也都搬到离城比较远的地方。我要去的地方是中央青委机关,它在大砭沟口(大砭沟被当地人不雅地叫做“大便沟”,我到达延安时,它又有一个颇为时髦和文雅的名称“文化沟”),同别的许多机关相比,可以说是离城最近的地方之一——在北门外二三公里的地方。司机知道我的目的地,到大砭沟口就停车,让我先下车。这条沟相当长,大概有三四公里以上。沟口朝东,在延水西侧。在沟口的西北角,有一排窑洞和盖起来的房子,有的朝南,有的朝东,对着沟口就是延水。这就是中央青委机关的所在地。

车到延安是午后,但不晚。安顿后与青委的人见了面,吃罢晚饭天还很亮,正是下山到延水边散步的时候。记不起青委的哪位同志陪我下到延水的河边。这时候,河边已有不少人在散步,三三两两,男男女女,大都很年轻,一边散步一边唱歌。我感觉是到了一个大学的校园,而且比校园里的气氛更

融洽。

那一天在延河边人们唱的歌很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沙漠像黄的海洋……蒙古包似起伏的小岛,骆驼在那里荡漾……”那支歌我一直没有学会。歌并不特别好听,意思也不深,不知道为什么我却记得那么深。

散步回来,回到窑洞入睡以前我一直回味着延河边的感受。

我一下子变得非常喜欢延安。

这是我到革命圣地延安第一个白天的感受。

39·03 生活在陕北黄土高原的第一夜

下面我讲一段煞风景的故事。本来我不该在写了我在延河边得到那样美妙的感受——在这里我使用“美妙”两字一点也不过分——之后,再讲这么一段。但是既然现在我讲自己第一天到延安的真实印象,似乎就不能不写也是在这一天体会到的、使我感到不那么愉快的经历了。

看过《我的编年故事》第二册的读者,也许记得我将要离开粤北翁源那两个晚上的故事。我讲那一段故事时用的题目是《两个晚上:天上地下》。从这个题目就可以知道,那两个晚上(一个是1939年2月18日阴历年三十晚上,一个是同年19日阴历大年初一晚上)的反差有多么之大。现在我讲的这段故事也是1939年的事情,相隔不到半年。不是两个晚上,而是同一天的白天和晚上,可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这是怎样的一回事呢？

说起来真可笑。请允许我从从容容地来讲这个可笑的故事。

我是城里人，而且是一直在北京、上海、广州那样的大城市里生活的人，我虽然知道应该高度重视农村和农民，但是因为在农村生活的时间不长，对农村里的许多事情还是不很了解，尤其是北方的农村。我虽然知道有一种名叫跳蚤的会咬人的小虫，也曾经偶然被跳蚤咬过，可是印象很浅。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我曾到粤北翁源农村住了几个月。翁源与珠江三角洲相比经济上落后，但是和陕北相比就强多了。同时两地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很不一样，在翁源就没有被跳蚤咬过。我没有在西北黄土高原住过，从西安到延安这几天，我们又一直在大卡车上面露天休息，在没有进入陕甘宁边区以前，不敢也没有下车到友区（也就是国民党统治区）老百姓家里过夜。进入边区路过洛川、富县、甘泉，因为大家一心想早一点到延安，也没有下车住群众家里，仍旧没有接触到跳蚤。在我到达延安的那天晚上也是我生活在陕北黄土高原的第一晚，大概这个地方有适合跳蚤生长的条件，这一晚我就完全意外地跟跳蚤干上了。

事隔六十多年，那一晚的情况我记得清清楚楚：在延河边散步后非常愉快地回到青委机关时，见到了老朋友李昌，那时他是中央青委组织部长。我有许多话要对他说，可是我日夜兼程，在汽车上颠簸了许多里路，十分疲劳，很想睡一个好觉，于是我就约他第二天聊天，自己早早回到青委的同志们为我

准备好了的房子上床睡觉。没有想到这一晚上我被跳蚤咬得不知怎么办,根本无法睡觉。

被跳蚤咬,说起来无非痒就是了,痒就想挠,那天不知道有多少跳蚤向我进攻,到处咬,我就必须到处挠,可是我只有两只手,实在分不出手来到处搔挠,毫无办法。我越是想睡,就越是睡不着,越睡不着心里越烦,越烦也就越睡不着,实在难以忍受。那晚我睡的还是木板床,我想如果睡土炕不知道会怎么样!那一晚我和跳蚤展开一场大战,整整折腾了一夜,尽管身体很疲劳,想躺着休息,可是实在战胜不了跳蚤,最后只得站起来,退出战场。干脆走到房间前面的场上,来来回回地走。这时候跳蚤倒不再咬我。可是我实在困得不行,看到那里放着几根原木,我就从房里抱出棉被裹着躺在原木上去,而我竟然在那里睡着了。

不过当我在那几根原木上睡着的时候,天色已经开始有一点亮了。到延安的第一天晚上我本来睡得很早,可我睡着的时间却很短,整个长夜我都用来同跳蚤战斗了。

原来我躺下去的地方,就在青委的一位负责同志的窑洞门口——我说的是冯文彬同志,他是中央青委副书记(书记是陈云同志)。他大清早走出窑洞见我这样的狼狈相,在听了我讲这夜的苦恼之后,既没有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也没有给我出一个防跳蚤的主意,反而哈哈大笑。这时我还没有烦过去,他的这种表现使我很不高兴,对他产生一个不好的印象。心里给他戴了好几顶帽子:“没有礼貌”,“缺乏同情心”……后来我自己觉得也真滑稽可笑。那一天我那样狼狈不堪,一个

熟悉农村生活的人,哈哈大笑很自然,这样一想心里对冯文彬也就不那么反感了。

后来才明白跳蚤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我想那一晚跳蚤之所以特别多,大概因为我住进去前几天没有打扫,以后天天打扫,跳蚤就没有那么多了。

第二晚,我自己摸索出了一个对付跳蚤的办法:在睡觉之前,先把床上的东西都抖一下,保证不再有跳蚤埋伏在那里。然后把身上的衣服裤子,包括内衣都脱掉,扔到床下,然后一下子坐到床上去,保证身上不带着这可恨的小动物上床。这样跳蚤的能耐虽然大,跳得高,但是要跳到两尺高的木板床上去,它的功夫还不够(事实证明也是如此)。第二个晚上我就没有受到跳蚤的袭击,踏踏实实睡了一晚。我对本人的聪明智慧也自鸣得意。前一天以为难以克服的困难,居然一下子克服了。

从此我就养成了脱得光光地睡觉的习惯,一直到进北京城之后也是如此,穿上衣服就不能睡着。1976年唐山地震的那一天,我就因为脱得光光地睡着,就不敢跑到院子里去。这几年才改了过来,能穿着内衣睡觉了。

这件事很小很小,小到不能算是一件事。但是我对它的记忆却这么牢固,真奇怪。

39·04 “你不去马列学院了”

通知我到延安的一是中央青委,一是中央组织部。到延

安后的第三天或第四天我就去中央组织部报到。中央组织部在中央青委的北面不远的地方,也在延水的西侧,离大砭沟口只有三四里路,用不着一小时就可以走到。

到那里后,接见我的是干部科的同志。我记得第一次到干部科,两个科长都和我见了面。这两个科长一位是王鹤寿(他是正科长),一位是乐少华(他是副科长)。见面后我看出他们早就知道了我这个人的情况,直接就问我是想工作还是想学习。他们说像我这样的干部学习,可以去中央党校,也可以去马列学院。我在中央青委已经住了几天,看到那里的工作并不多,人都很闲,心想还是先学习学习。于是就回答说,我想学习,并且反问这两个学校的区别。他们告诉了我,我考虑了一下,回答说,我倾向于进马列学院。

也就在这一天,他们又告诉我,新党员第一次到延安,都要写一个本人经历的材料给中央组织部,中央组织部要把它保存起来,也会找本人谈话。我那时入党还不到三年,并且是第一次到延安,过了两天,我就带了写好的材料到组织部去交给他们。

隔了一周,中组部干部科的负责人约见我。我去了。这次跟我谈话的,只有乐少华。见他后,我问他中组部最后决定我到哪儿去,是党校还是马列学院?乐少华说,原先我们决定你去马列学院,看了你的材料,知道你有被拘留的经历,研究后,认为需要对你做一番审查,这两个学校你都不能去,而是去中央组织部训练班,一面学习,一面接受我们对你的审查,你在那里安心学习,等待审查结果。

这次谈话出乎我的意料。从我几次和中组部干部科接触的情况来看,我不能去马列学院也是他们所没有想到的。

我想了一下,自己在入党后有三次失去人身自由的经历,都是短时间的。第一次是1937年7月在北平西郊遭遇日军被抓。第二次是1938年4~5月在江西南昌被误认为是散兵游勇临时拘留。第三次也在1938年,8月间去广州后,一天在空袭警报解除后,在防空地点逗留过久而引起误会,把我拘留了若干天(这三次的故事我在《我的编年故事》第二册都讲过)。我没有丧失党的立场的问题。既然要我安心学习,我就真的很安心地在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学习了。

39·05 中央组织部训练班

开头我对进这样的训练班相当不满意,这很自然。可是我对组织决定,一向是坚决服从。因此在中央组织部同我谈话后,第二天二话不说,就去了这个训练班。正好有一期训练班开始不久,我去的时间挺合适。

训练班的地点在中央青委的南面。这个机构很小,我说不出它有几个班,我只知道我自己所在的那一个班,但是我知道也见过这个中央组织部训练班的一个班主任曾固。他就是建国后当过教育部副部长的陈曾固。我进的那个班不设班主任,而是由一个支部来管。支部书记就是后来在深圳特区当市长和书记的梁湘同志。

到了训练班不久我就对这个班喜欢起来了,在训练班上

并不对我进行什么审查,审查是中央组织部的事。我们在那里是学习,学习的内容我非常满意。

来训练班给我们上课的有党中央领导同志。组织部长陈云同志就给我们上过一堂课,讲了三四个小时,题目是“党的建设”。他讲得非常之好,以前我在学校从来没有听过这种深入浅出、语言生动、能启发人思考的报告。报告中插进许多故事和人物介绍。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他在报告中特别赞扬了饶漱石,说他外号“机关枪”。党组织有什么困难的任务只要交待给饶,没有解决不了的。“饶漱石”这个名字就是那一次第一次听到的。

张闻天也来我们班讲宣传工作。他讲话很有条理,很清楚,也很深刻。

我真没有想到在那里能够听到这样一些报告。

这个训练班还请来了在华北根据地工作过的同志介绍华北根据地的情况,我记得有山西平顺县县委书记向我们介绍平顺的情况。他讲平顺的贫困,资源十分缺乏,说那里金(金属矿)木(森林)水(河流)火(煤矿)土(土地)五行皆缺。

而从马列学院请来讲理论课的教员,讲得反而没有意思。后来我了解到马列学院学员的学习情况,我觉得不如我们这个中央组织部训练班,我庆幸自己没有去马列学院学习。在中央组织部训练班,我在学习中最大的收益就是那些领导人的报告和实际工作经验的介绍。

在这里我再补充说一下,我所在的那个支部除书记梁湘外还有两个支部委员,都是女的。一个是慕琳,后来她加上原

来的姓,成为李慕琳。我记不起后来哪一年我去上海的时候,她在上海芭蕾舞学校当校长。她是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的妻子。还有一个就是臭名远扬的林彪的妻子叶群。她瓜子脸,一直以为她是江南人,我还记得她在上衣左侧上方口袋人们常插自来水笔的地方老插一把吃饭用的勺子。当然那时候叶群还同林彪没有关系。梁湘等发现我在那个班里理论水平可能是最高的,因此有关理论学习方面的事情,就找我帮忙,我就起了支部顾问的作用。我一忙,就更起劲,精神很是愉快。

在我们那个班里,和我同一个党小组的,大概有七八个人。可是我记得的同组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马成德,比我小两三岁。他是辽宁人,有北方人直率豪爽的性格,在我们这个党小组里也是水平最高的一个。离开训练班后许多年我与他没有联系,他后来担任冶金部的副部长、宝山钢铁公司的副总指挥的事我也不知道。1979年(或1980年)林乎加、唐克、顾明在华国锋领导下与日本新日铁谈判在上海宝山建钢铁厂,我对这个项目的兴建是很有意见的,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对冶金部提出责询。在这之后马成德才与我联系上,在宝钢的问题上因看法一致,我们合作了一场。最近几年我同他经常来往。不过2003年2月他因病去世了。

在中央组织部训练班里同我在一个党小组的,还有一个特殊人物。他就是后来延安抢救运动中,被康生称做“坦白模范”,骑着马、戴着大红花到处做报告出了名的张克勤。他后改名樊大为,在甘肃省出版局工作,曾经到北京看过我。

这一期训练班办了不到四个月就结束了。在结束前一天,中组部干部科,还是那个乐少华叫我去他那里告知对我的审查结果,他们认为我三次被拘留,1937年在北平、1938年春在南昌被拘留没有问题,1938年8月在广州那次被拘留,是犯有政治性质错误的,因此给了我一个“最后严重警告”的党内处分,并决定我回中央青委分配工作。对这个处分我内心是不服的,如果说自以为是,组织性不强,我可以接受。但是中央组织部既然已经作出了决定,并没有想听我自己的意见的意思,我就没有说什么话。几年后我又向中央提出这个问题,这次是刘少奇同志亲自审理,他复查后认为我没有犯政治错误,撤消了这个处分。

39·06 第一次听毛泽东演讲

1939年12月9日,那一天延安举行了“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的纪念会,时间是在晚上,会场设在中央大礼堂。在我参加到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中来的时候,划时代的遵义会议已经开过,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已经确立,那时他的威望在我这样的青年党员心目中是绝对的。入党之后我有机会经常看到延安编辑发行的《解放》周刊,还是在抗战前的北平,我就看到了延安的《解放》周刊的第二期——就是登着丁玲《一颗没有出膛的子弹》的那一期。第一期我没有看到。在北平、太原、武汉工作期间,这个刊物的以后各期我都没有遗漏过。后来它正式成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发表在这个刊物

上的毛泽东的言论著作我没有一篇不仔细反复阅读的。1938年《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这是党办的第一张对开日报。那时候延安出版发行的《新中华报》还没有成为党中央的机关报,而成为党中央机关报后的《新中华报》还是三日四开四版的报纸。那时我就是在《新华日报》上学习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这些著作的。这几部著作的逻辑力量更加强了毛泽东在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在没有听到他演讲之前,我想像着他演讲时除了会有高度的思想性之外,会有怎样的表情、风格和技巧。这一天当我知道自己马上就会见到他时,除了兴奋地期待这一次见他的机会之外,我还早就有心注意研究他的演讲特点。

那一天不是他一个人讲话。除有“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李昌概括地做了青年如何继承“一二·九”精神,在抗战中积极工作作出贡献的报告外,还有王明和别的党的领导人的讲话。毛泽东是第一个讲。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的讲话很口语化,语言很朴素,不加什么修辞,思想很深刻,也很风趣,有幽默感。听的时候一点也不费力,讲的道理似乎也很简单,但是越回味越觉得他的确讲出了很重要的思想。演讲中会有几句话或者几个论点人们听了记得很清楚。他的演讲记下来加以整理会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但它的的确确是一个演讲,不是在宣读什么文稿。如果是文稿,人们就会去想何必去听不如看稿子就好了,而听他的演讲时不会有这种想法。那一次他的演讲中所讲的论点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对“一二·九”运动历史意义的评价。我也是“一二·九”运动的参

加者,对这一运动历史意义的评价当然特别关心。他把这个运动和五四运动作了比较,他说它们都是为一次伟大革命做了准备:五四为1925年的大革命做准备;“一二·九”为抗日战争做准备。毛泽东在演讲中又说,五四和“一二·九”这两次运动,都发展成为全民运动。这场全民运动动员了人们去参加革命参加战争。在这次演讲中,他把“一二·九”运动和红军长征北上并提,指出两者的结合促进了全民抗战。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后来刘少奇也著文强调过。我记得很清楚在这次演讲中,毛泽东还结合当时我们同国民党斗争的形势,强调纪念“一二·九”时就要强调要求进步、要求民主、要求参政和笔杆子同枪杆子相结合。以后写“一二·九”运动的文章许许多多,但是直到现在好像并没有超出1939年毛泽东那次演讲中的这些话。现在有些说法,对“一二·九”运动历史意义的评价,显然有意降低了不少,这是同后来对知识分子的看法相联系的。纪念“一二·九”运动的文章在水平上也低于毛泽东、刘少奇当时所讲的这些。

在那个纪念会上,王明也讲了话,我就没留下什么印象了。在会上,王明讲话时我作了两个人演讲的比较。我在武昌昙花林听过王明的一次演讲,有人说他很会讲话,我听了不以为然。记得当时听完演讲从会场出来后,我同蒋南翔走在一路上,我们议论说王明演讲很讲究词藻,也许中学生听了觉得很好,但是我们这样的干部听过之后,觉得除了词藻之外,没有多少东西。那是1938年的事情。在一年多以后的这个会上,在毛泽东演讲之后再听王明的演讲,这样的印象就更强烈

了。

我把这一次称为“第一次听毛泽东演讲”，其实在这之前已经听过他在延安各界反对国民党倒行逆施制造平江惨案的群众大会的讲话。但是我还是决定用“第一次听毛泽东演讲”这个标题来讲这段故事。

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我想再加上一个关于我开始记“学聪明日记”的故事，因为这同第一次听毛泽东演讲直接有关。

1939年5月，我由广东去延安，路经桂林，朋友送我一个日记本，是现在还可以买到的一种日记本。硬封面，白报纸，印有横格，三四百页，每月一张彩色插页。抗战时期的纸张，即便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纸大都是很粗糙而且是没有漂白的。这样的本子，在抗战时期就成了相当高档的产品了。这件事前面我已经写过了。现在我再一次提到是因为直到听毛泽东这次演讲之前，我一直没有用它随随便便记什么。我把它带去了延安之后，也没有想好派它什么用场。用这个本子记日记，把它记成一本“学聪明日记”的决定，就是在第一次听毛泽东演讲之后受到了启发作出的。我觉得在毛泽东的演讲里讲了许多聪明话，毛泽东是个聪明人，我要学做毛泽东那样的聪明人，就要记住和体会他的聪明话。当然聪明人不会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因此可以记这样一本学聪明日记。每天我看到谁做了一件聪明事，说了一句聪明话，就琢磨一番，把它记下来。当然从另一面我也要把每天看到的谁做了一件蠢事，说了一句蠢话记下来。我想试一下记这样一本内容特别的日记，是否是一个聪明的主意。

(二) 1940 年

小 引

这一年可记的事情就多了。从篇数上比 1939 年多了一倍,我接触到的事情和关心的事情也很多。我是个“无事忙”。自己使自己生活过得很充实,丰富了我的经历。

40·01 陕甘宁边区文协代表大会使我得到了满意的工作岗位

1940 年 1 月,延安有一件大事,那就是召开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代表大会使我联想起十六年后的 1956 年 1 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委托周恩来主持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这是因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这个名称中的“文化”是大文化。出席这个大会的有文学家、社会科

学家、自然科学家、戏剧家、音乐家、木刻漫画家、诗人,还有中西医生、新闻记者等等。从大会名誉主席的名单来说,第一名是斯大林,第二名是季米特洛夫,第三名是罗曼·罗兰,第四名是爱因斯坦……从大会主席团来说,其中有不少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文学艺术工作者,也有陈康白、李强、沈鸿等科学技术工作者,还有傅连璋、魏一斋、马海德、金茂岳、饶正锡、鲁之俊等医生。这个会议同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参加者这点上有些相似。同时,两个会议都对日后的文化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这是一个“文化人”的会议。“文化人”这个名词以前我没有听说过,到了延安才听到这个名词。这个名词现在也不再用(有一件事情附带说一说,那就是“文化人”这个词在1948年下半年,我还遇到过一次,那时候我是在中宣部的机关,在北京的香山。我收到城里人寄来的一张表,要我填。这张表的名称叫做:中国著名文化人代表调查表。收到以后,我加几个字就写好了,“讹传的中国文化人”。那时候我自己不承认是“文化人”)。可是当时在延安,这是一个通行名词。它也是在边区文协代表大会上使用的名词。这个会议是在女大——中国延安女子大学礼堂举行的。会议期间,女大礼堂挂了一条长幅标语:“文化人团结起来……”领导这个会议的吴玉章,为会议写的题词中就写有“……文化人必须站在时代思潮的最前线”。他在大会开幕词中也使用了“文化人”这个词,并对“文化人”进行了分析。“文化人”概念的使用,也使我想起了现在使用的“知识分子”的概念,两者的涵义是不相

同的,但都是范围很大的概念。

开这个代表大会时,我到延安已经快有半年。那时我已从组训班回到中央青委。正式分配我到青委宣传部做文化工作,也就在那个时候。但回想起来通知我做文化工作的时间似乎比那个会稍迟几天,但是青委研究我的工作分配问题一定在这个会议之前。我是这么理解当时的情况的:在1939年底中央决定要开展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工作,于是也就决定要开这么一个代表大会。中央青委根据这个精神,在已有工作中就增加文化工作这样一个方面。原先中央青委没有管文化工作的机构,按照这个精神就决定设立,我是被物色做这方面工作的人选之一。这就是说,我在中央青委做文化工作这件事同这个代表大会的召开是有关的。

由于当时我还没有被视作“文化人”——我也的确不是文化人,同时我还没有开始去做文化工作,因此我不是这个代表大会的参加者。这个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中,有“知名的文化人个人代表123名”,有“各文化团体、新闻杂志机关、各学校机关俱乐部,以及各文协分会、各文艺小组等。这些人加在一起共107个单位的代表274名”。我不属于这两种人中的任何一种人,所以我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会场之外的。但是在会场之外并不是就对这个会议的情况不了解。中央青委除冯文彬、李昌、胡乔木等几个委员外,还有一个名叫李千峰的参加这个会议,他每天开会回来,我们就可以知道当天开会的情况。这个会开的时间很长。1940年1月4日开幕,1月12日闭幕,一共开了九天。每天都有些什么人讲话,当晚就可以知

道,特别是那些重要的讲话。比如当时洛甫在这个会上一连讲了三个下午,他讲的题目是《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会后任务》。当然特别令人们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个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报告。我记得很清楚,1月9日晚上,中央青委宣传部的一些人正在房间里聊天,参加会议的李千峰跑来,说今天毛主席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然后他就系统地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的基本内容。大家都觉得毛泽东的这个讲话非常重要。毛泽东作那次演讲的时间是1月9日下午,李千峰给我们讲是当天晚上。李千峰就和我们住在一起。开会的地方——中国延安女子大学就在中央青委的对河,那时延河结了很坚实的冰,跑过去是很方便的。

毛泽东讲话的题目还不是“新民主主义论”,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中华报》在会议闭幕一周后发表了会议的报道,其中有不到两千字的毛泽东的演讲摘要。全文是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看到的,内容就是后来毛选上收入的《新民主主义论》,是1940年1月9日演讲稿的整理和补充,但从《新中华报》发表的摘要来看,《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内容在这次演讲中已经突出地表达了出来。

张闻天的讲话经过整理也在《中国文化》创刊号发表了。

毛泽东在他的演讲中把新民主主义文化定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张闻天讲的是“民族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差别是多“民主”两个字。

有人以此说毛泽东不重视民主。我意并非如此。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是比较重视民主的。不过我认为采用张闻天的提

法比毛泽东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更好。

不过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最重要之点,是在这次演讲中提出:“共产党的文化革命,总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新社会新国家。”“在今天中国革命不能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必将造成一种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很多很多年之后,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我提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应该可以看作有两大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基本内容,在列宁的著作里已经得到了基本的阐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还引用斯大林的著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完全是毛泽东的创见。

我不明白为什么毛选出版委员会不为《新民主主义论》写一个题解,说明它是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上的讲话,而在写作时间只写了1940年1月。我猜也许是因为毛泽东在文中写了“趁着《中国文化》的出版,说说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这样的话的缘故。但是我认为这一句话并不妨碍告诉读者,作者这篇文章是由那次演讲整理而成的。

边区文协代表大会上,有许多文化领域的代表发了言,会议发表了宣言,作出了总决议和若干项的决议,并且选出了将近一百人的执行委员,毛泽东在执委名单上名列第一。这个会议所显示出的对文化的重视的确是充分的。

1939年11月决定召开这个会议后,会议筹备就对延安文化事业有了很大的推动。延安中山图书馆的重新建馆、文化俱乐部的兴建、自然科学讨论会的举行、“中国文化”这个刊物的酝酿、自然科学学院和自然科学研究会的酝酿、中央医院的开办等都是在提出要开这个代表大会之后到这个会议召开前一个月中间的事情。而这个会开过后,对延安的文化事业又有了新的推动。延安的学习空气也比以前更为浓厚。在文协代表大会后,加快了文化俱乐部和延安中山图书馆的建设。在文协代表大会后不到一个月,自然科学学院和自然科学研究会相继成立了起来。蒙古文化促进会的成立、新文字研究会的成立更是由于文协代表大会而建立的。延安新哲学年会也是在这个代表大会后举行的。从这个代表大会后到1942年整风开始的这两年中,延安的工作发展是相当快的。

40·02 第一次跳秧歌

离开中央组织部训练班,我回到了中央青委工作。在中央青委研究我到底做什么工作好之前,我住在青委。这时候,开了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听说要分配我去中央青委宣传部做青年文化工作,但是还没有正式决定和正式通知我。因此我做了一件临时性的工作,那就是到延安的农村去了解开展青年工作的条件。

这时候,就到了1940年了,而且也过了阴历的除夕。这个中国传统节日现在我们是当一回事来过节的,是放假的。

但是 1940 年在延安,所有的机关恐怕没有人想起要过这个节,因此我一点印象都没有留下来。但是这一年的元宵节(这一天是阳历的 1940 年 2 月 22 日),因为是在延安县的农村同农民一起过的,我还真留下很深的记忆。这一年的元宵节晚上,我在一个村子里体验了一次自己感情的转变。

在这元宵节前的好些天,中央青委派我同刚从中央党校出来的庄静同志到延安县农村去做青年状况和青年工作的调查。不记得什么原因,我们选了枣园村后沟的一个村庄。到了元宵节那天,农民们在山上的场地跳秧歌,我和庄静都不会跳,就下到沟里在月光下散步。那时的心情就完全是“知识分子”的。明亮的月光,天气并不特别冷。她来延安比我早,我那时到延安才半年,我同她认识也不久。我们一面散步,一面谈谈原先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生活和到延安之后的感受。

这时,在沟里对面走来了一个村干部,很熟悉地招呼我们:“老于!老庄!快上去跳秧歌去吧!”我们就跟着上去了,学着农民的样子,跟着那一群农民唱歌,也跟着那一群农民扭起秧歌来了。秧歌本来就很容易跳,可是这一跳,我明显地感到感情上的一个变化,马上感觉到同农民的感情发生了一种融合。我对自己的这种转变很奇怪。以后延安整风,毛泽东讲到一个人感情转变的时候,我就回忆起我的第一次跳秧歌舞的情况。我说在那次我同农民一起跳秧歌舞的确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情愫。如果一起跳的人不是农民,我就不会有那样的感受。

谈起这件事,我想附带地讲另一个故事。也就是在那个

元宵节后,过了好几天,我接到上面一个通知,让我和庄静当晚就到枣园村去开会。走的时候月亮还没有出来,只有微弱的星光。于是我和庄静两个人,不得不在黑暗中走很长的山路。那时延安的农村即使不很偏僻,狼也很多。我们住在枣园后沟农民家里的时候,晚上也时常听到狼嗥。不过呆在家里就不去管它,可是现在是在野外而且是在夜间。我们一路上听见狼嗥,按道理说,应该会感到危险,应该会害怕,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们的胆子那么大,一点都没有考虑这种危险。那晚幸亏只是听见狼嗥却没有遇见狼群。一路走了几条山梁,一边走一边互相提醒脚下小心不要踩空跌倒,终于走到枣园。

再讲一件与那次在农村没有关系的事情。也是在1940年,我听说我的一个清华同学戴中宸——她后来改名黄葳,是“一二·九”的参加者,来到了陕甘宁边区,住在安塞陈家沟。我就独自一人从延安走到安塞去看望她。就在那陈家沟里,大白天在沟内却与一头狼迎面擦身(不好说“擦肩而过”,因为狼没有肩膀)而过。它抬头看了看我,我也看了看它,和平相处,互不侵犯。那天我没有害怕狼的情绪。我手边也没有拿棍子,农村有句话“麻杆打狼,两头害怕”,狼看着是个棍子,然而麻杆很脆,中间是空的,一打下去就碎了,打不成人也不要说打狼了。据说狼遇人就会用前爪搭在人的肩上,这时人不能回头,如果回头就会被狼咬住喉咙。人只能用手中的棍子,打狼的后腿。可是那天我连棍也没有拿,而且也没有试验那个办法。最近我写过回忆动物的一系列文章,其中有一

篇《狼》讲的就是我的这两次经历。

40·03 我兼任延安中山图书馆主任

1940年3月,组织上安排我在中央青委宣传部做文化工作。当时青委宣传部长是胡乔木。到青委的第一件文化工作就是要我兼任延安中山图书馆主任。

延安中山图书馆成立很早,还是在抗战爆发之前的1937年5月就已经正式成立了。我是1939年7月才到延安的,前两年的情况当时一无所知。后来才知道,初成立时馆址在延安城里。1938年国民党对延安的那次轰炸,日寇更以城里为目标,死伤的人不少。轰炸后城里的机关都搬到城外,分散在各个山头上,住在窑洞里,办公在窑洞里,窑洞背后挖了防空洞,城里就没有多少人了。这个图书馆的业务也就停顿了一年多。

1939年12月,恢复并扩大中山图书馆的事情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个时候我虽然已经到了延安,但是还没有跟图书馆发生任何联系。后来我从《新中华报》上了解到,在中山图书馆的事情之后,就召开了这个图书馆的扩大理事会。我不知道这次理事会是谁主持的,有哪些人参加。不过从这个座谈会作出的决定来看,到会的人的权威程度不低。在会上决定,要使它“成为延安大规模的公共图书馆”。这里说的“大规模”当然是按那时延安的标准来说的,但是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对建设这个图书馆下的决心可真不小。会上决定了扩大

的理事会名单。我手边有一张从报上抄下来的名单,它也许会使今天的一些人吃惊,因为列入这个名单的人有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臧云远、林彪、成仿吾、陈伯达、周扬、艾思奇、何思敬、丁玲、邓颖超、孟庆澍、冯文彬和李昌。这就是说,我们党的元老级的人许多都在里面了。此外还有军界、妇女界、青年界以及当时在延安的文化界的代表人物。这个图书馆的馆长推举林伯渠(他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席)担任,馆主任由李昌来担任。一个市的公共图书馆有这么多地位很高的人当理事和馆长,我想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例了。而且林伯渠这个馆长并不是不管事的。1939年12月13日的理事会上推选他做馆长两个月之后,即1940年2月14日他就以馆长身份召开了第二次理事会。增补王林和胡乔木为理事(王林当时是在延安管出版工作的),推选艾思奇、何思敬、周扬、王林、胡乔木五人为常务理事。馆主任的职务由李昌改为胡乔木来担任,就是这次理事会上作出的决定。

当时党中央、边区政府、八路军对此事的重视还可以从毛泽东、彭德怀以及边区政府、八路军总政治部都给中山图书馆捐钱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钱的数量也要从当时延安的标准来看,从现代的标准来看,这些钱便少得非常非常可怜。当时毛泽东捐了三百元,彭德怀捐了二百元,边区政府也捐了三百元,八路军总政治部捐了五十元。钱虽然不多,但它的意义是很大的。这样一些史实我认为应该让今天我国的图书馆工作者特别是研究图书馆史的人知道。

这次理事会虽然决定了胡乔木代替李昌做主任,可是胡乔木本人也没有做,而是要我去当这个主任。这个图书馆是延安的公共图书馆,但是日常工作归中央青委照管,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挂靠在中央青委。图书馆的主任由青委的人担任,馆员由青委派。我去兼任这个图书馆主任的由来就是如此。

对于重建这个图书馆都要做些什么事,二次理事会作出了决定。在我接受了馆主任的职务之后,就把《新中华报》上发表的二次理事会的报道找出来看了一下,并且从比我到得早的几个馆员那里,了解了一下工作进展情况,然后我就去边区政府找林伯渠馆长。他跟我谈了近两个小时,他要我把这个图书馆照管好。我回去后就照着他的指示积极去干。

我是三月底或四月初走马上任的。那时图书馆的工作已经有了一个基础。馆员中的王仲方,虽然没有负责人的名义,事实上他是我的主要助手。现在他是一个法学工作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中国法学会的会长。除他之外还有两位男同志:张远和古天佑,还有两位女同志:史洛明和陈岫青。我上任时,图书馆的三座办公用的大窑洞和两座住人的小窑洞,都挖好了。从各单位募集图书的工作已正在进行,重庆和桂林也运来一部分书,书架也做好了二三十个,编目、在书上盖图书馆的图章、在书上贴标签的工作也进行得很正规。我对他们很有效率的工作很满意,那三座大窑在延安是少见的,又大又深,墙也用石灰刷得很白。我只是有点担心,不知道大窑是否经得起暴雨。我很喜欢那个地方,除工作

外,我自己看书也方便,在这个图书馆里,还有不知是经过什么样的途径收集到的苏联出版的许多书,有中文的,也有德文的和俄文的。其中就有德文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套马恩全集是阿铎拉兹基主编的(在这以前里亚扎诺夫也编过一次。据说这个人后来被整肃了,我们现在用的马恩全集,就不署名是哪个人主编的了)。我们中山图书馆保存的马恩全集很不全。其中收集有恩格斯的一本《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的译本,那是很不容易看得到的。后来离开延安,我嫌它太厚,把它拆了,只留了“自然辩证法”的一部分,把它带在身边。许多年前,龚育之同志想看看,从我这儿借走了,他一直没有还给我。我也不想要了。想必还在他那里。

在这个图书馆里,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书,比方说有一本《麻衣神相》,是写看相的。我也增加了一些看相的知识。

在那里开展我的文化学术活动也很方便。我主持的那个读恩格斯《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的读书会,就是在中山图书馆的大窑洞活动的。中山图书馆的地点在离文化沟口不远的地方,中央青委则在沟口。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也在文化沟内,稍深一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办后,我在那里兼管一个编教材组。去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也路过中山图书馆,来回都在那里坐坐,尽管我在那里的工作是兼任的,但是我对这个工作抓得还是很紧的。

我到图书馆工作时,还缺少一个阅览室,于是我去了之后就开始兴建阅览室。盖了一处五间大小的平房,我想面积不会超过一百平方米。我从来没有做过盖房的工作,就在我们

自己的中山图书馆里找到两本营造学的书来看,了解木结构的房屋有什么特点。什么叫做“斗拱”(一斗三升等),什么叫做“飞檐”等等,都是那次学的。但是那是比较大的建筑用的,我们要盖的是很矮的一个小平房。我还为那个阅览室的窗户的图案进行了绘图设计。那时延安的房子还很少能够用玻璃,要用纸糊门窗。我不知道我的设计的艺术性和实用性如何。

我在中山图书馆和王仲方等同志又工作了三个月,阅览室盖好了,图书编目工作也进行得差不多了,就考虑宣布正式开放的问题。在未正式开放之前,我们已经临时开放了一个时期,到这里来看书、借书的人不算太少。到6月底,阅览室也布置好了。边区和大后方的报刊有百余种,编好的书目也有五千多种。我又找了一次林伯渠馆长,决定在1940年7月7日抗战爆发三周年那天正式开放。在《新中华报》发了一个中山图书馆正式开放的消息。同时我们还正式建立了一个材料室(现在人们用的语言是“资料室”),供研究者使用。

我上任后,觉得图书馆的工作很单纯,没有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需要去找领导,所以只找过林老两次,第二次不到半小时。平常我没有去多麻烦他。我也没有想去开理事会。因为要开理事会,就要林老出面,就要到各处发许多通知,这些都要花时间,而且我不知道有什么问题要理事会来解决。所以在我当馆主任期间,一次理事会也没有开过。因此理事会的人中,有的我在延安就没有见过。今天回想起来正式开放那天搞一个比较隆重些的仪式也还是有必要的。

附带讲一点以后的事情。我是1941年秋天离开中央青委去西北局的,接替我当主任的是武衡。他担任主任后,中山图书馆的情况我就说不出什么来了。从头到尾能够把中山图书馆的情况说清楚的是王仲方和古天佑,他们先于我在中山图书馆的岗位上,又是专职,武衡接替我时,王仲方、古天佑等仍在中山图书馆。他们也可以提供回忆。1990年7月7日,我们几个人本来应该集会纪念一下新馆正式开放五十周年,但当时没有想起来,以后应找个日子聚会一次,把情况核对一下,动员他们也写一写,为中国图书馆史的研究工作提供一点素材。1997年5月也是一个整生日,即它最初成立的六十周年纪念日。前几年,延安重建中山图书馆,聘请我做名誉馆长,我当然很高兴。一直想有机会到延安去看一下今天这个延安中山图书馆。

40·04 我还兼任“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编审股长

我在中央青委正式的工作岗位是中央青委文化股,这个股就是在陕甘宁边区文协代表大会后新设的。它有一个股长陈宇,但是除了我之外似乎再没有别人,也没有听说这个股干过什么工作。由青委正式分配要我兼任的职务,一个是上面所说的延安中山图书馆;还有一个就是新设立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编审股长。

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校长由黄华兼任。黄华是中央青委干部部部长。学员是新招收进来的。我只记得这个学校里有一

个高级研究班,他们这个班的学员都是四川大学我们的共产党员。因为成都的形势不好,我们党成都的领导人车耀先被捕,他领导下的四川大学的党员们就赶快撤到延安来了。其中就有后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胡绩伟同志。这个班的学员其实并没有在学校里正规地学习,不久就一个一个地分配工作了。

我在这个学校里的任务是为这个学校编写教材。我这个股连我有三个人,有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一个王云同志,他的年龄比我大好几岁。平常我都叫他做“老王云”。他是陕西渭华暴动的参加者,是这个股的专职人员。可是他不是一个执笔杆子的人。我要他写,给他出主意,他努力工作,这个工作的效果是写出了一些草稿。工作并没有很好地完成,也不知道我们编出的教材在这个学校里用了没有,有什么反应。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没有更多的故事可讲。

除了这两个兼任工作之外,胡乔木没有给我再具体地分配什么工作。他要我自己开展工作,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工作空间,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在1979年之后,我和胡乔木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我对他很不满意。在1990年后,我们之间就根本断绝了朋友的关系。但是1940年他分配给我的工作和他对我的不闻不问的态度,我至今对他还十分感谢。

40 · 05 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的前前后后

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成立,是我开展的一件重要工作。我参加了这个研究会的筹备工作,出席了这个成立大会,成立后担任了这个研究会驻会干事的工作。

1936年我在上海也参加了一个“自然科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是这个研究会的成员。两个同名称的研究会,都是党领导下的革命知识分子的组织。

1936年上海的自然科学研究会,是当时以周扬为首的“中央文委”领导下的一个党的外围组织。当时上海党中央组织和江苏省委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在被破坏以前上海党中央组织和江苏省委下有一个“文委”的组织。在组织被破坏以前,有五个委员。这个委员会由阳翰笙负责,其他四个成员是田汉、杜国庠、周扬和夏衍。在这次大破坏当中,阳翰笙、田汉、杜国庠三个人被捕了,没有被捕的就只有周扬和夏衍两个人,可是周扬他们坚持活动,找了章汉夫、钱亦石和吴敏三个人成立了五个人组成的“中央文委”。这个“中央文委”是在没有经过上级组织、也找不到上级组织的情况下,自行成立的。成立的时候他们说将来请中央审查他们的工作,或者承认他们的组织,或者进行改组。我们上海的自然科学研究会,就是那个“中央文委”领导下的一个党的外围组织。

自然科学研究会中周扬、夏衍都没有出面,我只见到章汉夫。艾思奇是这一个研究会的实际负责人。这个自然科学研

究会和 1940 年在延安成立的自然科学研究会的成员都是党领导下的学自然科学,或者做自然科学工作的党内和党外的革命者。但是它们所处的环境很不一样,任务也很不一样,规模也很不一样。

说到规模,1936 年在上海成立的那个研究会是一个只有二十来人的小团体,是在一个小旅馆的房间里成立的,成立的时候到会的不足十五人。而 1940 年在延安成立那个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参加者有好几百人。其中会员有三百多人,按所学专业分:理科 119 人,工科 120 人,农科 45 人,医科 55 人;按参加工作的性质分类为从事经济建设的 90 人,从事教育和科学工作的 29 人,从事医务工作的 45 人,在校的 119 人。到会的还有不少不是会员的。前者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个半公开半秘密的团体,后者的成立大会会有许多党政领导人到会,有党的领袖毛泽东等在会上发表演讲。

说起这个研究会的成立,应该指出到了 1939 年,中国的形势已经比抗战前的 1936 年有了很大的变化。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靠发展革命的武装建立起一个一个的根据地。战争中所需要的枪支弹药相当大的一部分由敌人送上门,即从缴获中武装自己,但是在苏区,工农红军已经注意到还是要抓枪支弹药生产,还要有自己的通讯联络工作,要有自己的医务工作,要有自己的被服厂等等。因此就在那时,苏区中就有不少懂得一些自然科学和技术的人。举例来说,建国后曾经当过外贸部长的李强,就是其中一个。李强告诉我,“立三路线”时党中央书记向忠发的职业是魔术师,李强就帮助过向忠发

搞点化学小魔术。后来李强去苏联学的是无线电,在延安时他曾经送我一本用俄文写成的关于天线的论文。李强在红军中做过与他的本行无线电有关的技术工作,在延安他是我们“军事工业”的“巨头”。解放后当过邮电部长的王铮,也是在红军中做电讯工作的。从事医务工作的人也有好几个,傅连璋就是其中一个。傅原来是在江西做医务工作的,我们红军到了江西,他就参加了我们的工作,成了我们卫生部门的负责人。红军长征到了陕甘宁,抗战爆发后我们有了一个稳定的后方根据地。这时候又来了一些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医学专家就有好几位,有的来自国民党统治区,有的来自外国。不过白求恩、柯棣华都在前方,在陕甘宁边区也还有一些,像马海德、何穆、魏一斋等。到1938、1939两年,来延安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界的人就更多了。陈康白、屈伯传就是这两年中来的。同我坐一辆载重汽车来到延安的就有刘威一,他也是学化工的。这些是以科技为职业的,还不算原先学过自然科学和技术、但是参加了多年党领导下的革命工作或者到延安进培养革命干部学校的人。这些人分别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到1939年,在延安的科技方面的人才多起来了。加上这时候党中央正考虑需要在陕甘宁边区搞些工业建设与文化建设,就要发挥这些人的积极性。这是从当时需要所做的考虑,还有比较远一点的考虑,那就是在我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我们党对科学技术亦不能太陌生,不能没有党的科技工作者。于是在延安建立自然科学机构、开展自然科学的工作,就提上了日程。

我到延安比较晚。到延安后又上了几个月中央组织部训练班,不但1939年5月成立自然科学研究院时我不在延安,无从知道,1939年12月5日到11日在延安一连召开了好几天的自然科学讨论会,我也没有参加。我事先不知道,事后才从报上知道在讨论会的第一天王明、陈云、吴玉章、张浩出席了会议,并且听说会上讨论了不少问题,其中包括把原来的自然科学研究院改名为自然科学学院。这不只是改变一个名称,而是从研究机构改成教育机构。还听说有人建议成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作为团结边区自然科学工作者参加边区经济文化建设的团体。

我没有同自然科学研究院这个研究机构有什么接触,我接触到时便是自然科学学院这个教育机构的筹备工作和自然科学研究会的筹备工作。那时中央青委已决定我做文化方面的工作,我就把参加这个研究会作为我在中央青委机关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1936年我就参加过上海的自然科学研究会,对这项工作就更有兴趣。

我记不清楚是谁告诉屈伯传——自然科学研究会主要的筹备者——要他来找我。屈也是1939年到延安的,比我略微晚一点。他同陈康白一样也是德国留学生。他是学皮革的,陈学的是一般的化学。屈伯传为人坦率,自己不懂的就说不懂,不像有的人那样怕被人看出自己对某些问题的不懂,故意表现出自己知识渊博的样子。屈为人也随和,见面后,他说自己是学技术的,没有做过组织工作,他说他知道我是做组织工作、群众工作的,要我帮他把这个研究会的工作做好。我也乐

意帮他的忙,于是我投入了这个研究会的筹备工作。

这个会的具体筹备工作,是在边区文协代表大会闭幕(1月12日)后开始的。筹备工作不复杂,无非是起草章程和宣言、确定执行委员会的人选、通知些什么人参加(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我们就把他们视作会员,还有一部分是请他们来支持和旁听的)、请哪些中央首长等等。这些工作很快就完成了,于是定下了2月5日开成立会。屈伯传和我就决定去杨家岭找毛泽东,向他汇报研究会的筹备工作,请毛泽东到会演说。

没有想到我们联系了一下,毛泽东很快就接见了我们。而且非常痛快地答应在成立会那天到会。我们去杨家岭的时间,离开成立会不到一个星期。关于这次见面的情况,我打算下面单独写一节。

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地点,定在延安南门外的边区政府礼堂。这是因为这个研究会是陕甘宁边区的团体,受边区政府领导。

开会的时间定在下午三点。在延安的人都知道,长期做文字工作使得毛泽东养成在夜间工作的习惯,上午他要休息,为了要他参加这个会,我们就决定在下午三点开,不过毛泽东还是没有在三点前赶到。因此开会后先进行别的议程。先是由陈康白致这个会议的开幕词,接着屈伯传报告研究会筹备经过,最后就请首长讲话。当陈云正在讲话时毛泽东来到会上。见到毛泽东来了,大家热烈鼓掌了很久。这时我们坐在主席台上的人都站了起来,毛泽东和我们一一握手。然后说

“请陈云同志接着讲吧”，就坐了下来。在陈云讲完之后，毛泽东就接着发表演讲，这次讲话的时间不算短，将近一个小时。其中有一段话是许多人熟悉的：“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武器。人们为着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由，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界得到自由。”他讲话时手中没有演讲稿。这次演讲以后也没有全文整理出来，在《毛泽东选集》和其他的文集中都没有收入这次讲话。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发表在《新中华报》上记者报道的片断。上面引号中的两句话，后来收在毛泽东语录这本“小红书”里。它的出处就是《新中华报》。

毛泽东演讲完了之后，会议就通过了宣言、研究会的章程和执行委员会的人选。会议开过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新中华报》一直没有报道。宣言的稿子是现成的，但是报道的时间是2月18日，即隔了将近两周的时间，而成立大会的报道时间是3月15日，在成立会后一个月还多十天。

成立会的三天之后，开了一个研究会的执行委员会，会上推举吴玉章担任研究会的会长。当时我主张设立一个驻会干事会，而不是执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因为后者要考虑各方面的代表，名为常务，实际上不做日常工作。我强调驻会干事会的办事性质。大家同意了这个意见。于是就由屈伯传负责这个驻会干事会，我和李苏、阎沛霖、乐天宇、丁仲文等几个同志就帮助他工作，我们的职务名称都叫“驻会干事”。工作很

快开展起来。事实上执行委员会开过那一次会之后就没有再召开过会议。

当时研究会要做的工作不少,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帮助原先学自然科学的同志归队——回到自然科学工作岗位的问题。

那时候在延安的学自然科学的有这么几种人:一种人是到延安就有自然科学家的身份,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人也就把这些人看作是科技专家了,安排在科学和技术工作的岗位;还有一些人来到延安比较早,是作为革命青年投奔延安的,他们到延安后通常进抗大、陕公,然后分配一般的工作,其中不少人到了敌后根据地,没有离开延安的也做一般工作;还有一种人是学过自然科学,但已经在党的其他工作岗位上干得很不错,比方说艾思奇在日本是学过技术的,但是后来在哲学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他就不再被看作是自然科学工作者了。

1939年开始党注意到要有一批人做科学技术工作(记不清准确的年月),中央还做出了一个党员参加经济技术工作的决定。于是本来在做一般工作的同志中,有的人这方面的学历和经历被了解到的,开始“归队”。比如力一(原名力伯皖,是1936年我在广州组织的那个革命团体的成员),他是1935年北平大学工业院毕业的,在广州时是在电台做技术工作,1938年到了延安,陕公毕业后,先做一个时期一般的工作,到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前就已经归队,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业处工作了。但是到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后还有不少人没有归队。有的人这方面的学历与经历未被注意到,或者因为

其他原因还在做一般性的工作,比如武衡在自然科学研究会还有延安市青联工作,1941年9月我离开中央青委,不再兼任中山图书馆主任之后,武衡还接替我当中山图书馆主任。他是清华学地学的,是以后才调去自然科学学院的。因此在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后,我们就把帮助这样的人归队作为一项工作来做。

我也积极参加了让学自然科学的人归队的工作。我们只要发现有一个应该归队的人,就设法报告有关的组织,想办法把他调到科学技术岗位上来。比如我了解到莫汉(即范慕韩)那时还在陕北公学当文化教员,我们就帮助他归了队。又如孙鸿儒,他是学数学的,原先是在八路军军政学校当文化教员。我了解到这个情况,把他介绍到自然科学学院去教数学。我还了解到,在陕甘宁的三边(当时陕甘宁边区有这样几个地区:中部延属地区、南面的关中地区、东北部的绥德地区和西北部的三边地区),有一位同志在那里制作了日晷,他的名字叫孙桐,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我也设法让他进了自然科学学院,让他教数学。还有一个白夷同志,他在陕北公学做文化教员,我发现之后设法把他调到我们的自然科学研究会,做一个专职的工作人员。他后改名为何成渤,建国以后当了电力局的局长,对我们国家的发电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前几年,我和他联系很多,他的年龄略大于我,可是身体好极了。这几年没有联系,不知道他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自然科学研究会本来没有常设的机构,他来了之后,第二年10月我们决定成立秘书处,请他当主任,又调了两位同志帮助他。

在这里我想讲一些关于我和自然科学学院的关系,自然科学学院的院长是由徐特立老同志担任的。1938年初,我在长江局当青委书记的时候,曾经到长沙见到徐老。在延安我们成了“忘年交”。在1940年自然科学学会成立后,自然科学学院化学系主任李苏、物理系主任阎沛霖、生物系主任乐天宇,都是驻会干事,加上自然科学学院的教员有一些是我参加动员归队工作之后调去的,还有我这个人喜欢跑到各单位和群众、朋友接触的习惯,因此经常去自然科学学院,和他们聊天。孙鸿儒在自然科学学院教一门微分方程,有一段时间他病了,我就去做他的代课教员。那时,我对教这样的课程还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恐怕就不行了。自然科学学院第一班的学生,我就给他们上过课。

自然科学研究会在1940年的工作是打基础,我们需要与各有关方面联系,了解在那里工作的人的情况,特别是研究会这样的工作是要用业余的时间来进行的,我们要发现愿为这个组织工作的积极分子。屈伯传在边区政府工作,对边区政府里的科技工作者熟悉一些,我和自然科学学院的关系比较密切,还有一些部门的人屈和我都还不熟悉,需要加深了解。研究会该怎么工作,也要摸索。到了第二年,即1941年,研究会的工作就比较好开展了。

40·06 在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里

刚到延安的人都有一个心愿,想很快地见到毛泽东。我

去延安时毛泽东才四十六岁。那时的毛泽东经常出席延安的各种集会。有一回我翻了我到延安后一两年的延安《新中华报》，一个月他都要出来做几次公开演讲。那时群众看见他并不难。我到延安不几天，中国女子大学开学，毛泽东参加了开学典礼。这次和以后我都没有去过女子大学。1939年8月1日，在延安东门外的飞机场就开了人数很多的追悼平江惨案罹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后来被收入毛选的《必须制裁反动派》那个演说。会太大了，我站在远处没有看清楚他。在这个大会之后十来天，边区学联的代表大会，他也出席并讲话，我虽然做的是青年工作，但那次我没去。

1939年我刚到延安的时候，天气还没到寒冷的季节，每天晚饭后大家都喜欢到延河边结伴散步。一边散步一边谈话，或者一边散步一边唱歌。毛泽东也常散步。我就在河边遇到过他好几次。他散步通常只有一个警卫员在后边跟着。有时我看到遇到他认识的人，他就同这个人打招呼。有两回我都想走近他，跟他握握手。那时相信如果我那么做，警卫员不会拦阻，毛泽东也不会拒绝和我握手。不过我还是没有做那种冒昧的事。我再一想，自己已经见到过他，听过了他的演讲，又并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说，没有什么问题要他解决，因此我就没有利用那样的机会在河边接近他。不过在1940年2月，我到延安只有半年，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的时候，天气已经是很冷。我真没有想到这个时候，不是在延河边，而是在他的窑洞里，见到了毛泽东。我就有机会坐在杨家岭他的窑洞里，离他很近很近，可以仔细地端详他的容貌和表情，听他讲

话,握到他那肥大的手。

我去杨家岭,为的是同屈伯传一起向他汇报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筹备情况,请毛泽东出席即将召开的成立大会。我们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到了那里。毛泽东正一个人在窑洞里。那个窑洞很平常,家具也很简单,一张书桌,桌旁一把椅子,一个书架。书桌上有一堆文件,当然也少不了文具和纸张。我们进去时毛泽东正伏在桌上用毛笔写字。我们去了他就把笔放下接待我们。屈伯传就向他作了简单的汇报,希望他到会发表演讲。我们很高兴地得到了他的许诺。原先我们想他很忙,谈完了正事就走,没有想到他听完了汇报之后,却向屈询问王人美在大后方的情况。王人美这个人我也知道,她是电影《渔光曲》的女主角。我不知道为什么毛泽东关心起王人美来了。他关心王人美能不能来延安,从他的谈话中我得知,王人美的父亲曾经是毛泽东的老师。屈也真能够讲出一些这位电影明星的情况。

在整个的谈话过程中,除了简单地对屈的汇报作了一些补充之外,我都就近观察他和他的环境。我可以很从容地做这样的事。

这次见面,我估计我没有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似乎事先已经知道我的一些简单情况(在他接见某个人时,一定有人向他对这个人的情况作过汇报)。他没有向我提出什么问题。

这件事情在前面一节已经提到,在这一节我再单独详细地讲一讲。

40·07 毛泽东笑得很开心

有一次我见到毛泽东大笑,笑得很开心。

时间是1940年6月,地点是延安北门外文化沟内的文化俱乐部的一面特大窑洞里,场合是延安新哲学年会举行的第一届年会的第一次会议。这个年会要开几天。我到的那次是带有这个年会开幕式的性质。延安新哲学学会是1938年下半年成立的,这个会成立时我还没有到延安,对这个会发起与筹备和成立后工作的情况也一无所知。我1939年到了延安之后,见到何思敬,他知道我这个人哲学有兴趣,告诉我最近就要开年会,问我是否想参加,做这个新哲学学会的会员。我当然求之不得,要求他介绍我参加这个新哲学学会。因此到了开会的时间就通知了我。我就去参加。从我到延安,到1940年6月开这个年会时,中间有一年多。

那次年会,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洛甫、朱德都参加了。到会的学者和文化界人士有何思敬、艾思奇、郭化若、和培元、周扬、陈伯达、杨松、张仲实等不少人。在我的印象中有三四十人。后来看到《新中华报》报道,说到会的有五十余人。这次是我参加延安新哲学学会的第一次活动,也是最后一次活动,也许以后这个会似乎就没有再活动过。

引起毛泽东大笑的原因是延安新哲学学会的主要负责人(我不知道他的职务名称)何思敬致年会开幕词。他在这开幕词一开头讲:在我们这个延安新哲学学会成立后的一年多的

时间,研究会的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这成绩首先表现在这个研究会的会员毛泽东同志写了《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那样的著作。他一讲大家就笑开了,他越是一本正经,大家也就越觉得可笑。毛泽东也笑得直不起腰来。当时我脑子里闪了一下,领袖也可以这么笑吗?再一转念,领袖也是人,为什么不能同常人一样,自由地表露自己的情感呢?

大家都笑,只有两个人不笑。

一个是何思敬。大家那么笑,他有点发呆,似乎他还没有明白为什么大家笑,为什么毛泽东也笑。他还想照着他准备的稿子讲下去,他越是一本正经,大家就越觉得可笑。

还有一个是艾思奇。他预定在何思敬开幕词之后作会务报告。也许在他的会务报告中也有同样的内容,何的开幕词讲稿他大概也看过。他也笑不出来。后来我慢慢熟悉了艾思奇的性格,他平常也偏于严肃,是个不那么爱笑的人。

当时我也是笑得很厉害的人中的一个。建国后,我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常常遇到要写我国理论工作总结这样的事情,也就常常遇到应不应该把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其他同志在理论上的贡献写到总结里去的问题。我常常为这个问题左右为难,如果当时有这样的工作经历,我也许就笑不出来了。

40·08 有幸同毛泽东坐在一张餐桌上

就在那次新哲学年会第一次会议后,与会者就聚餐。延安的纬度虽然比北京低两度,夏至的白昼还是很长。下午两

点多钟开始的会，散会的时间已经七点左右了，天还没有完全黑。聚餐的地点就设在文化沟口才开张不久的“胜利食堂”。吃饭的人似乎只有两三桌，可是毛泽东去了。一就座我发现我同毛泽东就坐在同一张餐桌上，而且我紧靠着他，在他的左首。那次入座是完全随意的，没有人做什么安排。那时从来不会把名字做成小牌，放在座位前面。不像现在。

在延安吃饭，一般干部都是自备两个大碗，一碗盛小米饭，一碗盛菜，并且在胸前左侧平常插自来水笔的地方，插一支匙：前者是容器，后者是工具。即便有很少数吃小灶饭的，那也比一般干部好一些，两菜一汤而已。因此到馆子吃饭，当然是最高档次了。不过“胜利食堂”的烹饪水平最多只能向今天北京街头的小饭馆看齐。但是在那里有一个特色，是一道甜食，那是用鸡蛋、黄糜粉、白糖和食油制作出来的，吃起来一不粘碗、二不粘筷、三不粘嘴的“三不粘”。我是喜欢吃甜食的人，毛泽东是湖南人，应该是喜欢吃辣的，我看那天毛泽东的胃口也很不错。

坐得那么近，说话就很方便。他详细询问我的姓名、年龄、学历、专业、是否党员、在延安哪个单位工作等等，并且跟我讨论了哲学问题。

在那天的年会上，大家发言的时候各讲各的，没有一个主题。那时我注意到1939年冬天党中央已经说进入了相持阶段，《新中华报》上面发表了一篇张闻天写的说我们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的讲话。讲话里说：在武汉、广州失守之后，日军就不像前两年那样长驱直入，而是出现一种停滞，因而说战争

已经进入相持阶段。毛泽东有两次讲话也提到了同样的观点。他也用《相持阶段中的形势和任务》这样的题目在1940年2月发表过文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新哲学会是个学术会议,进行的是学术讨论,我还是讲了自己的看法。我注意到重庆《新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它的提法和《新中华报》有所不同,其中出现“过渡”两个字。于是我就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我认为当时我国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进入相持阶段,而只能说是进入了走向相持阶段的过渡时期。在讲这个看法时,我讲了一篇事物发展有可能有过渡的形态,讲了有“过渡的时期”这个概念的哲学上的道理。由于我是第一次在延安的会议上发言,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面孔,我的这篇发言引起与会人的注意。

在我的发言中,我从量变引起质变中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来讲过渡状态产生的原因。我讲某个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如果是由一对矛盾决定的,这对矛盾解决了,事物就由旧的质向新的质转化,或者说飞跃。这时候就不存在什么过渡时期。如果某个事情的质是由多对矛盾规定的,只解决了一对矛盾,其他的矛盾没有解决,旧的质就不能被新的质完全取代。这时候,就会有过渡时期。在讲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一时找不到好的例子,就以水和玻璃为例说:水的质的规定性简单,因此在固态的水和液态的水之间不存在过渡的状态,而玻璃的质的规定性复杂,因而固态的玻璃到液态的玻璃之间就会有过渡的状态,玻璃的温度越来越高,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变成软的东西,可是不能说是固体,也不能说是液体,而是固体

和液体之间的过渡状态(这个例子其实是不很恰当的,因为我说的固体的玻璃不合乎物理学上讲的固体的定义)。我作这样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而且与会者除何思敬外,别的人大概都不认识我,一个会上有一个新面孔的人讲话也会引人注目。何况这个内容实际上与张闻天和毛泽东有关。

在会上我看到我发言时毛泽东也很注意我。在餐桌上毛泽东就同我继续讨论关于“过渡”的哲学问题。这时候,毛泽东大声地要大家注意,向大家说:“于光远今天会上讲了一些哲学的一般道理,他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他是学自然科学的。我们哲学工作者既要学社会科学,也要学自然科学的知识。”毛泽东又一次详细地问了我的基本情况,问了学历和工作经历。这次餐桌上的谈话对我来说可以说向他交了一份党员登记表,也可以说接受了他一次哲学口试。对于这个相持阶段问题,毛泽东没有表示他对我的意见的意见。看来,前不久在杨家岭窑洞里见他,他对我并没有产生比较深的印象。那天他的注意力是在王人美,他谈话的对象是屈伯传,这次他才真正注意了我。

到过延安的青年成千上万,能够和毛泽东坐在一张餐桌上谈话的人不会多,得到这样的机遇,我真是“三生有幸”。

40·09 在这里我想插进几句讲讲何思敬

何思敬教授在中山大学执教时,我在广州一直想去看望他,结识这位学者。没有想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个抗

日青年团体,很快地被武汉的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接着日本军队很快地从大鹏湾登陆,进攻广州,而广州就很快地沦陷。我就不得不匆匆地离开广州,甚至也没有和何思敬同志取得联系(其实他已经不在广州了,而是到了延安)。

没有想到,我想同何思敬同志见面的这个愿望却在延安实现了。

他也住在大砭沟,他所在的工作单位八路军军政学院在后沟,而他的住所靠近沟口,同我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很近。我主动地拜望了他,一见面就很起劲地谈哲学。是他让我参加那次有毛泽东参加的新哲学年会。他还给我谈了许多他自己的哲学见解。他的德文很好,日文也很好。他对19世纪德意志哲学,对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很熟悉。他对日本的哲学界的情况也很熟悉。

在我的印象中他特别喜欢谈黑格尔。

他对我发表的许多哲学言论,有许多记不清楚了。他对一些哲学名词的中译有很精辟的见解。他说现在我们常用的许多中文哲学术语名词,大都直接沿用日本人很早以前的翻译,而日本在当时的哲学界大都是唯心主义者或二元论者,所以译词就带有这方面的色彩。他说黑格尔虽然是唯心主义者,但是他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他用的许多名词倒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马克思在哲学方面没有自己的哲学术语,有了黑格尔的术语就已经够了。但是中译名却很成问题,比如“对象”在黑格尔那里是 Gegenstand,是“对着你站着的东西”,并不是对着你的什么“象”。“概念”在黑格尔那里是

Begriff,是“抓住的东西”,并不是没有什么观念的含义。“现象”Erscheinung也是“出现的东西”,也不是什么“象”。

他还有一个见解,Sein的本意是“是”,现在翻译成“存在”,就和Existenz不好区别。他主张一边译意,一边译音,最好就把它译成“然”,而“本质”这个德文是Dasein,他就主张译成“所以然”。

我同他还谈克罗茨维奇的《战争论》。他是很健谈的。

40·10 陈云小组和洛甫小组

我一直怀念1940~1941年延安的几个读书小组,特别是陈云小组和洛甫小组。我曾经把它们称做“读书会”。现在觉得这个名称并不很确切。在“一二·九”后抗战前,上海、北平、广州等地用组织起来阅读进步书籍的办法,来影响倾向革命的青年的工作方式和组织形式,提高他们的觉悟。当时把这样的组织形式叫做“读书会”,那是非常确切的。而我现在讲的,还是用读书小组称呼比较合适。

由于我的工作岗位——在中央青委宣传部做文化工作的便利,我同时在好几个地方参加这种有组织的读书活动。这些读书活动虽然不是我组织的,但是我也算做是我的工作,一种了解情况、吸收经验的工作。

我参加的读书活动由于主持者不同而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首先是陈云小组。这是陈云作为组织部长,组织部内的

干部进行读书的一个小组。但是我以青年文化工作的名义也参加了。

陈云的这个小组选读的书,是艾思奇、吴亮平合著的《唯物史观》。地点就在中央组织部内。参加者主要是中央组织部的比较负责的干部,人数只有十几人。读书的方式是,由于书不厚,也很简单,就指定一位同志读,读一段议论一段。主持这个读书活动的就是陈云同志本人,他也是读书小组的主要发言人,讲的也最多。他讲话总是把中心抓得很紧,语言简练,思想深刻。在会上我特别喜欢听他的发言,别的同志也发言。直到把这本书读完,说是再找第二本书,可是我的工作有了变动,没有再去联系,不知道这种方式是否继续了下去。

其次是洛甫小组。这个小组选读的书,是米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沈志远的译本,重庆中苏文化友好协会出版的。地点是在兰家坪(中央宣传部的所在地)山下的一个小礼堂。参加的人主要有中央宣传部的干部(洛甫是中央宣传部的部长)、马列学院的干部。人数比较多,每次都在三四十人以上。读书的方式是事先确定讨论这本书的某章,要求大家事先就这章作好发言准备,然后在会上发言。每次会发言的人不少,也许是因为宣传系统的人都很会讲话,一套一套的,同参加陈云组织的小组的情况不一样。发言者当中,我印象较深的是张凌光,倒不是因为他的内容有什么特别,而是他每次必讲,而且声调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发言中间或最后,洛甫也作系统发言。这个读书小组也是每周一次,从不间断,洛甫本人也每次必到。这本书的部头太大,有二三十

章,我也每次必到,但因为后来工作变动没有读完这本书。

这两个小组给我的印象最深刻。我认为它们共同的优点有三个:一是切切实实地学,虽然陈云小组和洛甫小组读书的方式很不相同,但是认真读书这一点是相同的;第二点是每个人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受拘束,不同的意见自由争论;第三是负责同志真正亲自参加学习,在学习中同大家处在完全平等的地位,而且做到一直坚持学习。这最后一条大概就与延安的地位特别稳定、工作不那么繁忙有关吧!

那时艾思奇、温济泽在中宣部工作,洛甫小组的工作就是由温济泽协助艾思奇做组织的。我也就在那个时候认识了温济泽。对这个小组的活动,我曾经和温济泽交换过意见。后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艾思奇和温济泽就调去。艾思奇是这个报纸的副刊主任,温济泽我记得是副主任。他们离开中宣部的时候,我也不再去兰家坪。以后那儿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

在这两个小组以外,据我所知还有一个《资本论》学习小组。地点是在八路军军政学院,主持这读书活动的是张如心和何思敬。这个读书活动同上面两个不一样,不是由党中央的首长主持,而是学者自己主持的。这个《资本论》小组我就没有参加多少次。在会上见到过郭化若和和培元。

除这之外,我还听说王明在中国女子大学也有一个读《资本论》的小组(当时王明是中央妇委的主任),对这个小组的活动,我没有参加,没有确切的了解,也没有去过。

1940年在延安中央机关普遍开展起来的读书活动,是党

中央统一的部署,那时在延安的中央机关,还有王家坪的中央军委,朱德、王稼祥就在那里;还有设在枣园的康生领导的安全部,这两个中央机关的情况,他们是否成立了类似的读书小组我没有了解到。

我虽然对这些读书小组都有兴趣,都想了解,但是所有这样的读书小组都参加,我没有这个时间。

40·11 “《自然辩证法》读书小组”

在众多的读书小组当中,我也建立了一个,我发起成立并主持的这个小组用的是“《自然辩证法》读书小组”的名义。这个小组也是每周举行一次学习,地点就设在中山图书馆。这个小组采用的又是一种读书方式:(1)以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作为学习材料,目的是学自然辩证法,但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没有中译本,大家没有法子学,因此就用《反杜林论》的序、引论和哲学部分的十一章作为学习的主要资料。(2)读书的方法是一章一章地读,但是每次只读一章的一部分,每一章要读好几次。(3)读之前先由我根据恩格斯的德文原著,提出改正这本书中译本文字的意见,大家讨论同意后,就在每个人带来的那本《反杜林论》中译本的书上进行修改。(4)然后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议论,弄清楚恩格斯著作的原意。(5)按照我事先拟定的每章的讨论大纲,进行离开书本的讨论和发挥。这样的讨论大纲,我一直带在身边。到解放后我手边还保存了几份。后来延安大学要搞博物馆时,

我送给了他们几张,我这里应该还保存有几张。

这个读书小组参加的人不多,主要是青委系统中对哲学有兴趣的同志,如陈元晖(那时他叫薛尔)、邓照明(他是和胡绩伟一起来到延安的四川大学的党员)等以及自然科学学院的同志。不过谁来过谁没有来过,谁来得多谁来得少我记不清楚了。在边区政府工作的力一是我的老朋友,他来过多次,这是我记得很准的。此外还有哲学界中对这个读书小组有兴趣的一些同志,艾思奇同志就是一个,他也到这个小组来过好多次。特别值得说一说的是徐特立,他几乎每次都到。他在自然科学学院住,在南门外的杜甫川,我们的会在北门外的大砭沟,每次他都骑了马从南门来。不必说每次徐特立都积极发言,他真是我们这个读书小组的积极分子,在这里还值得提一下的是,有一次朱德同志也到会,他同别的同志一起学,一起讨论,不过我记得他没有很多的发言,他大多只是提出几个问题,要求别的同志发表意见。

在1940年11月我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人商量,还在大砭沟开过一次座谈会,讨论“工农业科学的应用”,中山图书馆请各工厂的人介绍边区工业中如何运用科学知识的情况,这个座谈会不是“《自然辩证法》读书小组”的例会,但占用了那个时间,参加读书小组的人也都到了,我有意识让搞自然辩证法的同志接触些实际。

这个学习小组在延安学自然科学的同志中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它一直坚持到我离开中央青委,那是1941年的事了。

40·12 学做一点翻译工作

我从1940年4月起开始学习做一点翻译工作。最初的目的是温习一下学过的德文,中山图书馆有阿铎拉兹基主编的马恩全集的德文版,其中有一卷中收入马克思写给燕妮的情诗。我就一边朗读一边试译。那时我和童大林同住在中央青委的一个窑洞。他对这一点记得很清楚,我倒一直没有回忆起这样的事,经他一提醒,我就把这件事回忆起来了。译稿当时没有保存,若保存到现在也一定是译得不像样的东西。自己不会写诗,当然是一定译不好诗的。

接着翻译的是《反杜林论》的哲学部分。准确地说不能说是“译”,而是“校”,因为那时我手边就有吴亮平从英文译过来的中译本。应该承认这个译本还是不错的,是可用的。但是我对它还是不满意,认为有不少译得不够准确的地方,于是全部重校一遍,就改在吴亮平的书上,这个工作后来就同我主持的那个《反杜林论》读书小组联系在一起了。在写对延安读书小组的回忆文章时,我就讲到对这本书的校译和在读书小组上对它利用的状况。经过我校译的那本《反杜林论》不知什么时候也丢失了。

接着我就翻译《自然辩证法》。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同《反杜林论》在《马恩全集》中是同一卷。我翻译这本书并没有要出版的意思,只是认为它很重要。这个学科又正是我最有兴趣的学科之一,所以就动手翻译。在翻译了一段时间之后,陈

友群同志从大后方来(后来他长期担任朱德同志的秘书),他看我正在做这个翻译工作,就送给了我一本神州国光社出版的杜畏之的中译本。这个译本根据的是阿铎拉兹基之前里亚扎诺夫主编的德文本。里亚扎诺夫编得就很乱,而杜畏之译的质量实在太差了,更增加了自己对恩格斯这本书必须认真翻译的决心。

我虽然并没有把这件事当定期完成的工作任务来做,但是在桌上经常放着那个大本子《马恩全集》和德文辞典,有一些时间就译几行,不赶什么进度,但也从不间断,日积月累,许多篇手稿、若干段笔记陆续翻译了出来。

记不起受到什么启发,我把从猿到人的那一篇译文,给了《中国青年》,那时许立群和韦君宜在编这本杂志。由于我对自己的译文没有把握,请景林同志校对了一下,发表在《中国青年》第三卷第1期上,时间是1940年11月。

我在延安没有把这部著作译完,但是这译稿没有丢掉,一直带在身边,带到建国后的北京。建国后,我这个译稿就开始发表,后来又与曹葆华、谢宁等合作,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建国后第一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译本。

40·13 我在延安的读书生活

1940年起,我仿佛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院。延安有一个名叫马列学院的干部学校。1939年我到中央组织部报到时还提出过想去那里,幸亏没有去成。其实我是一向不喜欢

进什么学校,而是喜欢自学,“独来独往”,也喜欢“半工半读”的。刚到延安我在中组部所作的表示,那完全是没有好好经过思考。

1940年的实践,使我感到整个延安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1939年我还没有开始我的这种学习和研究活动。1940年可以看做我在这个研究院的第一个学期,1941年便是第二个学期了。我觉得这样学习更自在、更丰富,更能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延安的学习条件应该说是非常理想的。

首先,在延安集中了一批学者和比较年轻的翻译工作者,在做翻译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那几本主要著作(《资本论》除外)都有中译本单行本。整套的《列宁选集》也一本一本地译出来。延安的印刷条件当然比较差(不过那时候在这方面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未见得比延安好多少)。纸是用草为原料。技术工作者华寿俊同志用陕甘宁到处生长的一种野草“马兰草”造纸,解决了边区自己造纸的问题。印刷也差。但是那时大家都年轻,阅读起来并不特别吃力。

其次,我在延安有的是空闲时间。像我这样的工作岗位,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是在几乎不受限制的范围内自己开展工作。而我本来就是一个喜欢自己去找工作的人,我就去找文化学术内涵特别丰富的工作,使我所喜欢的工作和我所喜欢的学习完满地结合起来。就学习时间来说,白天的时间固然可以充分用来进行学习,晚间还有许多时间可以利用。加上

延安没有什么会议要我参加,也没有什么社会活动,又是个单身汉。这样空闲的人,恐怕也是少有的。

第三,延安有很好的学习和讨论空气。不仅在那些读书小组里讨论,同志们见面也常谈论理论问题。延安除了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外,还是一个储藏和培养大量革命和建设干部的地方。

第四,我还是延安中山图书馆主任。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当然不能同北京图书馆也不能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图书馆相比。但是这些图书馆都在沦陷区,当然我利用不上。在抗日战争中可以为研究服务的,我想不出有比我这个图书馆更好的。而且这个图书馆的藏书有它的特色。我认为全中国图书馆只有这儿会有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总之它非常合乎我当时学习的需要。而且我是中山图书馆的主任,无论我想看什么书,想在什么时间看,一点困难都没有,也没有什么人同我抢书看。因此可以说我是受这个图书馆恩泽最大的一个人。

还可以说一点毛泽东,这时候他处在思想上创造力旺盛的时期。他在1940年初所作的《新民主主义论》,非常出色;他对中国将会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见解应该说是具有大胆创新勇气的理论工作者的榜样,对我有启发和帮助。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一篇一篇重要文章的发表,既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学习材料,又为我们树立优良的学风,尤其是1941年的《农村调查的序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那是指导大家学习的。同时党中央也根据毛泽东的思想作出了

《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等。

我就有这样的条件,集中力量不受干扰安安静静地高效率地学了1940这第一个“学年”,并且在1941年继续第二个“学年”。

我读的书,主要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延安出的书,我弄到一本就看一本,看得很认真;看过一遍又一遍,看了还做笔记。《反杜林论》我还对照德文原本读,一个一个字眼抠,而且我还很注意联系实际,不喜欢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

不知道为什么我手边还能保存着不少当时读列宁《做什么?》(现在译成《怎么办?》)、《两个策略》(现译成《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的笔记。翻了翻那时候的笔记,的确只能是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人的水平,但从中可以看出我是用什么方法在学习。

以读《做什么?》这本小册子来说,我对书中五章二十二节加上从序言到结束语,每一节都做了笔记,一共写了二十四段。每一段除了记下书中的要点外,都写了在理论上自己的心得和提出还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那时我还在记“学聪明日记”,学聪明的意识比较强。把在读书中学到的聪明写到日记中不那么方便,就记在笔记里。我在书中找方法,找书的作者——他们当然是绝顶聪明的人——如何运用方法来思考问题。

比方在那个读《做什么?》序言的笔记里,我就提出关于写论辩的文章的问题。我认为写论辩的文章比正面叙述更为生动、深刻,但似乎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应该用论辩的方式写文

章,在这里既有原则性的问题,也有策略上的考虑。我从文章中看到列宁在对付他的论敌的时候,很注意对论敌的力量进行估量。我在笔记中写了一下从哪些方面看这种力量。一、要正确掌握它的阶级基础;二、要看它是否在当前种种形式中复活起来;三、来势如何,是否有生气;四、对作为思想的物质基础的群众的影响大小。接着这个思路,在读第一章“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中的第一节“什么是‘批评自由’”时,我就接着提出“怎样具体分析一个新思想派别”的问题。并且注意到列宁所指出的所谓“新批评派”是受到资产阶级式的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教育的一批知识分子,因此是用不着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和形成的,指出他们的著作实质上是直接搬运。我还想联系实际要对今天中国的种种思想进行正确的估量和对中国各种思潮进行具体分析。

我不想在这里对这一本笔记再多做介绍,总的说来,我已经说过是比较幼稚的,但是认认真真写了这个读书笔记,总思考了一些问题,其中有些现在都还是问题,比方在读《序言》时我提出一个“对历史的认识”的问题,我说“历史是前进发展的,是积极的。但有些‘历史’是消极的,是历史中的‘逆流’。对积极与消极都要有正确的认识与估计,才能以积极来克服消极。对积极事物的‘看法’与消极事物的‘看法’有同一性,但也有判别性。要注意辩证唯物论在两种不同情形中的运用”。

我相信在学习中,投入了劳动或多或少总会有所收获。

(三) 1941 年

小 引

1940年可以概括为我的学习年。学无止境,在那一年我还想过当年我上的是我的自修大学的第一学年,而1941年就是我上的这个自修大学的第二学年。我完全没有想到1941年发生两件大事,使这一年我的学习和生活同原先所设想的很不相同。这两件事,一是青委机关的同志在青委山下大砭沟口办起了一个墙报《轻骑队》,我是这张墙报的发起者和主要作者之一;一是党中央决定我们青委机关的干部——包括青委的负责人,要输送到党的其他部门去(李昌就被输送到第四野战纵队,胡乔木被输送到毛泽东那里去当毛泽东的秘书,许立群被输送到中央政治研究室,李锐被输送到延安《解放日报》……),结束了我们许多年从事青年工作的历史。

因为1941年有这样两件大事,这一年我的编年故事,也就应该分做两个部分,上半年我还在中央青委,下半年写的就是我离开青委机关到新的工作岗位——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局做研究员后的故事。但是,也还有一些事情,比如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工作还在进行,所以在1941年只能讲这个会的第一年的工作。

41·01 1941年的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工作

1940年开始的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工作,在1941年得到比较大的发展。

主要的有两件事。一是举行了这个研究会的第一届年会。这次年会不但开得很隆重,而且解决了研究会工作中许多实际问题,对研究会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推动。

会议开了三天。

1941年8月2日是第一天,开到8月4日结束。参加这个会议的科学工作者有一百八十多人。开幕那天还到了二百多位来宾,规模是不小的,会议第一天,会长吴玉章致开幕词,屈伯传报告会务工作,朱德、徐特立都到会作了演讲。朱德的讲话用了一个《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庆祝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的题目,内容是要求大家继续研究,通过服务边区经济建设来为抗日战争作出贡献。这个演讲全文在第二天8月3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徐特立的讲话主要讲科学工作者要采用各种方法进行研究。

8月3日是这个会议的第二天,通过了许多提案。其中有成立各种学会的提议。这个提议很快付诸实施。从1941年10月起陆续成立的学会有地矿学会(负责人武衡)、机电学会(负责人阎沛霖、聂春荣)、化工学会(负责人李苏、董文立)、军工学会(负责人江泽民、徐驰)、冶炼学会(负责人柴天宇、陈凌风)、医药学会(负责人马荔)、土木学会(负责人丁仲文、武玖)、物理学会(负责人力一)。这些学会人数虽然不多,但都做了一些对边区有益的工作。还提议出版科学杂志(后来就出了《解放日报》《科学园地》副刊,设立了延安气象台)。这一天还通过了《告全国科学界书》和《致苏联科学界书》。

8月4日是这个会议的第三天,进行各种科学报告。地矿学会作边区矿业报告,力一和孙霁东作关于边区工业概况的报告,江泽民(不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而是另一位)作苏联工业概况的报告,姜齐贤作八路军卫生工作的报告,柴天宇作边区植物分布及特点的报告,华寿俊作纤维技术的报告,徐文杰作酒精蒸馏问题的报告,程明升作科学和敌后科学界的报告等。大会还特别邀请徐特立作科学和教育问题的报告,李富春作财政经济政策的报告。

这次年会又讨论研究会的一些组织问题,在执行委员会外成立了干事会,并充实了驻会干事会。干事会成员中基本上是驻会干事会的那些人,但有艾思奇参加。艾思奇不可能像驻会干事那样工作,但是他对自然科学研究会热心,1936年上海自然科学研究会就是他发起的,他有时还能参加些研

究会的工作。我们提议他参加干事会,他也没有推辞。

《新中华报》对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工作是一直支持的,在《新中华报》上做过许多次的相关报道。1941年1月延安《新中华报》和党中央党刊《解放》周刊停刊,创刊了一个《解放日报》。《解放日报》创刊后,发表了很多次自然科学研究会的消息。如5月28日报道“陕甘宁边区生物采集团”已获得标本二百件。6月12日社论:《提倡自然科学》。

8月自然科学研究会年会开始,报上从2日到5日,连续报道了这个会议的消息:8月2日报社发表了社论“祝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开幕”;第二天即8月3日报道年会首次集会和朱德的文章《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庆祝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4日报道自然科学研究会年会继续开会,通过成立各种学会、气象台等提案,致书苏联和全国科学界;5日报道自然科学研究会年会第3日进行的各种科学报告。

以下是见诸报端的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的一些活动。

8月19日“陕甘宁边区生物采集团”再次出发。

8月20日延安地质学会建地质陈列馆。

9月延安可以看到日全食的现象。配合这种情况,自然科学研究会举办关于日食的一些科普讲座,9月1日发表胡家鸿(这是于光远的一个笔名)的《日食在科学上的意义》,17日发表俞仲津(也是于光远的一个笔名)的《关于日食的一些科学知识》。

9月18日“今年的日食”。

9月20日“日全食,全食三百年所未有”。

9月20日“日食期间,各地广播发生障碍”。

9月22日报道延安自然科学会“昨日”观察日食。

9月21日陕甘宁边区地质考察团出发。

9月22日延安小便沟发现“化石”古物。

9月24~26日徐特立《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

9月28日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电贺中苏美英四国科学会议。

10月4日林山《边区的黄土》。

10月18日关于1940年延安的雨量。

11月1日《解放日报》上开辟了由自然科学研究会主编的《科学园地》,这个副刊两周一期。在创刊的那一期上徐特立写了《祝〈科学园地〉的诞生》。在创刊号上,还发表《发掘我们的错误和缺点,把它抛出》一文。

11月1日陕甘宁边区地质考察团总结工作,定次日出发兰中晋西北。

11月6日延安成立生物学会。

11月7日陕甘宁边区数理学会成立。

11月8日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机电化学学会,确定目前研究中心。

11月28日延安市地质考察团出发。

11月28日发表江泽民、徐文杰的《经济建设与科学技术》。

11月29日发表赵一峰的《发展边区科学事业》。

12月13日发表苏联科学院院士奥巴林所写的《地球上生命的起源》译文,是于光远译的,署名丁明。

从这些报道来看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是一个很活跃的团体。

附带讲一讲1941年我和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的关系。

自然科学学院是我在延安时常去的一个地方。

我还没有离开中央青委,住在北门外,离自然科学学院所在地的南门外杜甫川口比较远时,我就常去。那当然是步行。不过年轻的时候来回走二十几里路似乎不算什么一回事,而当我调到西北局之后,我住在采石砭,就同杜甫川很近了,去的次数就很多了。

我不是自然科学学院的人,但是自然科学学院的事情我知道的不少。在自然科学学院工作的同志的学历同我差不多,都是抗战前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学学理工科的,共同的语言很多。他们又都是自然科学研究会的联系对象,其中几个主要的负责人又都是自然科学研究会的驻会干事,自然科学学院的许多事他们都对我说。徐特立也很爱给我讲他对自然科学学院工作中的问题的见解,同我讨论。我有时也就发表一些意见。见面时,科学、哲学、教育各方面都谈。不过自然科学学院副院长陈康白不同我讨论问题,我也不找他。人们说,他不喜欢和学自然科学的人讨论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我也有这种感觉。那时自然科学学院开始招第一期学生,这期学生原来的学历比较高,有高中以上的程度,进自然科学学院就是“本科生”,但人数不多,回想起来有三十来人吧。本科分三个系:物理系系主

任阎沛霖、化学系系主任李苏、生物系系主任乐天宇。孙鸿儒从八路军军政学院调到自然科学学院后就教本科的高等数学，上微分方程。有几个月他病了，我就做他的代课教员。这门课所有的同学都学。我的印象也就是三十来人（这应该是第二学年的课程）。由于去上课，还由于我去自然科学学院跳舞，我不但同那儿的教员，就是同这一级的同学们也慢慢熟悉起来了。我现在记得起来的这一期的学生的名字，不用回忆就能说出的有胡骑（后来在新华社工作）、沈平（后来当过大使）、何华生（后来当过电子部副部长）、任炎、寒冰（后来是孙鸿儒的夫人）、黎扬（后来是陈康白的夫人）、杜芳（后来是孙宗逊将军的夫人）这些名字。这个班我记得只有三位女同学，名字我全记住了。

自然科学学院的水平当然不如我上过的清华大学，甚至连大同大学都不如，差得相当远。但是学生的年龄都比较大，学习的自觉性强，政治觉悟高，联系实际观念明确。在全国解放后许多人就成了相关科学技术部门的负责人。

在招收第一期学生后接着招第二期同学，仍在杜甫川院址学习。这第二期人数比第一期多，年龄比较小，对这一班学生我就不很熟悉了。我只是在抢救运动期间听过自然科学学院开的会。在这期学员中我只认识严慰冰同志（陆定一同志的夫人）的四妹，因为她同严慰冰和她们的妈妈是同我共坐一辆载重汽车从西安到延安的。在抢救运动后的甄别审干结束后，自然科学学院又搬到北门外，又招过几期学生，我就完全没有接触了。一直到日本投降之后，延安大学组成一个大队从

延安出发去张家口时,我才同那个学校的部分同学有些接触。

41·02 不习惯这个“官”字

现在回过头来写有关《轻骑队》的事情。先写一下我之所以成为这个墙报的积极分子的思想状况。

我在国民党统治区搞了两年多党的工作之后,来到了延安,我感到非常愉快。延安毕竟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人民能够呼吸到自由民主的空气,也有一种充分的安全感。但是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渐渐产生了一种与延安这样的环境不能很好适应的情感。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从在1937年初到1939年夏的两年多当中,我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不断地变换自己的工作地点和工作岗位,一直处在波动的状态之中,工作也非常紧张。有一件事可以说明那时我紧张的程度,一次在武汉牙痛,我没有时间去医院,就到街上贴有镶牙补牙字样的店铺里去拔牙,结果把牙根几乎原封不动地留在了那里。到了延安,似乎一下子静止下来了,非常之不习惯,这是一方面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在国民党统治区我是做党的群众工作的,生活在群众里,虽然从1938年开始我是长江局青委委员(还当过几个月的长江局青委书记),但是我整天同一般的党员和非党员的群众在一起,又同国民党统治区各方面的人士接触,党员们就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而且和他们躺在一个通铺上。可是到了延安,我就住在机关,过机关工作的生活。大概

机关工作就有机关工作那一套方法,我也很不习惯。还有,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之间,可以说是完全平等的,大家都在干革命,领导与被领导只是工作分工不同,并不是社会地位的高下。那时我们没有什么地位观念,至少地位观念是很不强的。在那里我们仍说到“官”,但说的都是国民党的“官”。“官”在我心目中是个不好听的词儿。可是在延安,即便不是军事机构,也有“首长”这种称呼。口头上“官”这个字眼也不避讳。当官、官大官小的观念相当地“浓”。党内谁谁得到提拔、谁谁得到适当职务这样的话,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时,我并没有听说过。在延安虽然说得比现在少得多,可是有时可以听到,觉得刺耳。我感到在上面做领导工作的人,似乎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官”气,在下面工作的人也有的一种把上级领导看成“官”来对待的想法和做法。同志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时的同志们之间那么自然。在这时候我还不es敢、也不愿意说在延安存在“官僚主义”。但是在我头脑中“官僚主义”这四个字时有出现,在感情上使我不舒服。应该说那时我对延安的社会和战争生活存在某种不适应是意识到了,但是并不强烈。我对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就开始注意观察研究。

41·03 1941年的《轻骑队》

今天对1941~1942年延安《轻骑队》的事迹能写回忆文章的人还有几个,但是很少了,我是其中之一。1941年《轻骑

队》的创办及到 1942 年产生的一个小小的风波,可以算作延安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件值得说一说的事。我希望现在能多有几个人来写这样的文章,把写出的文章编成一本书,为研究者提供第一手资料。再过十年,我想能写回忆录的人恐怕会很少很少了。

我也可以算得上最有资格写这段历史回忆录的人中的一个。为什么能够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我是《轻骑队》这张墙报的发起人之一,那时我还在中央青委机关工作;同时我又是青委机关里在这张墙报上文章写得最多的一个人。后来我离开青委机关去了西北局。在这之后我就不再与闻《轻骑队》的事。这一阶段的事,童大林同志最了解。那时他是组织上确定的这张墙报的负责人。讲这时期这张墙报的事,他是权威。但是我还是关心《轻骑队》的。有时还能听到一些有关它的情况,我会特别注意。

后来——这时候已经到了 1942 年,《轻骑队》被停止和受批评作检讨,身在延安的我,就有所闻。延安整风中,当时中央青委机关负责人蒋南翔,在杨家岭口外青委机关召集老青委机关参加过《轻骑队》活动的人开会,传达党对《轻骑队》的批评,并且要大家发表意见的时候,我出席了这个会议。对这会议的情况我还能够记起一些来。因此我不得不说,我也可以算得上最有资格写延安《轻骑队》这段历史回忆录的人中的一个。

但是我毕竟只是最初发起办这个墙报的人之一,并且不是最主要的发起人,在我参加议论时,早就有人议论一阵子

了,最早的情况我就没有亲历。而《轻骑队》后半段,我又没有参与。对整个《轻骑队》的历史,我也没有专门作过研究。现在我打算做的只是讲讲“关于《轻骑队》的故事”,写一点我接触到的和现在还记得清楚的事情。

而且在这一节里我只写到 1941 年有关《轻骑队》的情况。1942 年的情况放在这本书的后一部分。

《轻骑队》是从 1941 年上半年起,张贴在延安北门外文化沟口中央青委机关所在地的一张墙报。《轻骑队》这张墙报就是这个机关中的一些青年人发起的。在我的记忆中,先于我酝酿这件事的有萧平、陈企霞、王若望三个人。萧平恐怕是发起《轻骑队》的一个人,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当时中央青委有一个小组在研究“青年运动史”,其中有研究苏联青年运动的。萧平似乎参加了苏联青年运动史的研究工作。他说苏联共青团里有一个专门揭露党和苏维埃机关中官僚主义的组织,它的名称是“轻骑队”。萧平他们并没有发起建立那样的一个组织,而是要办一张墙报,做与苏联共青团中那个组织同样性质的工作:无情地、尖锐地、辛辣地揭发和批评延安工作和生活中的不良现象。于是,这张墙报也就用了《轻骑队》这个名称。

创办这张墙报的人,今天有的去世了,有的还健在,他们的状况各式各样。在他们之间,政治观点上的差别现在也很大。但是当时彼此在思想上是很投合的。酝酿创办这张墙报的事情,在当时青委机关里完全是公开的。许多人都知道,七嘴八舌发表意见的人不少。因此很难说清谁参加发起,谁没

有参加发起。当然在与闻过这件事的人中,热心的程度是有差别的,参与此事酝酿的早晚和深浅不同。在我的印象中,提出这件事最早的人中有萧平,这是不会错的。可是他不久后去了前方,在前方他不小心枪支走火,自己把自己打死了。在最早提出这事的人中,陈企霞在谈论这件事的语气神情,我都还有印象,他有从事文艺工作的历史。我觉得他语言比较尖刻,也冷。我参加发起这个活动比较早。第一期就有我的文章。陈宇、许立群、童大林、李锐、韦君宜参加了这个活动,不过似乎时间略为晚一些。李锐、韦君宜当时写的文章不多。

我写的文章很多,在数量上如果不是最多的,也是最多的之一。我的文章数量虽然不少,但总的说来理论色彩较浓,平铺直叙,缺乏文采。我记得我在《轻骑队》“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的题目是《平凡的说教》。文章的内容记不起来了,但根据这篇文章的题目,它不会写得生动活泼是可以想见的。

许立群写的文章也不少。他会写文章,文采好,尖锐泼辣,所以他的文章的影响比我的大得多。以后批评《轻骑队》文章时,多次提到许立群的文章,而几乎没有提到我的文章。我在文章中并不是没有尖锐提出过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前几年在谈起当年《轻骑队》的事情的时候,有人记起在这张墙报上我发表过一篇文章,是对当时我们的报纸只登塔斯社的消息而不登路透社、合众社的消息表示很不满意,话也说得很尖刻,可是这篇也没有引起注意。人家不提我也忘记了。我的文章不能引起人们注意的这种弱点,可以说一直保持到现在。自从我提出来争取做“二十一世纪文坛新秀”以来,文学水平

多少提高了一些。也会说些俏皮话。如果我现在的文学水平放到1941年,情况就可能不一样了。

接着写办起这个墙报效率之高、速度之快,就甭提了。几个人一经决定,就有人动手写。有人“拼版”,有人抄写,有人制作一块木牌架在沟口(说是墙报,可是延安街头根本没有墙,因此就要制作一块大木牌),有人去张贴,一下子就“出版”了。那时候办事倒不需要经过现在这么多的手续。当时也没有“审查”一说,那时的中央宣传部也根本不管这种事情。如果有人要干涉我们,我们就会更厉害了。

没有想到,这张小小的、大约只有两平方米的墙报一“出版”,消息传开,延安许许多多人都知道了。住在文化沟口旁边的单位,近水楼台先得月,在黄昏时分到延河边散步的人,转到这木牌跟前先睹为快。就是远处的,在南门外靠近新市场、杜甫川的,在北门外靠近杨家岭兰家坪的人也老远过来看看这张墙报上都写了些什么。看过之后回去就讲。《轻骑队》的创刊成了延安“出版界”的一件大事。

这意外的成功使得创办这张墙报的人、这张墙报的作者乃至整个青委机关里的人都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对革命有益的事。一开头,青委的一般干部中喜欢写写东西的人,你一篇我一篇地写(我想可以向当初青委机关的人问一下,他们自己写过文章没有,还记得哪些人写过,都有些什么文章还能记得。比方说我就记得一些文章的基本内容)。由于《轻骑队》很快受到欢迎,影响越来越大,中央青委的委员冯文彬、李昌和胡乔木等也给《轻骑队》写了文章。最后,宣传部长张闻天

以洛甫为笔名写的文章也出现在这张手抄的墙报上。可惜张闻天写的那篇东西似乎没有保存下来,我们没有在他的文集中看到这篇文章。

为什么这张墙报会这么红火?

我在上一节《不习惯这个“官”字》中讲了我到延安一段时间之后的感受和产生的迷惑。后来我慢慢地了解到,比我到延安更早的人也有与我类似的思想。只是由于我喜欢作理论思维,我虽然有所不满,但是老是在思考。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里,看来“官”是少不了的一种人。这种“官”同国民党的“官”恐怕不仅有“异”,也不可避免地有“同”的地方。这一点当时还不知道怎样去想。因此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最早在行动上我是只放在观察和思考方面。我接触到机关最早的《轻骑队》的发起者,他们是“行动在先”的人。他们的不满使他们采取贴出《轻骑队》这样一件容易做到的行动。他们的“行动在先主义”感染了我,使我同他们一起行动,使我从“思考者”变成“行动者”。而延安的许许多多和他们有同感的人,就向我们青委机关的那些“行动在先主义者”欢呼。当然走到《轻骑队》跟前的人当中还有许多只是“观察者”,而不是“行动者”。

1941年中,大概有半年时间可以看做是《轻骑队》的极盛时期。

1941年下半年,党中央决定输送大批青年工作干部到其他岗位上去。青委机关的干部,包括领导干部,除留少数人外,多数人都调动了工作。有些人去了前方,有些人虽然留在

延安,但也被分配到非青年工作的岗位上。原先《轻骑队》的积极分子不再聚集在一起了,这个“民办业余报纸”眼看就办不下去了。幸亏暂时还没有调走的青委领导人冯文彬对这张报纸很关怀,不愿见它夭折,就决定把它当做青委的一个“业内”报纸来办,并且指定童大林负责。于是开始了《轻骑队》的第二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我就没有再参加《轻骑队》的活动,没有再给它写一篇文章,而且不但我是这样,似乎别的《轻骑队》“元老”也都是这样。我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在西北局机关工作,而其他没有到前方去的青委干部大都在中央机关工作。而且由于我住的采石砭地处南门外,所以关于《轻骑队》的消息可能知道得更少一些。即便如此,我也知道,在这个阶段,《轻骑队》已经能够靠投稿来出了,它不再是青委机关的同仁报刊。当然更知道童大林主持这个工作后,除出墙报外,还出油印本,而且把从创刊号到他接手以前的那些期,陆陆续续地补印成油印本,这样,读者面也更宽了,而且通过乔木(那时他是毛泽东的秘书)送给毛泽东看。我虽然对《轻骑队》情况了解得很少,但青委的老朋友见面时也总会谈到《轻骑队》。

41·04 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正当我们青委机关的同志对延安的社会生活有一种不很满意的思想并办起了《轻骑队》的时候,毛泽东正在回顾在十

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教训,为整顿党的作风和清算当年王明“左”倾路线做思想准备,一步一步地前进。第一步走的是,把当年在苏区所做的一些农村调查,整理出一个资料,和王明的主观主义对立起来。在这个材料整理出来之后,他写了一篇序言。写这篇序言的时间是1941年3月17日。

这篇序言我记得没有很快发表。后来发表之后,我们这些年轻人还是不那么敏感,没有了解它的深意。

说起社会调查,并不是只有毛泽东重视,也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对这一点,我还可以讲一点亲身的经历。1934年,我从上海转学到清华,大概是冬季,学校请到了李景汉(他是陈翰笙在美国的一个大学同学,是搞社会学的)在学校大礼堂做了一次演讲。这个演讲只讲了两个小时,但是我听了之后印象很深刻。他讲,你要向农民做调查,就要使得农民感觉到你是自己人,如果你高高在上,或者摆什么知识分子的架子,他就不想理你了。李景汉先生还举了一个例子,你到农民家里,他很客气地请你喝茶,而且用一块手绢把杯子给你擦一遍,然后给你沏茶。可是在一分钟以前,你就看到他用这块手绢擦鼻涕,他恭恭敬敬地请你喝,你喝还是不喝?如果你不喝,那他就觉得你见外了。你就要装着没有看到他的鼻涕一样,一口气喝下去。听了这个演讲,我才知道做农村调查这个事情不简单。

再往前说,1932年上半年,我在上海大同大学一年级的時候,就和同学程淡志一起,拿了笔记本到上海大世界游乐场,观察情况做笔记,本意也是做社会调查。

不过毛泽东做农村调查也还是有他的特点的。他是站在党的领导的角度,为了研究、制定党的政策而做的。他在这篇《农村调查》(序言)里说:这本书所进行的社会调查是为执行当时的党的农村政策而做的。现在要实行的虽然不是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政策,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但是还是要做好农村调查。“所以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

毛泽东还有一个创造是开调查会。他说:“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我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得来的材料,湖南的几个,井冈山的几个,都失掉了。这里印的,主要的是一个《兴国调查》,一个《长冈乡调查》和一个《才溪乡调查》。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

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开调查会的方法确实是毛泽东的创造。

写完这篇序言之后，到4月19日毛泽东又写了这本书的“跋”，5月在干部会上又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这样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也强调了社会调查问题，把它和主观主义对立起来。这个报告我还是没有能够听，但是知道报告当中对主观主义者讲了一副挖苦得很厉害的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最后在这一年的8月1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中写道：“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

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的存在着。抗战以来,我党在了解日本,了解国民党,了解社会情况诸方面,是大进一步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也减少了。但所了解者,仍然多属粗枝大叶的,漫画式的,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作风,并未彻底消灭。对于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

在决定当中要求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作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作为各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供给中央以材料。

我们青委的干部输送出去的人,大多数是调到调查机关。许立群就调到中央调查研究机构,我就调到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调查研究机构。

41·05 “土包子”和“洋包子”

这里讲的事情,发生的时间记不清楚了。我仔细想了一下,应该是在1941年,所以就记在这里了。

在延安有两种人,一种是参加长征过来的红军中的一些农民,原来没有机会学文化的农民,还有一些是陕北当地的干部;还有一种人是外来的知识分子到延安来参加革命。这两种人在延安相会,中间就发生一些问题。

那时流传得相当广的有一件撕窗户纸看月亮的故事——有一个参加长征过来的男同志与从国民党统治区过来的女孩子谈恋爱。到了中秋节女同志想赏月,这位男同志就把窗户纸撕掉。这位女同志问他:“你干吗?”他说:“你不是要看月亮吗?我们这里没有玻璃窗,只有把纸撕掉你才能看到月亮。”这事传开后,同志们就取笑这位男同志。

还有一种情况是当地的农民同志看不惯知识分子。延安的桥儿沟是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所在地,那里集中着许多搞文学艺术的知识分子。在那个单位里也有一些当地的人在那里工作,有的事情上有时他们就看不惯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是骑马回来不把马拴住,让马自由跑开;第二个特点是有意见不当面提,而是写条子,还有一条就是在发言完了之后,老是挂一句请大家批评指正。

讲笑话或者编笑话有时流露出一些倾向性,那倒是有的,但是今天看来编这种笑话是出于恶意。

在延安就常常听到不少有关“土包子”和“洋包子”的议论。“土包子”指的是前面说的第一种人,“洋包子”指的是第二种人。“土”和“洋”这两个字的意思本来是大家都清楚的。但是“包子”这个词的意思,至今我都不明白,说起来真好笑,“包子”这两个字我只是记音,究竟怎么写?是不是吃

饭的“包子”？好像不是。我也没有向人请教过，因而直到现在我恐怕还在写别字。

当时延安有这样两类干部是很明显的。他们有差别。事物有差别当然就有矛盾。这是哲学上的道理。上面说的那两类干部是有差别的，他们之间当然会有点矛盾。不过说实在的，在延安当时人们的地位观念比起后来差得远，有点矛盾也实在不算严重。

毛泽东认为这样的语言不利于团结，对“土包子”与“洋包子”就做了另外一种解释：“洋”不就是从外面来的嘛。两个地方的人看对方都是“洋”，“洋”是相对的概念。

上面讲了有取笑“土包子”的笑话，也讲了有取笑“洋包子”的笑话。我觉得应该多取笑一点“洋包子”，毛泽东批评知识分子不要看不起杀猪的，猪会跑，猪会叫，知识分子不会杀猪就是没有知识。我自己就认识到知识分子有时候真的没有知识，会成为工农群众眼中的可笑人物。

有几句大秧歌里的话“能读书，会打仗，八路军队伍人人强，谁说咱是个土包子，马列主义来武装”。这几句到现在我不但记得而且还会唱，它显示了“土包子”的自信和自豪。

41·06 西北局第四局

1941年9月中央青委把一大批青年工作者输送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去，青年工作毕竟应该是青年干部做的工作，年龄大一点就应该离开。

原先在青委机关的人分散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当然没有全走,冯文彬就暂时留了一个时期,武衡和童大林等也暂时留了下来。不过过了一个时期,冯文彬自己去了绥德,武衡去了科学院,就只剩下童大林等很少几个“老人”了。

那时中央为了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在中央设立了政治研究室,要求每个中央局设立一个调查研究局。因为是新设立的机关,需要从各方面调集人员,所以青委机关有的人就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而我就调到西北局调查研究局。当然也有的同志调到别处的,像李锐就调去了《解放日报》社。

各中央局的调查局,当时中央排了一个次序,西北局的调查研究局排第四,所以就叫做“第四局”。可是其他一、二、三、五等局,我一直没有听说过。

第四局的局长是贾托夫。抗战初期(也许抗战以前)他就是陕西省委书记之一。1938年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各位委员发表对保卫大武汉的意见。湖北省委也就以董必武为首的湖北省委领导人的名义,公开发表保卫武汉和湖北省的意见,登在《新华日报》上。这时候陕西省委也发表类似的意见,公开省委领导人的名字发表大西北的意见。那个公开出来的陕西省的领导名单,第一名是关锋,就是贾托夫。贾托夫后来到西北局当局长,就不再使用关锋的名字,而改回贾托夫的名字。贾托夫是个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第四局的副局长是杨清,他也是陕西省委委员之一,也在那个公开发表意见书上署名,他是紧接着关锋名字的第二个人,在西北局第四局时没有改名字。后来,杨清又改回他原来的名字欧阳

钦,在黑龙江省当省委书记。我的同学戴中宸同他结婚。陕西省委公开出来发表意见的,我记得的还有德生(后加一个姓“张”变成张德生),他是胡耀邦调去陕西省当书记的前任。他的儿子张凯是我的研究生,经常到胡耀邦同志家里,在胡耀邦同志下台之后,他还去那里,在胡耀邦所住的医院里谈论起我,并对胡耀邦在生活会上的所谓检讨提出了意见。可惜他在澳门一个人心脏病发作,病死在厕所里。很可惜的一个年轻人。

在保卫大西北的意见上署名的还有一个赵伯平,署名的一共有六个人,还有两个人的名字我记不得了。

第四局分两个研究室,边区问题研究室和友区问题研究室。研究的范围都是陕甘宁三省。边区问题研究室研究的是陕甘宁三省我们领导下的地区,而友区研究室研究的是当时三省国民党统治区下的地区。贾托夫和杨清分别担任边区问题研究室和友区问题研究室主任。

在边区问题研究室又设立经济问题研究组。这个组一共三个人:柴树藩、彭平和我。柴树藩负责这个组,他年龄比我大好几岁,在海关工作过,英文很好,中文也有比较高的基础。会拉胡琴,会唱京戏,也喜欢喝几口酒。彭平是清华同学,本名裴昆山,是一个办事对人非常热心的人。

我们三个一起工作很和谐。

在西北局边区问题研究室还有政治组。是谁负责我记不清楚了,大概也只有两三个人。有一个姓李的,年纪比较大,也喜欢喝酒。还有一个姓梁的,后来在内蒙古大学做历史学

的教授。

我到西北局第四局一开始工作就感到很大乐趣。在中央青委工作时,对陕甘宁边区认识的来源,只限于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一些实际,活动圈只是外来的知识分子。延安城在大轰炸后,市场从城内迁到紧靠南门外的一条沟里,那个地方就被人们称之为“新市场”。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1939年我到延安后也只去过两三次。陕甘宁边区的农村,也只是在1940年初到过一次枣园后沟(1940年元宵节第一次跳秧歌和过后几天听狼嚎的那个地方)。对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了解得很少。到了西北局顿时感到大开眼界。

从1941年9月到12月只有三个多月。我接触到陕甘宁边区的经济问题最有兴趣的是延安地区农村的互助合作。过去我一直以为农村互助合作是革命根据地中我们共产党提倡后才出现的东西,到那时候我才知道,它是一个古老的东西,甚至是非常古老的——原始社会残存下来的东西,也许这还是中国小农经济得以存在的条件之一,没有农民之间的某种合作,许多农民也许因为无法渡过生产的难关而不能生存下去。我对这个问题发生了很大兴趣,对陕甘宁边区农民之间的变工、扎工、唐将班子等认真地进行研究。我还认为在我们的政权下,可以把本来是在农民非常贫困的情况下消极地求生存的这种事物,发展成为富裕起来,进一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条件的组织形式。

当时延安南区合作社的经验也已经受到很多人的注意,那是商业、运输等方面的合作组织,这也引起我很大兴趣。

41 · 07 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一个争论

到西北局不久,有一次在西北局的干部学习会上,我发表了一些关于在执政党和国家机关必须坚决反对官僚主义,而且一定要采取发动群众来对党和政府机关监督的言论。我讲得相当长,而且感情上也激昂(这就是我在《轻骑队》的思想)。这样的言论如果在中央青委机关讲,我想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可是在西北局的学习会上——这次参加学习的人的层次很高,连高岗本人也参加了——我这个发言就使得许多人对我很注意。因为我到西北局不久,不少人还不认识我,我看到我发言时和发言后,人们在交谈,似乎都在问:“他是谁?”对反对官僚主义,倒没有引起别人对我的反驳。

接着我说现在人们都说(那时人们常说,而一直到后来也常说)机关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起“保证作用”,但是我认为这个提法不确切。我说保证作用的范围太宽了,要机关党组织负“保证”工作任务的完成和党的路线方针的贯彻,是对它要求太高了。同时这样说又不具体,没有告诉机关党组织应该具体做些什么事。我主张改变“保证作用”这个一般的提法,改为“机关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及时对机关工作中和机关生活中出现的不良现象,特别是官僚主义的现象,及时发出信号和警号,动员全体机关党员带领群众反对官僚主义”。

讲完这一篇话之后,大家就争论开了。连高岗也发了言,他对我的发言表示不同意。高岗同我进行讨论的时候,很激

动。他本来是抬着腿坐着的,后来就站起来,站在椅子上,他是西北局的书记,是陕甘宁边区最高的领导人。我这个人就是不管是谁,照争不误。到会的其他的人中,发言的人几乎全站在高岗一边。我对人们的意见包括高岗的一一回答。学习会当然不作什么结论,可是这一来,我在西北局的干部中就有了一种印象,至于什么印象我就不去管它了。

41·08 宝塔山后沟那个晚间的一件事

到西北局后有一天,我去宝塔山后沟的一个农村做调查。调查的内容我记不起来了,却记得一件悲惨的事情。

宝塔山后沟是一条很狭窄也很短的沟,沟内我记得只有一个村庄,而且这个村庄很小,只有十二三户人家。沟里的农民当然不会有川地可种,而沟内平整出来的地也没有多大,农民们都在山上种坡地。因此这个村的农民是相当贫困的。有些农民到新市场做点小生意。这个沟的地势比较陡,上下山的坡度比较大,从这个窑洞到另一个窑洞之间的路也很狭窄。我们是午前到的村庄,找了村干部谈了一下之后,决定开一个调查会,希望每户来一个人,以便我了解各户的情况和听到全村农民的意见,要开这个会,只有在晚间才能把人凑齐,就决定在晚饭后举行。

会是在一户农民的窑洞里开的,绝大多数户都到了。开会时已经开始下雨,后来就一直下很大很大的雨,我们就在窑洞里东谈西谈,了解了不少具体情况。会开了一大半,有一个

老头子说要出去一下,估计是要去小便。出去后他一直没有回来。不过我已经问过他的情况,便没有去找他。这么大的雨也没有法子找他。会议一直开到深夜,雨略微小了一点就各自回家了。宝塔山后沟离西北局很近,只有五六里地。不过已经很晚,还有雨,我就在开会的那个农民家过夜。

第二天一清早,也许天才亮,也许还没有亮,我就听见有人到这窑洞来说话,我没有在意。起床后房东告诉我出了大事,就是那个开会时出去的农民没有了。他没有回家,据人们分析,他离开会场是为了小便,准是一滑,就一直滑到山下去了。房东说他家里人也下山去找过,没有找到。这真是件不幸的事,这个农民是因为来开会而遭到了不幸,我很遗憾。

第二天我就回机关。过了几天,我专门到那个村庄打听这个农民的下落,人们告诉我在山下也没有找到他,而是在桥儿沟附近发现了他的尸体,原来被水冲走了十几里路。

陕甘宁边区的洪水真可怕,据农民告诉我这样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黄土下了雨很滑,如果没有什么灌木可以抓住的话,就会一直滑下去,而有时连灌木也会被人连根拔出滑下去,同时一个人也没有气力抓住灌木一直不放。

发生了那次事件之后,他们还告诉我一个重要的常识:有时虽然天气很好,但上游下了一场大雨,山洪暴发,当你在川里看到洪水来时,得赶快往旁边高处跑,到了高处就保险了。千万不要沿着川跑,洪水跑得比你快,一旦被洪水卷进去就没有命了。有了宝塔山后沟这个经历,我对延安洪水的警惕性特别高。

我的女儿去陕北插队,我特别给她讲了上面写的那段故事,传授农民逃避洪水的经验。

41·09 下乡琐事

1941年到西北局工作期间,下乡的次数就比较多了,还记得一些琐事。

一次去桥儿沟做农户调查,在一户农民家吃“派饭”(那时干部下乡,农民轮流招待),同时派到那家同我一起吃“派饭”的是《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孔厥。原来我不认识他,这次是第一次见面。这位老乡给我们吃的饭是上等的,是“扎面”,就是用白面粉和豆面粉混合做的面条(差一点的面食就是荞麦面,就是把荞麦面加水 and 成了面团,放在一个模子里面压。再差一点就是请你吃土豆和小米稀饭)。这家人的菜却是最一般的,一小碟辣椒面,一小碟细白盐。

正在吃的时候一条很大的狗走进窑洞。这时房主人正在用很长的一根旱烟管抽烟,就用这烟管头打了一下狗脑袋,说了一句骂狗的陕北话。我见孔厥马上就拿起笔记本把这句话记了下来。我一看,他那个本本上已经记了不少这样的话,原来这是他学习群众语言的一个经常做的工作。我心想怪不得小说家的语言这样丰富,原来他们就是这么一句一句积累起来的。

还有一次,我记不清楚到的是什么地方了。这一次是在农村住了一晚。在住进这个老乡家里之前,我就听说他年轻

的时候是个很会唱歌、跳舞的活跃分子。在我住到他家时，我就问起陕北一个小调“割韭菜”是怎么唱的。他说过去会唱现在忘记了。那天晚上他安排我住在里窑，他住在外窑。一清早天还没亮我就听他住在外窑哼了很久，足有两个小时。等我起床后他就对我说：“夜儿格（昨天晚上）你问的那个歌，我都记起来了。”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唱出来，我就记了下来，只是我不会记谱。我前一天其实只是随便问一下，没有想到他这么认真。我在陕北时收集的小调很不少。

41 · 10 在去柳树沟过延河的桥上

西北局给我一个任务，了解农业累进税的问题。要我去延安县县委所在地柳树沟做调查。

延安市和延安县是两个不同的地区，延安市的土地范围很小，主要是中央机关、西北局机关和延安新市场，延安市究竟包含什么地方，它的面积有多少平方公里，我说不上来。延安市的周围都属于延安县。延安县的面积很大。县委所在地柳树沟，就延河来说是处在延安的下游，过桥儿沟还有十多公里。我去的时候是骑马去的。到了柳树沟之后，正好有人去西北局，我就让他把西北局的马骑回去了。因为我在柳树沟需要工作一段时间，我不想把马留下来增加县委饲养员的工作量，也不想占用西北局的马太长的时间。

到柳树沟不久，有一天西北局来了一个电话，要我马上赶回去，说有事要同我商量。从柳树沟到西北局，大概有二十多

公里,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向县委借了匹马,骑着跑回西北局。

在西北局,要我处理的问题不复杂,下午我就骑了县委的马返回柳树沟。延河从清凉山到桥儿沟再到柳树沟是东西向,柳树沟在延河的南侧,要到柳树沟就要过延河。快到柳树沟,在延河上有一座桥,这时候天色已经到了傍晚,很昏暗,我从延河南侧骑马到了桥上,对面正好有一个老乡赶着两头毛驴上桥,每头毛驴驮了四根原木。彼此都没有看见,在桥顶上相遇了。这座桥只有两尺来宽,从桥顶到延河有大约四五米高,那时正值冬天,延河里水不多,已经结了冰。可是我没有本事下马,也没有本事让马在这么窄的桥上回头。我就说:“同志!你能不能让我过去?”他说:“你瞧!我赶的是两头牲口,它们驮了这么重的东西,能够回头吗?你只有一个人,一匹马,应该是你回头!”他说的道理是对的,但是我实在回不了头,他很生气,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像“真笨”“不会骑马就别骑”“没有用的东西”……我听了只有忍着,不敢跟他吵架。他看我实在不行,骂我也没有用处,就从那两头牲口旁边的桥上爬了过来,手上拿着马的勒口,叫着让马往后退的口令。马也知道这里危险,一步一步地后退。退到桥下,他一生气把马一推,马就跑了。马跑,我就追。马在田里跑,我看不清楚,地也不平,我去追它,不断地摔跟头,摔倒了爬起来再追。要不是因为马鞍子没有系紧滑到了马肚子下,阻碍了马的速度,恐怕我一夜也追不上它。追上了以后,我又骑上了马到了县委机关,把马还回县委的马厩,管马厩的同志看到马一身汗,对我很不满意,说:“同志!你骑马可是真快,让这牲口

跑得太快。你不该那么狠呀。”我真是没法为自己辩护,这是我一段难忘的经历,一个没有用的知识分子的经历。

41·11 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日子里

在这一节里,我想讲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有关籽粒苋的。这件事情很重要,直到现在我还在抓。原来苋菜籽是拉丁美洲的主要粮食作物。后来欧洲人去了,就把这种粮食淘汰了,用大颗粒的麦子代替了小颗粒的苋菜籽。有一年南北美洲大旱,大颗粒的小麦几乎颗粒无收,于是美国的一个研究所就专门研究籽粒苋,培养出了新的品种。一株籽粒苋种子成熟的时间很集中。我们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有两位专家到美国发现了这个事情,把这个籽粒苋的新品种引进到国内。这是一种耐旱、耐瘠薄、高营养的农作物。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中国成为籽粒苋产量最大的国家。我为这件事情写过文章,农科院的同志还写了种籽粒苋的手册。在我支持籽粒苋的工作时,我就想起我在延安的那段经历:

1941年夏天,边区政府找了各县的县长开会,一个雷把开会的一个县长打死了。老百姓反映:“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毛主席听了这个反映说,那是因为我们收的公粮太多了,两年翻了两番。于是提出了“精兵简政”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毛主席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

我热烈拥护这个政策,同时,我又是一个爱动脑筋的人,

希望能够想出一些新的办法,也许可以说是“投机取巧”吧。有一天我看到延安的新市场上卖的麦芽糖,糖外面粘的不是芝麻,一问,原来是苋菜籽。一问价钱,一升苋菜籽比一斗小米还高,就想起在我住的西北局窑洞顶上的山上,就有许多苋菜,我没有费多大的劲,就把山上的苋菜拔了许多,堆到窑洞前的场上,一打就打出大约有两三斗的苋菜籽,我想这次我的财是发定了。没有想到拿到新市场,别人一看,人家只要白的,我的是把白的和黑的混在一起了,一钱不值,只有倒掉。

我还做了一个试验,取出两饭碗苋菜籽,到下面杜甫川去洗,洗了好久,然后放在锅里煮,煮出来后很黏,放了糖,非常好吃。就是因为苋菜籽太小,把苋菜籽打下来的时候是在地上打的,没有采取特殊的措施,洗了许多遍,还是没有把土洗干净,吃起来牙碜。

我这个经历很重要,以后我大力提倡籽粒苋的感性认识就是从这一件事中获得的。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光华农场的事情。就在延安实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时候,杜甫川里头新建了一个光华农场。场长陈凌风是个畜牧专家,建国后是我们农业部的畜牧局长,他的夫人朱明凯是学园艺的。光华农场有许多优良品种,它的产品在延安新市场上是买不到的。于是我向他们提出,参加这个光华农场的劳动。他们也正好缺少人手,对我很欢迎。我给他们打工,他们给我实物报酬。拿回来的蔬菜给机关食堂,受欢迎得不得了。

陈凌风同志是我在岭南大学的校友,比我高一两届。我

们谈得很投机。光华农场集中了许多来自大后方的农业专家,这些人也是我搞自然科学研究会联系的对象。这也是我常去光华农场的—个原因。

第三个故事,就是我想当—个“劳动地主”。

在西北局所在的采石砭旁边有—条川,叫做杜甫川。杜甫是唐朝最有名的诗人之—。这条川为什么以杜甫这个诗人命名是有说法的,当时听人说过,可是现在记不起来了。在这杜甫川口,北侧有—个大砭石。这地方就叫采石砭。砭石上面的那个山头就是我们西北局机关的所在地。进川后北侧那—大片窑洞便是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的所在地。从自然科学学院再朝西走,有—大片地,从1940年起就开辟了—个光华农场。

在杜甫川口有—块荒地。它的面积大概有—亩,我就动了脑筋,到那块地上把地里的石头—块—块地挖走,把它改成耕地,变成—块川地。与山上的坡地相比,那真是高产田,再加上我从光华农场取回的优良品种,种上改良的蔬菜,如果成功,我的收益会不得了。怕的是发大水,—次大水,整个的地就完全没有收入,而且地又会变成荒地。不过我想冒—下险,如果不发大水,我就会发—笔大财。我决定不去管来不来大水,还是先把这块荒地开出来。我不想拥有这块土地的所有权,我只希望有收益——这块土地上的全部收益。这样我就成了这块地的事实上的“主人”,我称我是个完全不剥削人的“劳动地主”。因为在这块地上,我所得到的是我自己的劳动果实。我从事这项劳动,当然是在业余时间,在大清早、晚饭后和星期天进行。晚饭后机关的同志到那里散步看我在干

活。陕北老百姓把劳动叫受苦,我可乐得欢。

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中,我还是赚得了一些钱,我的第一部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就是用我自己劳动的收入买来的。这部《资本论》后来捐给了延安大学,作为珍品收藏和展览。

附带记一笔,1942年我从绥德、米脂搞调查回延安,快到春耕季节,那时候延安大生产运动已宣传得热火朝天,我不但对这件事很热心,积极从事这方面的活动,而且利用我具备的一些优势干得很有特色,在我的这块土地上劳动。这时候各种议论都有。主要的议论说我这是白费力气,是冒险的行为。只要当年大水不冲掉,我就可以有很好的收获。别的同志只是在自己窑洞门口种一小块地,一个半分地都不到,哪有我这么一大块川地。也有人赞成我这么做。

开这块地我花了很多时间。我开始动手比较晚。当年播种已经来不及了,就只能把它整理得好好的,让它休整一下。等到第二年开春,我就从光华农场弄来各式各样的菠菜种子。菠菜长势非常好,使参观的人羡慕得不得了,这时候的主要问题是到了收获的时候会有人顺手牵羊。我认为拿走一部分总不会不给我留一点儿,还是经营不已。可是这时候,整风运动逐渐紧张起来,我觉得没有可能再去收获了。那年没有发大水,我敢肯定作物没被水冲掉,我也相信总会有人去收获,不至于让农作物烂在地里。

1942年运动一直很紧张,这块地我就一直无法去经营,虽然这块地是我开出来的,但是不得不放弃了。不过我还是

关心那块地的命运：别人是否去种？是否发生连庄稼和这块地都被冲毁的情况？

我一直以为进行农村调查是经常要做的事，有时需要集中一些力量去做，成立调查组，每个调查组的人也是不会多的。1941年底或1942年初参加西北局考察团是我第一次这样的经历。最初感到意外，还有些不以为然，后来一想在进行调查时一定会分成许多小组活动，也就不再怀疑了。

这次绥米调查是响应加强调查研究决定的一个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的活动，选择绥德、米脂这个地区是经过一番考虑的。陕甘宁边区有五个分区，延安、陇东、三边、关中、绥米。陇东、三边、关中这三个分区始终没有去过，它们的具体情况说不上来，只知道情况都比延安地区复杂，特别是关中地区邻近西安，斗争特别多。而延安地区是老区，内战结束前土地革命进行彻底。我到延安后就一直在延安地区，特别是一直在延安。在这五个地区中绥德地区最使人感兴趣。它有一个名称：绥米警备区。八路军进驻这个地区之后，这个地区便有八路军和国民党的专员何绍南两重政权，现在国民党的势力不存在了，但是这个地区的情况同延安地区有很大差别，我们的政策也必须适合当地的情况。这个地区的领导也有不少问题希望得到西北局的指示。因此，这次行动不同于一般的调查。

这次调查由西北局书记亲自带队。西北局调查研究局（四局）边区问题研究室的全体人员，从研究室主任贾托夫起，一直到做具体工作的同志都参加了，在延安一个人都没有留。现在一下子可以说得出名字的有柴树藩、彭平、梁洪、李

舍。边区问题研究室经济组的就是柴、彭和我三人。政治组的人至少有三个人,局里还有搞行政和秘书工作的。加在一起一定在十人以上。这是西北局的考察团,西北局的人当然是主体,但绥德分区存在“统战问题”,因此中央统战部的刘澜波和廖鲁言也参加了这个考察团。还有一位延安相当有名的经济学家王恩华也参加了这个调查。中央好像本来已经组成了一个调查小组去绥德,听说西北局有这样一个考察团,要求一起行动,西北局也同意了。这样,这个考察团又有中央机关的人参加,阵容更壮大了。

快出发了,江青也来了,成了这个考察团的一个成员。

1942年初的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这个队伍就从西北局机关所在地采石砭集中起来出发了。每个人一匹马,考察团团员,加上高岗的警卫员等,三四十人,三四十匹马就向绥德出发了,真是一支浩浩荡荡的调查工作者队伍。

(四) 1942 年

小 引

1942 年这一年的开始,我参加了由书记高岗率领的规模很大的西北局考察团,赴绥德、米脂等地进行经济、政治、党务等方面的调查和研究。考察团在绥米工作了两个多月,其中一部分时间在乡下,一部分时间在城里。工作采取边调查、边整理研究的办法。回延安后,我们边区问题研究室的三个人——柴树藩、彭平和我又合写了一本《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

这次考察的历史背景,是绥德、米脂地区,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我们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非常尖锐,从而在土地问题上也特别复杂。经过多年来的斗争,在 1940 年后,这个地区才完全归我方统治,并在 1941 年得到巩固,情况需要考察。与此同时,

1941年8月1日,党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决定,并建立起西北局第四局。因此组织了考察团。

1942年我经历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延安整风运动逐渐展开。

在这两个方面,我都有许多故事想讲。

在1942年部分,我还要继续写自然科学研究会的事情,并且把1942年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工作放在最前面。

42·01 1942年的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工作

我保存有全套的《解放日报》,可是现在不在手边。关于纪念牛顿诞辰三百周年是根据手边的一本《我的教育思想》写的。写在这本书的第三章“教材、学校制度和社会进步”。里面追述了当初开牛顿诞辰三百周年纪念会的情况。当时自然科学研究会已经成立了一年多,大家并没有因为正处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就忘记了对牛顿这位科学伟人的纪念。于是由自然科学研究会发起召开了一次纪念会。会上许多人发了言,徐特立也发表了一篇热情的讲话。会后,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报道、通讯和文章。

在这本书里面我讲了一个道理: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教育,主要的一个办法就是把自己掌握的知识讲给受教育者听。传授给受教育者的知识中,有一些是前人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获得的。许多科学规律就是经过艰苦的努力才发现的。但是,前人对某个科学规律发现的过程和青年们在接受传授

获得关于这个规律的知识的过程,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尽管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也要启发受教育者开动脑筋对这个科学规律进行思考,让他们来探讨,但是在已经有了结论之后的、在教育者指导下进行的探讨,与没有结论之前做科学研究是大不相同的。一项研究成果是来之不易的,要花很多的劳动,但发现之后讲给学生听,常常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难以理解的地方。在创造发现的过程中付出的劳动,同在接受的过程中花的劳动是不能相比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里以二项式定理为例讲了这个问题。这个定理现在初中学生学初等代数这门课程时都学过。

所谓二项式定理就是:

$$(a+b)^n = a^n + na^{n-1}b + [n(n-1)/(1 \times 2)]a^{n-2}b^2 + \dots + [n \cdot (n-1) \cdots (n-r+1)/(1 \times 2 \cdots \times r)]a^{n-r}b^r + \dots + b^n$$

这里我讲一个故事,1665年英国流行瘟疫,为躲避瘟疫,牛顿从剑桥大学回到家里。很像2003年5月我为躲避“非典”在家里不出门、不会客。牛顿大概也是这样,但他没有闲着,在家里进行研究,在那段短短的时间里有许多重要的发现。我不知道牛顿为发现二项式定理究竟花了多少时间,我想不会用太多的时间。但是毕竟是一个新的发现,我想用的时间又不会太短。可是,现在学校里把它放在初等代数的一个完整的体系里,采用精练的形式来讲,初中的学生只要有一堂课的时间就可以学会、学懂,学会如何去运用它。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里说过这样的话:“再生产(指一

个科学研究成果——于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总是无法相比,例如,一个青年学生也可以在一小时的时间内学会二项式定理。”

在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准备召开牛顿诞辰三百周年纪念会的时间,我为这个活动做准备的时候通读了牛顿所写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中译本。这个中译本是郑太朴翻译的,商务印书馆 1931 出版。这本书的主要部分是应用平面几何的方法来计算行星、彗星椭圆形轨道,论证万有引力的规律。论证行星、彗星椭圆形轨道这样一件事,如果应用微积分的方法(这个方法也是牛顿发现的),会变得很容易,但是当时科学界还不懂得微积分,他就用平面几何的方法来论证,变得很难。1942 年我为这本《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的几何演算也花了不少时间。(后来 1987 年到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发表三百周年的纪念,我又重读了这本书,试图去演算,但是做不出来了。那时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不愿意再花那么多时间了。正好像有了火车、汽车、飞机之后,古代用做长途旅行工具的马车就要淘汰,有了微积分之后,用平面几何的方法论证行星、彗星椭圆形轨道的方法也应该淘汰。)《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本书,应该让科学史的研究者去钻研。青年学生只要知道有这样一本书就可以了。

再讲一件在 1942 年的自然科学研究的事情,那就是 1942 年 2 月自然科学研究会的驻会干事、也是数理学会的负责人力一,在延安《解放日报》出版的《科学园地》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炮打原子》的文章。大家知道 1945 年美国在日

本广岛的上空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思想是受到了爱因斯坦的启发。我记得不错的话是1942年的事情。也就在这个时候,力一写了这篇《炮打原子》的通俗文章,全文作为附录附在下面。

炮打原子

要征服反动的纳粹野兽——希特勒及日本法西斯强盗,我们要用飞机、大炮以及一切原始的及近代的武器。要征服自然使它们为进步的人类服务,也需要各种各样的武器,开荒用锄头,砍柴用斧子,打兽用枪,开石头用炸药,所有各种工具,各种轻重工业的机器,各种科学仪器,都是我们的武器。在征服自己的长期的斗争中,敌人许多堡垒中的一个非常小而又非常难攻破的就是原子。

纪元前四世纪最彻底的唯物论者 Demokrito 与唯心论斗争中就确立了原子论。他认为世界是由无限多数的实体成立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分成小块,继续分割下去一定会成为不能再分割的粒子,这就叫原子:所有原子都是一样的,是物质构成的基本单位。这个朴素的原子概念,经过近代化学的发展逐渐改变。十九世纪初 John. Dalton 才确立了近代原子论。当时知道的元素已有三四十个。他说用机械的方法分到最后不能再分的粒子是分子。化学元素是由原子构成的。各种元素的原子各有不同的质量。分子是有固定配置的原子结合体。化学变化就是在分子中取出或添进一些原子。在这里

原子的原来概念——不可分割的粒子仍是保留着。到俄国的 Mendeleef 创造出周期表以后,这个原子论更确立了,而且确实知道所有已经发现及未被发现的元素一共只有 92 种。也就是说构成我们物质世界的基本材料是 92 种原子。为了明确,近代科学家已按这个次序把原子编成号码,如第十三号 Al 即铝。在今天一般化学教科书上也都是这样讲的。

然而原子究竟是不是最后的不可分割的东西呢? 1896 年 Becquele 观察到放射性原子铀,在放射性带阳电的 He 原子核及别的射线以后变成铅。我们就知道原子不是最后的单元,而是由更小的带电粒子组成的。

在研究电解现象、通过气体放电的现象,及对于周期表上的各个不同位置的元素的性质分析与比较以后,这个原子的电的构成的概念就逐渐明确些了。我们知道所有的原子都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核,一部分是皮。小的原子如第一号 H、第二号 He,只有一层皮。大一些的就会有两层三层以至五层六层皮。每层皮全是由旋转着的电子组成的。最里面一层有两个,第二层有八个,第三层八个……到最外一层皮就不一定都是完整的。如第一号 H 只有一层皮,完整的皮是有两个电子,但它只有一个电子。第八号 O,有两层皮,外皮不是八个,只有六个电子。最外层的完整与否,就决定了元素的化学性质,完整的就没有化合力。但是原子量的决定却并不依靠这外皮的电子,而依靠核里面的质子:质子就是原子量的单位。最轻的原子 H 核里只有一个。所以质子也就是 H 原子的核,是带阳电的粒子。至于原子核里面怎样构造,还不很清

楚。说到质子决定原子量,那么原子量就都应该是整数,氢是一,氧是十六;但是为什么实际上我们测的原子量却并不都是整数呢?英国 Aston 创造了一种一个一个地来比较原子的重量的质量分析器,摄出的图片告诉我们原来一种元素里面的原子也有不同,我们说它同是一种元素,是因为它们的化学行为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最外层电子数是一样的。但是核里的质子可能有多些或少些的。如第三十号的 Zn,原子量原是 65.37,但分析结果里面原来有六种外表相同,但质量不同的原子,(64)(65)(66)(67)(68)(70);第一号氢有两个:H(1)(2);第九十二号铀有三个(234)(235)(238)。这些不同质量的原子以不同的比例杂乱地混在一起,总的量出来的平均数,当然不一定是整数了。在一种元素里有这样的原子时,它们就叫同位素(Isotopes)。

直到 1898 年居里夫人发现镭以后,我们对于原子的内部构造问题还是只能从原子自动地射出的射线来研究。我们还不曾主动地攻入这小堡垒,从上一段我们知道我们的敌人——原子,是有着它的外围战线的。皮的最外层有着尖兵——不完整的一圈电子,最外层里面却是一层一层的队伍严整的八卦阵,最里面有两个卫兵,最后才是原子核——这顽固的乌龟壳。

尖兵是没有大战斗力的。人类在两千多年以前摩擦琥珀生电时,已是不自觉地把它里面的原子的最外圈电子取了出来。里面一层层的八卦阵却是直到德国的 Röntgen 用阴极线射到从属靶子上,才被动摇。当时他还不知道阴极线就是电

子组成的。然而这却是第一次用炮弹轰击原子。当高速度的电子炮弹,碰到阻碍它的金属原子,就使得这原子发生强烈的震动,使它的八卦阵动摇,这次轰击虽没有打出里面的电子,但是却打出 X 光来了,英国的 Moseley 研究这种现象时,拍出了各种元素的 X 射线光谱图,同时奠定了原子序数的实基础。根据这些实际结果的分析,Niels Bohr 指出它各道防线中却有几层壕沟,在受到了碰击后,但各道防线之间并不变换。这种位能变动使它放出 X 光来。

还要打进去,那就要比电子还厉害的弹炮。镭所放射出的 He 核,质量比电子大得多,恰合需要。从 1919 年起英国剑桥加文狄士试验室 Rutherford 开始了系统的炮攻,得到很大的胜利。

第一役:用 He—核做炮弹攻入第七号 N 的原子核,使 N 原子核变成第八号 O 原子而逐出一个质子。这个胜利打破了以前两件所认为不可能的事:(一)除了放射性原子自然发生的原子转化外,还可以人工地转化原子。(二)原子转化除了崩解以外,还能组成。放射性的转是较重的原子崩解变成较轻的原子,而这次较轻的第七号 N—14 却变成较重的第八号 O—16 了。

第二役:用 He—核做炮弹攻入第十三号 Al—27 逐出一个质子。但这个质子却比原来炮弹有着更大的能力。这次胜利证明我们可以人工地从原子核内取出能力来。本来原子核内部我们是不清楚的。然而由于镭及其放射元素的存在,科学家都相信原子核内部蕴藏着惊人的巨大能力。从目前世界

工业发达的情形,往远看些,就要考虑到除了依靠燃料取能的办法外,还要想别的法子才行。放射性元素固然是一种能力的源泉,然而它不是受人管的,而是自动地放射出来,而且数量太少,把能力人工地从原子内部释放出来,在这次胜利后是实现了。

然而这两次胜利还有个令人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我们用的炮弹是镭自动地放射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布置的。

第三役:1932年 Cockroft 及 Walton 用质子做炮弹攻入第三号 $\text{Li}-7$,放出两个 He 核。这次胜利,从原子核里取出比第二战役更多的能。在第二战役中放出来的质子的能比原来炮弹 He —核的能只多很少一点,而这次放出的两个 He 核的能比原来炮弹多到一百倍左右。

第四役:1932年 Chadwick 用 He —核炮弹打中第四号 $\text{Be}-9$ 变成第六号 $\text{C}-12$,同时逐出一种新的穿透性极强的粒子。它既不同于镭放射出的电子或 He —核,又不是 X 光那样的电磁波,并且它行动毫不受电磁场的影响。于是他便给它起个中子的名字。不到一年更多的实验证实中子的存在后,便为大家所接受。中子(Neutron)是一个质子与一个电子结合成的,但不是第一号 H 原子。在 H 原子内电子是绕着原子核转的, H 原子在电磁场中表现电的极性。而在中子里这两个粒子已密合为一,完全没有电的极性,体积非常小,所以穿透力特强。这个发现告诉我们一种新的物质构成素材,也供给我们以新的锋利的炮弹。

第五役:1929年列宁格勒理工研究所 Skobelzyn 研究宇

宇宙射线时,在 Wilson 云雾室里观察带电粒子在磁场中的运动,发现有些速度非常大的粒子,甚至在 1500 高斯的磁场中都不受偏折。到 1932 年美国 C. D. Anderson 重复了这个实验,发现了一种新的粒子—正子 (Positron)。质子与电子一样,但是却带正电。1933 年在美国 Blackett 及 Occialini 在 Wilson 云雾室的拍照证实了这正子的存在。同年,在法国居里夫人的女儿及女婿用 He—核做炮弹攻入第五号 B—原子核内,逐出了正子。这个胜利告诉我们除了电子及质子外,还有别的物质构成的单元。在波浪力学理论上 Dirac 曾用充满电子的宇宙间的一个空洞,解释正子的存在。

第六役: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F. Lawrence 教授在 1929 年就想利用电磁场的变动,使带电粒子旋转与增加速度。最近他就设计出一种原子炮 Cyclotron,能把我们用的带电的炮弹加速到近于光的速度。用这个炮弹他曾把 He—核打进第十三号 Al—28 变成 S—32。此外还可以使许多平常的元素变成具有放射性。他曾制造放射性食盐来代替盐供治病及实验用。

自以上六大胜仗以后,加上理论上的分析,我们对原子核内部的组织只多明白了一点:就是里面的质子,加满了四个就联成一组,成为一个 He 核。原子核的素材有电子、质子及 He 核。最近柏林大学的 Otto Hahn 用中子射击第 92 号铀时,又获一大成功。在铀原子核被分裂的时候,放出的粒子竟具有二万万电子伏特的庞大能力。这个成功把怎样利用从原子里取出的能力为人类服务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后来 Niels

Bohr 分析这个实验时指出,在第 92 号铀的三个同位素(234)(235)(238)中,只能从 U^{235} 想办法,要想利用这种力到生产事业上来,首先要使它不断地供给大量的粒子,这要两个条件:其一是经常地轰击它,使它不断地放射出大量的粒子;其二是要有够用的 U^{235} 。第一个条件还容易,因为它分解时,同时也放出中子来,它可以自动地互相轰击,虽然原来速度很大,但可以用水来减小它的速度。第二个条件比较困难,因为铀本来不很多,而且要把 U^{235} 与另外两个同位素分开却很费事。用 Aston 质量分析器是可以的,但一个一个地太慢了,现在已有利用电磁场使铀原子旋转很快,质量不同,离心力也不同,这样像分牛乳酪那样分开它们。

在这次世界大战中,燃料资源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新的能力源泉已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希特勒已下令纳粹科学家研究 U^{235} 对战争的作用。可惜的是许多最优秀的科学家都已被他赶出了欧洲。苏联及英美各国,在这方面也一直是密切注意的,并不断地研究着。想不久会有新的原子进攻的捷报传来。

五十年后,也就是 1992 年,《中国科普创作》第二期上,邬枫、陆洪时写了一篇《半世纪的史诗 五十年的传奇》,对《炮打原子》这篇文章给以高度评价。1995 年 4 月 6 日《科技日报》发表了一篇本报记者的《力一:无声的核专家》。1995 年 11 期的《中华英才》上也发表了文章《最后走出核帷幕的人——力一》。这件事情,作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工作是应该记下一笔的。

力一是北平大学的学生,1935年暑期毕业。因此没有能够参加北平的“一二·九”运动。但是,力一一家有好几个人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力一本名叫做力伯皖,他的哥哥叫做力伯杭,他有一个弟弟叫做力伯京,他父亲是个医生。他父亲人在什么地方,他生的儿子就叫什么名字。可是他父亲在北京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就叫做力伯长。力伯皖毕业后分配到广州国际广播电台工作。他们一家都是革命的。1936年我去广东岭南大学教书的时候,组织了一个革命的青年团体。这个团体原来是想最后打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广州地方队部”的名义。开始的时候,“民先”的旗号还没有打出来,我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在广州的革命青年。这时候我就通过北平的朋友找到了力伯皖,要他参加我的组织。他很积极地参加了我的那个组织,成了这个团体中政治上比较成熟的积极分子。从此以后,我和他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1938年他从海南的海口市,经过武汉到了延安,我们又在延安相见。他在延安就“归队”搞经济建设的工作,参加了自然科学研究会。在1941年的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年会后,他参加了这个研究会的驻会干事会,成了干事之一。年会后陆续成立各种分会,力一是物理学会的负责人。1941年10月《科学园地》创刊,他是这个《解放日报》副刊的主编之一。《炮打原子》这篇文章就是在1942年2月24日《科学园地》第十一期上发表的。后来他改名力一,我和他相处的情况在我的《编年故事》第二册里写得不少。

这篇文章写在1945年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前三

年。虽然 1939 年 2 月 2 日爱因斯坦写信给罗斯福,提出要制造原子弹的问题,但是这件事情是绝对保密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力一也不知道。力一在 1942 年作为一个科普工作者能够写出这样的一篇文章是非常不容易的。

附:爱因斯坦给罗斯福的信。

阁下:

费米和西拉近期所做的一些工作手稿已经寄给了我,这使我想到,在不久的将来,铀元素可能被转变成一种新的重要能源。已经出现的这种情况值得引起注意,如果必要,应迅速使其作用于政府机构的部门。我认为我有责任使您对下列事实和建建议引起注意:

在上四个月中,法国的约里奥和美国的费米所做的工作,使在大量的铀中建立一个瓜变为可能。通过这个瓜可产生大量的能量和大量新的像镭似的元素,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定能实现。

这一新现象将导致可能构成一种新型的极有威力的炸弹的结构的产生,这是非常可信的。这种炸弹由船载并在某一地区爆炸,只要一枚就很可能摧毁整个该地区及周围的地区。

我知道德国已经真的停止了铀的出售,这些铀来自于捷克斯洛伐克开采的矿石。德国采取这一行动只能被理解为:德国副国务卿冯·威斯科等人在注意着柏林的凯撒·威尔海姆学院,那里正在重复美国人在铀方面所做的工作。

真诚的爱因斯坦

42·02 考察团在去绥德的路上

1942年1月的某一天,考察团一行三四十人从延安出发了。

这个西北局考察团由高岗本人亲自带队。西北局第四局尤其是边区问题研究室是主力。考察的内容包括经济、政治、党务各方面。因为包括经济方面,西北局还请了经济学家王思华参加。因为包括党务,西北局就请了当时中央党务研究室主任刘澜波参加。江青也在这个考察团。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也去绥米考察,她们就同我们一起出发。她们之中,我记得的有王珏、林娜和赵峰。

从延安到绥德,快马一天的时间绰绰有余。我们却把一天的路程分两天走。因此走得很慢、很悠闲。高大的马当做毛驴子骑,常常用的一种姿势是倒过身来,把两腿放在一边,也不下马(当然采取这个姿势并不舒服)。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想跟谁说话就把马赶上去同这个人并排走。想哼什么调子或者想唱什么歌,谁也没有顾虑地在马背上哼唱了起来。高岗、贾托夫也都这样。我还记得。

走到清涧境内,有很长一段是在青石板上走。“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清涧的石板真是名不虚传。走在石板上,听着马蹄在石板上敲出的清脆的声音,同时清澈的溪流在石板上流过,真是赏心悦目。清涧农民住的房子的屋顶用的也是石板。那儿有一种石头,天然可以揭

成一片片很薄很薄的,因此,可以把它当瓦片使用。

一路上大家非常愉快,我也特别高兴。到延安两年多了,一直待在延安城的附近,真有些闷了,很想看看延安以外的世界。何况路上大家都没有什么拘束,我也就放纵自己。我记得我的一身打扮:出发时我围了一条围巾,是大红色的。腊月的天气本来是很冷的,不知道为什么嫌它围在脖子上不舒服,就把它取下来,束在腰里。头上我用一块白毛巾,像陕北农民一样包扎在头上,骑在马上——一边甩着马鞭子,一边哼着信天游。我这样一个形象,后来回想起来实在滑稽。

绥德分区那时有五个县:绥德、米脂、葭县、吴堡和清涧。清涧是这个分区最南靠近延安的一个县。1936年由于国民党的“围剿”,在绥德地区分过土地的地区和游击区大都相继被占,但是直到内战结束,清涧还保存两个区未被占领。

清涧是我们到过的陕甘宁边区的第二个县城。第一个县城是延安县城。但是延安县城经过大轰炸,已经没有县城的样子了。我们到了清涧,听说高司令来了,上级西北局来了这么多的人,清涧县委的同志就热情接待。大家会了一次餐。晚上全队人马开了个晚会,唱歌说笑话。赵峰表演她的拿手节目——大笑,这个节目我记得特别清楚。高岗在晚会上也很活跃,说的话不少,但是他没有唱歌。

大家都要江青也表演一个节目。江青参加这个考察团,事先除了西北局领导外,大家都不知道。我是在大队人马集中出发时,才见到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江青。据说是毛主席要她来的,说她应该接触一下下面的实际,锻炼锻炼。不过

我们没有听到她自己怎么说。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人们对她还是比较注意。但是当时的延安并不特别注意这样的人,不像现在。她来了就来了,一路上同别人一样说说笑笑,别人也并不把她看做是特殊的人物。在清涧的那个晚上,她并不活跃。不记得是谁点她唱一段京戏,她没有唱,只是随便唱了一支歌,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第二天从清涧出发,当天就到了绥德。一到绥德就听说毛泽东从延安拍来电报,要江青马上回延安。江青也就在绥德只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备马回延安,当然得有人护送。我当时有些奇怪,会有什么急事一定要她回去,毛主席不是要她在实际工作中锻炼锻炼吗?为什么在什么工作都没有开始就让她回去?我这些问题当然没有人来回答,只知道别的同志也有所议论。

42·03 到了绥德之后

到了绥德之后,就忙着做调查前的准备工作。

高岗忙着在上层活动。中央机关来的八个同志的活动不清楚。

我们第四局边区问题研究室的人就忙着看材料,听介绍。到了一个新的地区,当然要了解它的历史和当前的概况。了解已经作过些什么调查,把有关材料拿到手,好在原有的基础上工作。这段时间花得不少,总算掌握了绥米地区革命与反动的阶级斗争的基本轮廓。真是反反复复,经过了好几个阶

段：

绥德分区的土地革命可以追溯到1934年9月。在清涧东区分配了土地，1935年又在绥德东区义合、延家川一带分配了土地。米脂、绥德，还有高岗的家乡横山一带，有过游击队活动。这是第一阶段。

1936年国民党“围剿”，上述分过土地的地区和游击区域相继被占领，农民得到的土地回到地主手里。这是第二阶段。

1937年11月八路军驻防警备区，以警备区司令部和国民党二区专员何绍南会衔，出了一个“土地维持原状”的布告，这时候在农村中呈现很复杂的情况，这是第三阶段。

1940年2月，何绍南逃跑，这是第四阶段。

我们到的时候农村中问题很多。人们对政策界限的认识很不清楚。在绥德城内掌握到这些情况之后，我们就更加清楚地理解了这次调查的重要意义。

记不清楚待了几天，决定下到村里做调查，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

考察团的人基本上分东、西两路。东路去义合镇。高岗、贾托夫参加这一路的调查。廖鲁言、王思华、妇联的人也去这一路，边区问题研究室也有几个人参加。西路去双湖峪，刘澜波参加这一路，我参加西路的调查。义合是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双湖峪是没有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选这两个地区进行调查便于进行比较。

分开后，东路的具体情况，我就不怎么知道了。

42·04 去双湖峪途中顺访三皇峁

双湖峪当时是绥德县内一个人口比较集中的居民点。我想应该是一个区政府的所在地。我们调查后过了几年,双湖峪从绥德分出去,成立了个子州县。子州就把县委县政府设在双湖峪。所以有的地图只能查到子州县,就查不到“双湖峪”这个地名了。

双湖峪到绥德是条大川,小里河、大里河汇合之后,经过双湖峪向东流到绥德,再同无定河汇合后(当时人们说它就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里的无定河,不知道是否可靠)向南到河口入黄河。从绥德骑马西行四五十里到双湖峪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在这条“西川”里,快要到双湖峪走到三皇峁这一带时,我看到一种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象:在这条很宽直的大川里,远望过去,一直到看不到的地方为止,竟然没有一块农田,却见到星罗棋布着我分辨不出来的建筑物和一堆一堆的土。在建筑物那里有烟囱在冒烟,还有在建筑物周围冒白气的水雾。看起来真是壮观,似乎是到了一个大工业区。

见到这样的景色,我就停下来(当时我去双湖峪似乎没有骑马,只有步行,所谓“停下来”就是找人谈话)。真是少所见,多所怪,一问才知道这是当地农民在生产“小盐”。陕北人把远处运来的盐,或者三边盐池县生产出来的盐叫“大盐”,把我看见的那种方法生产出来的盐叫“小盐”。原来双

湖峪川里这一片地是盐碱地，种庄稼基本没有收成，于是农民们干脆在这些盐多的土地上用水淋，然后把淋出的水熬盐。后来发现地下水盐分也很多，就干脆打井把水打出来，把水浇在地上，借阳光蒸发掉水分，然后采取淋的办法把盐分溶解出来。我看到的那一大堆一大堆的土是淋过的土，我看到的白雾是熬盐时的水气，那烟自不必说就是炉灶里冒出来的煤烟了。

生产小盐还有一道工序，那是因为淋出的盐水含有较高成分的芒硝即硫酸钠，它不但是人体不需要的，而且带有苦味。因此在熬盐时，要及时把结晶盐捞出，利用芒硝更易溶于水的特性把它分离开来。不过小盐比起大盐来还是有比较苦的缺陷。

农民生产小盐的劳动方式与务农很相似。在井里打出盐水淋洒，好似在农田上浇庄稼。只有刮盐土来熬盐与务农没有相似的地方。在生产关系方面，也同务农一样是一家一户地在自己分到的那块地上生产。后来我去找那儿的农民调查，他们使用的语言，也完全是种庄稼的那一套，讲气候如何影响他们的收成，讲盐的生产量等等，所不同的是他们更关心市场。因为生产出来的盐是必须卖出去的。幸而那时候交通不便，海盐运来很贵，战争环境盐更缺，所以销售的问题不算太大。

我没有在三皇峪逗留很久，就到了原先定下来的目的地——双湖峪。

42·05 于光远夜走凤仪亭,刘澜波谈话五分钟

在双湖峪,我和刘澜波,不记得还有什么人在一个村里搞调查。我只记得我负责这个村的经济方面的调查,刘澜波负责党务方面的调查。

在这个村有一个姓吴的女党员,她担任村妇联主任。她是刘澜波的调查对象。她的丈夫姓李,在村里开了个小店,他是我的调查对象。在我们还没有进村之前,就听到关于这个姓吴的女党员的“生活作风”(陕北农村把这四个字专指男女之间的事)有不少传闻。人们说她很好看,有一个“貂蝉”的外号,而且说她很风流,不但同村里人搞“八角恋爱”,和上面下村的干部中有的人也不清不白。讲她情况的人还有名有姓地说,村里谁是吕布,谁是董卓等等。刘澜波主观上不愿意找这样的风流女子谈话,调查将要结束时,又觉得按照自己的分工应该找她谈话,否则缺了妇女工作这一个方面,因此在一个白天把她找来谈话。谈话过后,大家跟他开玩笑,问他这个姓吴的“貂蝉”容貌怎样,是否真的是一个美女。刘澜波说我只同她讲了五分钟(形容谈话之短也)。只有五分钟当然就谈不出什么来,刘澜波没有直截了当回答人们向他提出的问题。可是同志们不肯罢休,说他没有回答问题,刘就说:“实在太匆忙了,没有看仔细,只看到一条眉毛长得还好看。”他的话引起大家一阵哄笑。

这当然是他故意说笑话。

刘澜波没有告诉这个吴姓女子的容貌,别人更没有看见过这个妇女主任,不知道她长的模样。

事情就该轮到我了。当我们决定第二天离开村子的时候,我初步整理了一下调查材料,我对那个姓李的小店员是作过调查的,但是发现缺少几个应有数字,需要补充。但要去问这个数字,我就必须到李的家——也就是到那个“貂蝉”的家里去。我怕夜间到她家去,被村里人看到当做笑话来传。那天晚上我已经到了李家,在门口转了一下,最后下定决心,不要这几个数字了,回了住处。

关于我们进行的双湖峪调查中所了解到的情况,后来整理成的材料同别的材料保存起来,并且在我們写的那本书里利用了不少。不过刘澜波同那个妇女主任的谈话和我的那个小店的材料都没有用。它们只有当故事的价值。

后来,考察团中不知道什么人编了一个关于西北局在绥米活动的章回小说的回目(当然并没有人真想去写小说),其中考察团的主要成员几乎每个人都有一回半回,我和刘澜波共一回,这回的回目就是“于光远夜走凤仪亭,刘澜波谈话五分钟”。现在我用这个回目做这一节的标题。

42·06 烟筒沟煤窑

我记不起什么时候专门到双湖峪的烟筒沟了解一个煤窑的详细情况,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一口不那么深、也不那么大的井,井口接上一个普通的从

井底打水的那种辘轳，一条比较粗的麻绳挂着一个筐子，这就是煤的出口处，也是人进出煤窑的通道。有人一吆喝，知道煤已经装满了筐子，井口的人就用辘轳把它打上来，倒在旁边，然后又把筐子放进去，一天十几个小时生产出来的煤实在只有很少一点，但是挖煤的农民就靠它维持家计。人下井是一丝不挂的，只是头上戴上一个皮做的箍。箍上挂一盏小油灯照明。在井下一人一把尖镢。烟筒沟的煤层很薄，有上下两层，一层比较厚，平均不到一米，只有七十厘米左右。还有一层更薄，平均只有三十厘米左右。两者加在一起才只有一米，而在两层之间有三十厘米的夹层。要同时把它挖掉，在井内就要处理。这样一个连夹层一起不到一米半的空间，挖煤的人是站不起来的，只有斜躺着、跪着、坐着，变换着姿势去挖。挖下来的煤就用小车来拉，这小车只是一块只有半平方米左右的木板，下边钉上四个直径十厘米左右的铁轮，再用三根麻绳制成一条扁形的带绑在车上，靠肩拉车。在木板上装上了煤，就爬着把煤拉到进口。这样艰苦的生产条件，我以前也是没有听说过的。这回我坐了筐子下去走了一趟，是亲眼见到了。

这个煤窑的组织形式，我详细问了一下。二十个人下井劳动，得到的煤按二十五股分。每个下井的农民（矿工）一股。还有五股是“英雄股”：“地主”（煤井所在土地的所有者）一股；“出路”（从井口到大路经过的土地的所有者）一股，（如果“出路”不止一家，这股就归几家分得）；“外窑头”（搞销货的）、“里窑头”（在井下指挥的）各一股；还有一种人，他

们叫做什么我记不得了,就是勘探到这口井和还要继续勘探新井的“技术专家”一股。分配的方法就这么简单,是一种合作的形式。

挖煤的人有一种迷信——供奉太上老君。他们还把井底发现的老鼠当做一种神明,不容许伤害,说这是太上老君派来的。当时我想这里恐怕有一些道理,有生物存活的地方,空气的条件比较好,生产比较安全。

42 · 07 吃糠的学问

在绥米调查中,我对农村吃糠问题作了一番调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原来的一些观念。

原来我以为糠就是糠,是从稻麦等果实上脱下来的皮或壳。是度过荒年的食品,是非常难以咽下,也很难消化,营养价值极低能把肚子填饱,但会导致营养不良,伤害消化器官的东西。再多的就说不出来了。我想现在大多数人,也还是这么来理解“糠”这种东西的。

对绥米农村吃糠的情况作了一番研究之后,我才懂得糠是有各种不同的制作方法,各种不同的吃法的。同时糠的质量也有高有低。在绥米,糠的主要组成部分是:1. 五谷——稻、黍、稷、麦、豆中的黍米;2. 萝卜;3. 红枣。黍经过碾簸,把壳和皮去掉之后,便是黄米(陕北老百姓和许多别的地方的人是这么称呼它)。我小时候在北京吃早点,有两种经常吃的东西,一种叫牛骨头油茶,是用牛的脊椎骨中的骨髓来把白

面炒了,然后加上白糖,煮熟了吃(现在我想吃当年这些美味小吃却怎么也吃不到了,就是到了内蒙也吃不到,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年我去马来西亚,一看满街都有牛骨头油茶,结果一问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是咸的)。还有一种是常吃的,叫桂花茶汤,就是用黄米粉加上桂花和白糖,一吃也好吃极了。在延安胜利食堂吃的“三不粘”,也是黄米面加了白糖做的,所以一说糠做原料,我就很明白。

糠质量的优劣是要看没有去壳和皮的黍和已经去了壳和皮的黄米之间的不同比例。制作糠的红枣,去核还是不去核,也是决定糠的质量重要的内容。萝卜糠(萝卜的比重不能太大)制作的方法是按照不同的比例放在锅里蒸,然后晒干再碾碎。质量好的糠是以黄米为主,没有去皮和壳的黍占的比例比较少,加上去核的红枣,萝卜的比重也很少,这样的糠我吃过,有些甜,还真不难吃。不过吃了消化如何可就说不好了。差一点的糠是用带皮壳的黍子做原料,不加黄米。再差一种是黍子以外还另加黍的皮壳。最差的全部都是皮壳,而且掺入的红枣没有枣肉只有枣核,把枣核磨成粉吃……

对什么人吃糠的情况,我也调查了一通,大地主家不吃糠,小地主和富农家吃,不是这几年,过去一直都这样,丰年吃得少,荒年吃得多一点,不过糠的质量是上等的。中农就经常吃,而且糠的质量就比较差一点了。至于贫农那就吃得多了,而且糠的质量就更次了,有的吃得很多,就大便不通,小孩子拉不出粪哭闹,大家就用筷子去抠。小地主和富农也吃一点糠,这是我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的。在一个贫穷的社会,有一些

剥削者过的生活,用文明社会的眼光来看,可以说是相当贫困的。只有社会富裕起来了,在一个不让农民负担重的社会里,一个分得了土地的农民,才可以一点糠都不吃。延安县不少农村都是这样。

42·08 在印斗看地主账本

考察组的工作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绥德。在绥德的东、西两个调查组的人汇集在绥德城里,互相介绍调查中得到的材料和印象,提出各自发现的问题,然后又一起去米脂。绥德和米脂比较,米脂的土地更为集中。绥德有相当大一部分地区直接经过土地革命,农民分过土地。而米脂只有小部分地区有过红军和游击队活动。这是两个县土地集中程度不同的原因之一。历史上米脂就是大地主比较集中的地方,而且还大多聚居在一定的地域:如县城、杨家沟、印斗等地。我就参加了印斗的调查。

一到印斗,我就感到大小地主的极大区别。在双湖峪没有很大的地主,拥有二百垧土地的,就算是大地主了。可是印斗九保一家地主的土地就有三千八百垧。地主家的住宅也神气得多了。他们家里的文书账册也比较齐全,这就使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便利。我们向地主家要来了原始的账本,进行各种统计和分析。

调查之前我不知“欠租”这个词的实际意义。我们在印斗查地主的账,发现佃农没有一个不欠债的。每遇荒年、歉

年,农民实在交不出租子,这时候可以缓交或少交,作为欠租,留待以后偿还。但是旧欠未清,新欠又来,长期以来就造成农民普遍都欠地主许多债的现象。有的欠租甚至是三四十年积累下来的。一个农民欠的租子,可以说是永远还不清的,比如有些老佃农欠租的数量可以达到六七十石,而他们每年生产出来的粮谷,最多也只有十几石,如何还得清?地主倒不采取把佃农搞得无法生产的那种逼债的办法,但利用欠租,使得农民即便在丰收年份,也过不了稍好的日子。收成稍好,农民所产粮谷也被搜刮大半,使得农民永远不能翻身。欠租成为地主挟制农民的经济武器。而且印斗的农民根本不知道自己欠地主多少租子。账是地主记的,农民自己没有账,而地主的账是怎么记的,农民从来不看,他们也从来不问。我问一个不知道自己欠了地主多少租的农民,为什么不到财主家看看账?这个农民的回答是:谁敢去看!一问财主就说太好了,你是不是来还欠租?

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把欠租一风吹走才行。

我想干脆在下面写一节介绍关于《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这本书的故事。

42·09 我出的第一本书,就是同柴、彭合写的这一本

我的书已经出版的真不少,《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算是最早的一本。这书不是我一个人写的。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柴树藩起主要的作用,彭平也出了不小的力。在这本书的

封面和版权页上,印的一直都是柴树藩、于光远、彭平。这是完全符合事实的。这不仅由于在西北局第四局边区经济研究室的我们三个人中柴负责,而且他在写作方面的能力也比我强。但是我也把这本书看做“我出的第一本书”也没有错。这里有两点理由:一是我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二是我对这本书的公开出版发行,尽了很大的力量。第一点没有什么好说的。我想专门讲讲第二点。

这本书的“前言”是1942年9月写的,署名“西北局边区研究室”。写好后马上付印,很快就作为西北局的出版物印出送延安有关单位。我自己也只拿到一本。由于长期以来我一直想写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关于中国当代土地问题的著作,因此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离开延安到解放区工作时,这本书一直装在马褡子里保存着,直至1949年带到北京。

建国后的前几年,几本普遍使用的政治课教材是我写的。那时稿费按书的印量的比例给,书印量大,稿费真是多得不得了。抗美援朝时,国家号召大家捐钱买军用飞机。当时我在中宣部工作,同事们想捐献,但是没有钱。我想出一个办法,请他们给我抄有用或没用的东西,我给他们付报酬,他们好去捐献。我带在身边的这本《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就是同事们抄出来给我的。

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这本书和它的抄件一直保存在我的箱子里。二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到了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我想起了这本书。我认为它是一本

有价值的书。它记载了 1942 年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地区的两个县——绥德和米脂土地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它也是当时许许多多同志去绥米进行调查的成果，对于我本人来说，则是一个纪念物。而这本书没有正式出版过，我保存的这本书恐怕已经是世上孤本。让这样的书湮没，实在太可惜了。而我手边又有那个抄件，当初如果没有抗美援朝时中宣部同事为我抄的那个东西，出版就会有相当大的困难。于是我就把那个抄件送去人民出版社。这本书就在 1979 年 2 月正式出版了。

这本书篇幅不大，只有八万五千字，分七章，第一章农业生产概况，第二章土地变革的历史，第三章绥米土地分配现状，第四章土地租佃关系，第五章土地变动及趋势，第六章土地纠纷，第七章农村阶级关系，还有一个附录：绥米农村负担问题，里面有很多数字和表格。1979 年出版的时候，我自己还加了注解。比方对“自动欢迎”四个字我就作了这样一个注解：这是当时陕北农村流行的一句土话，意即自动捐献。因为当年红军刚到陕北时，许多农民自动捐献东西，红军讲：“欢迎！欢迎！”所以他们误认为捐献东西这种行为叫做“欢迎”，故以后他们把自动捐献称为“自动欢迎”。（附带讲一个笑话：陕北农民把“讨论”叫做“原谅”，有一个事情我跟你讨论，就说成“有件事我跟你原谅原谅”，这个词也是来自红军。红军在讨论时，发表了不同意见时会说：我讲的不对的地方请你们原谅。这样农民就以为讨论问题就是“原谅”。这种现象启发了我对语言规律性的一种理解。）

1979 年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征求了柴树藩和彭平两位

的意见,问他们是否赞成出版这本书,希望他们能够有所补充。他们表示很高兴,也很赞成能出这本书。但是他们手边都没有这本书了,也记不起很多内容,不能补充什么了。关于这本书的故事就写到这里了。

这本书出版以后,外国的名人大辞典《WHO'S WHO》在讲我的条目时,把这本书写进去了。他们很重视这样的书。

42·10 一场空欢喜:《反对党八股》 中表扬《轻骑队》的话删去了

1942年初,我随高岗到绥德、米脂去作农村调查。毛泽东这一年2月1日和一星期后的2月8日在延安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这两个报告时,我正在绥米,没有听到。回延安后,延安思想界很热闹。在马列学院出了一张墙报:《矢与的》;西北局党校也出了一张墙报《西北风》。这些墙报我都没有看。马列学院在很远的兰家坪,《西北风》贴在什么地方,我更不知道。听人介绍,我认为它们的性质似乎同《轻骑队》差不多,使我们感到它们张贴出来是受到《轻骑队》的影响。而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它是两篇小文章的汇集,在报上一连登了两天),从内容到文风,都一眼就可以看出它同《轻骑队》在思想上有某些联系。因为许多问题,如批评延安的“食分三等、农分五色”等,在提法上就同《轻骑队》发表的一些文章很相近。还有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同《轻骑队》的文章也颇相似。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文章的发表,可以说是《轻骑队》的文章上了党报。

在我从绥德、米脂调查回来之后，原青委机关的一位同事，也是《轻骑队》的“元老”之一（我记不起他是谁），手里拿着一份复写的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的演讲记录找到了我，很兴奋地给我看这份记录。说《轻骑队》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我把这份记录看了看，其中的确有这样几句：“文化沟口有一张墙报《轻骑队》。有些文章我看了，觉得写得很好，这些文章没有党八股，它们了解实际情况。”我抄了这几句下来，当然早就丢失了。我不敢说现在我写下来的这几句一字不差，但是基本的意思和措辞，我是记得很清楚的。我们当时的高兴劲儿就不用说了。可是等到后来，发表出来的经过整理的演讲稿中，这一句话没有了。这是后话。发表《反对党八股》是1942年6月中旬的事了，而上面说的是3月间的事。

1942年4月2日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批评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做法。毛泽东这番议论，主要是针对《野百合花》而发的，但应该说也有针对《轻骑队》的意思在内。4月6日《解放日报》就发表了《信箱〈轻骑队〉及其他》，在4月10日重新发表1929年12月红四军党代会决议《反对党内几种不正确的倾向》和1937年的《反对自由主义》两篇文章。总之，到了4月上旬，气氛完全变了，《轻骑队》的编者也受到口头批评。于是在4月13日就发表了《轻骑队将改变方针》的报导。4月23日在报上公布了以《轻骑队》编辑部的名义写的《我们的自我批评》。这些事，我都是从报上看到的。后来我也听到这样的传闻：在毛发表《反对党八股》演讲后，前方几位高级将领回到延安，见到贴在沟口的《轻骑

队》，十分生气，向中央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同时，对王实味批评的调子越来越高。到6月中旬，陈伯达、丁玲、张如心的发言已经把托派的帽子加到王实味的头上。6月20日，延安文艺界座谈会通过了《关于托派王实味事件的决议》。

在整风学习开始时我就听到一种对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党员的批评，说他们企图用“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认为《轻骑队》就是这种表现之一。但是别的单位没有把这件事当做重点。马列学院有它的《矢与的》，西北局党校有它的《西北风》。在中央青委机关把《轻骑队》当做一个主要问题集中批判。这个情况开头我一点也不清楚。整风开始后，各单位关起门来，自己考虑自己的事情。延安各单位的没有事不怕路远见面聊天的情况几乎完全停止了。

一直到1942年11月底，我得到通知要我到中央青委机关去开会。那时中央青委已从文化沟口搬到杨家沟沟外的延河东侧，主持中央青委的也不再是冯文彬，而是蒋南翔。开会的通知上并没有特别写清楚会议的内容，但是在开这个会之前，报纸上已经先发表了《轻骑队》要开会检讨过去的偏向的报道，所以我事先已有精神准备。这次会议把当初在青委机关参加《轻骑队》活动比较多的人都找去了，到会的大约有二十多人。但究竟谁在场记不清楚了。许立群、陈企霞是肯定到会的，这一点我印象比较深。童大林是第二阶段《轻骑队》的主角，并且没有离开中央青委，这个会当然少不了他。好像还有个参加第二阶段《轻骑队》而我不认识的人。此外当时

青委的负责人和有些与《轻骑队》无关的干部也参加了。会上蒋南翔对《轻骑队》的错误做了一个系统的发言,然后大家都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会议主要是中央青委内部的会议。把我们几个《轻骑队》的“老人”找去,一方面是为了让我们补充第一阶段的情况,另一方面当然也包括对我们进行一番教育的意思。我也是在这个会议上了解到不少关于第二阶段《轻骑队》的情况,包括所发表的文章中有哪些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如果写整风开始后有关《轻骑队》的情况,我知道延安《解放日报》上有一些文字材料可以查证。我有一整套延安《解放日报》。我和王惠德对建国后把整套延安《解放日报》一张不少地集全这件事情上是有一点“功劳”的。也因为有这么一点功劳,我得以保存全套影印本的《解放日报》。可是要把1941年至1942年的那本儿取出来太费事。幸亏全套《解放日报索引》取出来比较容易。它帮助我弄清1942年4月以后发生的那些事情的月日。但是有些事情在文字上是怎么写的未能查看。

最后我还是想重复一下这样的意思:《轻骑队》是一个历史事件,时间前后不到一年,参加活动的人不少,在当时有相当大的影响,党中央处理过这件事。虽说它与另外一些事件,如与“王实味事件”无直接联系,但在思想上也不无关系。要把《轻骑队》这段历史写得充实、丰富,尤其是准确,不是靠我一个人的回忆所能做到的。因此我想请当时参加过这个活动的人,对我这篇东西所写的内容作些核对。我不敢说没有记

错的事情(在回忆其他事情上常常遇到这种情况),但我的经验是,经过共同回忆,一起核对一下,可以有所助益,也可以放心一些。

把这一节和这本书的1941年部分的那一节联系起来,我想讲的《〈轻骑队〉的故事》就算完整了。

42·11 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始

关于延安整风,毛泽东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发出整风动员令是一个日子,两个月之后的4月3日作出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又是一个日子。我们西北局就是从“四·三决定”后,开始整风学习的。

近年来,我对整风运动形成这样一种看法:说是一个整风运动,其实是两个整风运动同时进行。一个目的是反对王明路线、肃清王明路线影响的整风运动;一个是针对党内参加革命不久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教育的整风运动。一开始进行的是第一个。1941年毛泽东把自己农民调查的资料印出来,并且自己为这本资料写序和跋,是针对王明路线而做的工作。1941年、1942年编辑和印出《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给延安的老干部看,也属于第一种整风运动所做的事情。批评《轻骑队》这样的事情就是属于第二种整风运动。第一种整风运动涉及范围要窄些,人数不是很多;第二种整风运动却几乎包括在延安所有的干部。那时延安的干部年轻的比较多。

第一种整风运动也有教育第二种整风运动对象的作用。后来,第一种整风运动逐渐公开。下面我准备讲的西北局的高干会,就拉开了和王明路线斗争的帷幕。

42·12 用自己“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党”

毛泽东的整顿“三风”的报告反对的是教条主义、宗教主义和党八股。这是针对王明路线的。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有一个时期王明路线曾在党内居统治地位,使党的事业蒙受重大损失。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居统治地位,但是王明路线的影响并没有肃清,抗战初期王明从苏联回国,毛泽东亲自到延安桥儿沟机场(延安在桥儿沟有一个很小的飞机场),说这是天上送来的,表示热烈的欢迎。后来王明在党内担任长江局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 1938 在武汉,武汉是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所在地,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王明所领导的长江局的位置非常重要,管辖的范围很广,整个黄河以南半壁江山都是长江局领导的范围。华东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各省有一个中共中央中南分局,这个分局就由长江局代管。中国西南的云贵川也是归长江局管的。长江局书记是王明,副书记是周恩来,委员有秦邦宪(博古)、凯丰(何克全),一共四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加上王明把自己的地位看得很重要,因此后来武汉长江局有点像第二个中央。王明在武汉独当一面,而且在整个中央的工作中也有很大的发言权。王明写过一篇《三个月政治局工作的总结》,就是用

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口气写的。在中央的会议上,王明也常常长篇大论地发表讲话,分析形势提出任务。

1938年党的六中全会和武汉沦陷之后,王明开始受到批评,调回延安,负责中央妇委。抗战初期那样显赫的地位是没有了,但还是政治局委员,影响还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是对王明路线的一次清算,进一步削弱宗派主义的影响,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和为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准备。

让延安广大的青年干部逐渐了解王明思想路线的特征(主观主义),组织路线的特征(宗派主义),文风的特征(党八股),就是削弱王明的影响。像我这样的人,在武汉直接在王明领导下长期工作,也比较了解王明,只是觉得他的演讲的内容浅薄。他做的《三个月政治局工作的总结》非常枯燥,写得真不好。后来看了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之后,那篇东西真好像是开中药铺。把两个整风运动结合起来,是很聪明的一招。

我从绥德、米脂回来以后,开始学习整风文件时,虽然没有像上面说的那样清楚明白的认识,但是基本上懂得这次整风运动的意义。我明白像我这样在“一二·九”运动后才参加革命工作的人(那时的党中央已经是毛泽东领导了),可以说一直是在毛泽东的思想指导下成长的。遵义会议前的那场斗争同我们是不相干的,但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是很重要的,因此我在整风中准备接受这次教育。而整个报告中讲的我也百分之百地赞成,认为讲得的确好得不得了。

整风开始时那一段学习就是这样。

没有想到在王实味《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和几位老同志看了《轻骑队》墙报发表不满足意见之后，一步一步发展到结束，我们这批年轻的党员在整风学习中，觉察出了原来整风报告中没有讲到的一个内容，那就是出现一个用“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党”的提法。

从这个提法的内容来讲，我感觉到是针对我们这样的人的，这个提法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自己参加了党，完全拥护党的路线，认真学习马列，积极工作，一心想为党多做贡献，并且下了必要时不惜牺牲的决心，怎么会去想用“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党”呢？不过经过了这样的一番引导——“这不是你们存心要那么做的事情，只是因为你们头脑中还存在不少小资产阶级思想，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改造，因此，客观上起了用‘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党’的作用。”我就想到自己发生的对延安的有些现象看不惯的情况，不但在思想上看不惯，而且成了《轻骑队》那样的墙报积极分子，当时自己是有一个想为改变思想、改造现状制造舆论的想法。所以说我想用“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党”，也有点道理。“你们都还是好同志，问题是你们的思想中还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你们只要觉悟到要在整风中挖出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根子，问题就解决了。”引号里的这一段话，并不是某一个人说的，也不是某一次说的，而是我自己在那次整风运动中概括出来的，而且是最后基

本上接受了。

接受这样的看法,开头并不是没有一点勉强,思想上并不是全通。比如在对丁玲、王实味的批评中,我觉得有些人讲的、写的并表现出的是教条主义的学风,用的是“党八股”的语言,在我参加的整风学习的小组会上,有些人的发言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总之,在整风开始以后,经过我自己对自己做工作,觉得思想基本上是通了,感到立场是转变过来了。不过有时看到党内那些官僚主义的现象,还是压制不住地产生不满的思想。在学习列宁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那些言论时,在自己的头脑中总常常冒出“无论如何,在执政党内反对官僚主义总是不错的,问题是界限要划分正确”的念头。那时认为自己灵魂深处也还有些问题,不过以后在延安时期再没有写什么文章,发表那样的言论。

42·13 “思想自传”

在我参加的西北局的整风学习小组,采取一种做法,便是要参加整风的人写“思想自传”,详细叙述自己思想进步的过程。小组里有的人说“因为人有时会自己骗自己,自己对自己最容易搞主观主义,因此用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自己,写好自传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是一种自我教育”。我很赞成这种说法。我们小组写“思想自传”的做法,是要求那个人用今天学得的理论中掌握到的观点,按照时间次序和自己经历过

的事情,对自己思想的演变过程进行系统的叙述,自己进行分析,写成文字,然后在整风小组会上一个时期一个时期地讲。组里的同志也对他所叙述的事情和提出的问题,反过来向他提问题,促使他作进一步事实补充,挖掘自己的思想,帮助他进一步思考,把事情讲清讲透,并且进一步帮他分析,最后是由他自己来作结论,思想自传也并不要求交给党组织,并不存入个人档案。

我对这样一个方法很感兴趣。我也许是整风小组会上对做这件事最认真的一个人。我认为这是自己取得深刻认识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小组要求是着重讲自己从原来所属的阶级和在自己生长的环境中形成的思想,到接受革命思想的过程和以后革命思想发展的过程,讲进步也讲自己还保有的那些旧思想及保有旧思想的程度等等。我就按照这个要求,用很多时间去回忆,去思考,去分析。1942年我才二十七岁,回忆起来不难。但也是要仔细地去想。

现在我写回忆文章,不但在方法上得益于那一次,在对自己所经历的事情的分析也得益于那一次,许多事情也是由于那一次回忆出来,加深了印象才不至于忘记的。在讲自己的思想自传时,同志们耐心的帮助,也使我得益不少。

有一些看法我就是在这次写思想自传中明确的:我入党的情况与多数青年同志不一样,一直到1937年初没有一个党员同志关心过我,在政治上有意识地帮助过我。我是自发地革命起来的,一直到在广州组织那个革命团体,都是我自发去做的。在发现广州那个团体被破坏后,我自己认为很沉着,同

时又有冒险精神,到每一个同志那里去报信,自己去向其他革命团体的人通报消息,自己决定去香港争取舆论界的支持,最后我还自己冒险回学校上了一堂课。我认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共产主义革命家,而且仿佛自己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从而没有要去申请入党的念头。当我的入党介绍人对我说“党组织已经决定吸收你入党”而问我的想法时,我才恍然大悟自己还没有入党,于是马上说我很愿意入党。入党介绍人严肃地对我说,入党与否,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你现在不忙答复愿意不愿意,要我认真考虑一个星期之后再答复他。我在一周中不知道该考虑什么问题,我只认为做一个党员要不怕牺牲,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自己认为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广州组织被破坏后,我自己通过反思更加相信我自己。因此一周后我的答复是:考虑过,没有什么犹豫。而不知道党员应具备的组织性。我入党时的思想有点像同列宁争论党章时的马尔托夫的观点,在写思想自传时,我把这一点分析出来了,并且回忆在入党后这方面虽然有了提高,但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提高自己的组织性的问题。对于这个看法,小组同志表示同意,指出入党时我有了接受党的纲领的觉悟,但对党约章程缺乏认识,因此需要在这方面再补课等等。

这种本人写和讨论思想自传的办法,直到现在我还觉得是个好办法。

42 · 14 整风学习期间我的工作

1942年整风学习占用了我许多时间,要我动很多脑筋,但并没有停止工作。

绥米调查后同柴树藩等一起整理写作那本《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直到这一年的9月才完稿。

这年冬天陕甘宁边区要召开高干会,讨论边区经济问题。我们研究室负有搜集资料提出看法的任务。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那是一本相当厚的书,其中有不少材料、不少数字。毛泽东准备把这本书发给与会者,但是在会上不是按照这本书讲的。因此要求把这本书写好。我们西北局第四局边区问题研究室经济组承担这项重要任务。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还记得一件事情,那就是毛泽东的这本书已经接近定稿,已经有了校样。他的办公室打电话指名要我核对一下这本书中引用的材料,要我马上去新华印刷厂。我问要不要柴树藩也去,电话那头说不用了。我有点奇怪为什么只要我一个人去。我在清凉山下印刷厂的窑洞里见到乔木,他正在对这本书作文字校对。见他后我才明白,原来这时候他已经在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工作,他要一个人在旁边随时帮助他工作。这样的工作很零碎,不好意思找他不熟悉的柴树藩。这是在我们离开中央青委机关后,我同他的第一次见面。

同时自然科学研究会驻会干事会的工作,我们也在积极进行。1942年我去绥德前,自然科学研究会绥德分会的工作就开始了。在绥德师范有一位名叫何楠若的女同志,她是学自然科学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绥德分会,就以她和绥德师范的其他教员为主。1942年我去绥德就对这个会的成立促进了一下。这个分会在1942年1月18日在绥德图书馆开了成立会。那时我还在绥德,我也参加了。当然还是整风学习前的事,但是六、七月间绥德分会搞了几次规模大一点的活动,记得我还是写了信的。

在1942年整风学习期间我对自然辩证法的翻译工作还是抽空进行。

总的说来,因为整风学习占用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其他方面工作和活动比较少。

42·15 西北局高干会

1942年冬天举行的西北局高干会可以说是我在延安参加的最重要的会议之一。这个会议有三件值得很好回忆的事情。

会议开得很长。究竟多长,记不清楚了。我想至少超过二十天,有可能超过一个月。

第一件是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演讲。这是我听到的毛泽东最长的一次演讲。他系统地讲辩证唯物主义时(给抗大上课),我还没有到延安。这次

他一共讲了有三四个半天,每次足足讲四个多小时,一共讲了十三四个小时。十二条一条一条地讲,既对斯大林每一条本意作了详细的讲解,又联系实际充分地发挥,讲得极生动。我听了也觉得过瘾。可惜这次演讲的记录似乎没有留下来——也不知道有没有作记录——整理毛泽东著作的人手边似乎没有掌握这几次演讲记录。我也只顾仔细地听,没有作记录(后来我看到一个油印的非口语的记录,就不那么生动了)。

第二件事是开展了对朱理治、郭洪涛的批评。这件事特别重要。因为西北局高干会上,对朱理治、郭洪涛在红军到达陕北之前路线上的错误的批评,目的是为了批评王明。

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对朱理治、郭洪涛的批评是张秀山在大会的发言中首先发难的,然后原先在陕北开辟根据地工作的同志相继发言,以亲身的经历说明朱理治、郭洪涛等执行的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路线;同时也阐明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路线的正确性,而在错误路线的指导下,革命同志险被镇压。西北局高干会之所以开得很长,就是每个同志在大会上都作了两三个小时的发言。朱理治那时在陕甘宁边区当银行的行长,他在清华大学校友中级别很高,班次是第二级的,我是第八级,高我六个年级,因而是延安清华校友会的会长。我是认识他的。郭洪涛那时担任什么职务我记不清楚了。他们也在会上发了言。他们发言后又有针对他们发言的又一轮发言。第二轮发言之后,中央的许多同志就一个一个地讲话,实际上是对这次讨论表了态,但都并不是简单地表态,而是讲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中的理论问题、原则问题。那时

候,中央同志讲话理论色彩比较浓厚,而且各人都有自己的发挥。这次关于陕甘宁边区党史问题的讨论,都是在大会上进行的。我每一个发言都很注意地听了。我对这段历史原来一无所知,这次增加了许多历史知识。参加了这次西北局高干会,我才具体了解到1942年毛泽东整风报告提出的问题是怎样的事实。

第三件事就是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这件事情前面已经讲过了。我觉得这次会议一是讲思想讲理论;二是进行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三是向前看,讲了根据地的建设。这个会议开展了关于陕甘宁边区党史问题的讨论,整了一次风,基本上解决了问题。之后就转而讨论建设问题。毛泽东这个报告是一本十三四万字的书,他没有讲什么话,只是把这个报告发给到会者。他为西北局高干会所未有讨论的财政问题、经济问题,花了很多的时间写这本书,直到西北局高干会开到最后一个阶段,他才把这本书发给到会者,并且在书的末了写了一句“本书原计划写的税收、节约两章,因为高干会闭会,没有时间写了,只好……”在毛泽东报告后,高干会又进行了一轮讨论,会议就是在热烈讨论边区经济工作的气氛中闭幕的。

毛泽东的这本书,我一直长期保存着。

这次会西北局的领导当然非常高兴,我们在西北局工作的人也非常高兴。

这个边区高干会胜利闭幕的消息直到1943年1月底才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标题是“边区高干会胜利闭幕,确定了

统一领导加强生产的方针,清算了历史上的错误”。1943年3月中旬,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张秀山的《高干会杂记》,也是从三四月起报上连续发表高干会在陕甘宁边区各县的传达。毛泽东的那个报告,一直没有见报,《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第一次刊载在东北新华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其中第一部分,后来被选入《毛泽东选集》,用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这样一个题目。开完这个会,就到了1942年的年底了。

(五) 1943 年

43 · 01 走向审干

写和讨论思想自传这个办法我觉得很好,对自己很有帮助。到1942年底情况似乎还好,但是进入1943年,我在原来的整风学习小组的会议上发现,有一些事不那么对头。于是开始恼火起来。

思想自传大家早就已经从头到尾经过了一道,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后来,还是那个小组,又要我对经历的若干情节作出说明。我从小组会中两三个人的发言中感觉到,他们似乎从什么地方领会到什么精神,他们似乎对我个人活动特别有兴趣,看问题的着眼点不是思想,而是情节。对我讲的情节表示怀疑,追问细节。我就知道这不再是属于思想教育的范畴,而已属于审查干部范围内的事情了。

过了一段时间,党组织宣布整风转入审查阶段,组织上要求党员应该愉快地接受党组织的审查。

我的历史清清白白,到延安后中央组织部又审查了一次。虽然这次审查带有“人人过关”的性质,我在思想上还是不那么痛快。从原则上当然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也愿意如实地再作一次说明。但是提问题是善意的或者不那么善意的,我还是感觉得出来的。我感到有人对我很不友好,有意识地设置圈套让我钻,这引起了我的警惕。比方我在“思想自传”里写过自己在1935年暑期,在“一二·九”前,我和程淡志、王义道等人在上海静安寺附近租房办工人识字班,识字课本按照《资本论》的体系,讲资本家为何和如何剥削工人。小组会上有人就问,1935年我们党设在上海的“临时中央”的机关已经被破坏了,你们在上海做那样革命的事,为什么不怕?工部局为什么不把你们抓起来?我回答他们,那时我不是党员,党中央在上海被破坏我一点儿都不知道我怎么会害怕呢?工部局没有抓我们,我想一是我们的活动时间很短,二是这是他们的事情,我怎么知道?为这件事情,纠缠了半天,我很不高兴。

我讲到1936年广州组织被破坏的事情,有人就问:参加那个组织的许多人都被抓起来了,为什么你这个当头的人反而那么安全?当你在香港看到报纸上说,你们那个团体抓起来的人已经被枪毙了,你为什么敢回到广州?你回广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对南昌和广州两次被拘留的事情,问的就太多了,总算他们没有提我被日军在战地拘留这一段。

他们对我提出的问题中,有不少是只有敌人才能回答的

问题,比方说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放我等等,我实在没有法子回答,这使我很不高兴。为了这,我就常常失去耐性。

审查是走向后来抢救的一个步骤。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在审干阶段,我为了让党组织了解我的思想,把连记了两年多的“学聪明日记”都交给组织了。可最后却一点儿反馈都没有得到。比方说没有从我日记中提出过一个问题。以后我很反悔,学了两年聪明,最后做了这样一件很不聪明的事。我那本“学聪明日记”到那时候,经过1939年很短的几天、1940年、1941年两个整年和1942年的大半年,我用很小很小的字体,几乎把1937年到延安路过桂林时朋友给我的那个日记本写满了。把它交给党组织后,如石沉大海,一去不回,十分后悔。

43·02 抢救失足者

1943年康生在大礼堂做了一次报告,题目就是“抢救失足者”,他告诉大家:现在胡宗南准备大规模地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知道陕甘宁边区有许多人组织上有问题。以前我们有耐心对他们进行工作,等待他们觉悟,自己把问题交待出来。现在不行了,胡宗南进攻边区,我们就要打仗,在打仗时,带一批有问题的人,你们说怎么办?恐怕只有把这些人处理了,但是我们又不愿意这么做,因此希望你们转变立场,交待问题,不要为难我们。康生的这次讲话,是有个文件的。但是恐怕现在很难找到。因此上面讲的是我们听报告的人领会的

精神,接着,各个系统、各个单位进行“抢救”。我是在西北局的,是边区的系统进行“抢救”的。先是在西北局,原来高岗的一个秘书叫做陈旭的,他被“抢救”了。还有我在北平做民先总队部工作时,帮助我写信的郭敬堂(那时改名郭敬)也被“抢救”,陈旭和郭敬都不肯交待,于是就启发,把手用绳子捆住,另一头穿过窑洞顶上的木梁,往上拉,吊起来。他们没有这样对付我,但是我参加了边区政府礼堂里的抢救会,这个会由一个中央的同志负责主持,大概有几百个人参加,分成几个片,也就是几个小组,叫“片”是因为这样的小组是流动的,互相劝坦白,你不坦白,大家或动之以情,或严厉地斥责。等到有一个人坦白了,就请他到台上去,大家鼓掌。你不坦白,就跟你没完,不让睡觉,搞车轮战。

这时候,有一些被认为性质严重的,有的被送到康生管的社会部,有的被送到边区政府管的保安处。我在中央组织部训练班时同一个小组的张克勤就是关在社会部里后来出来的。他坦白得好,康生就让他骑了高头大洋马,身上别着大红花,作为坦白英雄到各个单位去动员大家坦白。张克勤对大家讲,他是怎样在延安把人拉去做国民党的特务,他有些什么手段,主要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搞短促突击。讲了很多的手段,现在记不得了,比方说,“有什么必什么”之类,如“有舞必跳”等。

那时候把坦白叫做“从鬼变人”,没有坦白就是“鬼”,坦白了就变成人了。

当时,《解放日报》出了一份《实话报》,专门写坦白的情

况。张克勤是男的不是女的,因此没有讲什么美人计的办法,而在《实话报》上发表了许多讲女特务,实际上是女同志怎么样用美人计把人拉下水,把人变成鬼。报上点名的人我还认识。当时还要我参加自然科学学院的抢救运动,会上要一名年纪很小的女同志也讲自己施行美人计的办法,听了后十分痛心,也十分恶心。

那次延安的“抢救”,有的单位坦白的人几乎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单位据说达到百分之九十九。温济泽同志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部负责,他保护了许多同志,最后几乎把自己也卷了进去。幸亏周恩来从大后方来,保护了一下,才幸免于难。据后来了解,国民党反动派抱怨在延安没有他们的人,这次抢救运动一个真的特务都没有。

那次抢救,总算有“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要不不知道要有多少人掉脑袋。不过后来王实味到了晋西北还是被处死了。

43·03 韦君宜的《思痛录》

韦君宜和她的丈夫杨述都是我清华的同学,我们一起参加“一二·九”运动。韦君宜在清华大学时的名字叫魏蓁一,比我低一个年级,杨述在清华大学时的名字叫杨德基,大概比我低两个或者三个年级。我在物理系,本来是不会认识的,因为“一二·九”运动才认识了,后来韦君宜就到了延安中央青委,和许立群一起主编《中国青年》杂志。她在1941年被输

送到绥德，在绥德地委的《抗战报》。这时候延安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传到绥德，绥德也就掀起了抢救运动。据了解还扩大到了其他的根据地。

韦君宜的《思痛录》是1999年写的，内容主要是描写延安抢救运动的情况。那时候她在绥德，我也是那个时候的人，因此在写我的故事的时候，想用我自己的经历对她的这本书做一个旁证。

说起最早我们参加革命时的心情，的确是像韦君宜在书中所讲的对党既忠诚，又信任，想不到党会犯抢救运动这么大的错误，也想不到党内同志之间的关系会变得那样无情无义，那样残酷。韦君宜的书中引用一首我们常唱的歌，至今都很熟悉——“人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无分人种黑白棕黄红”。

韦君宜这本《思痛录》中说，绥德的抢救运动是从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精神传达到绥德之后，首先是在绥德师范突破的。说绥德师范发现特务，是个特务窝。原因是绥德分区由我们共产党接收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是国民党留下来的教师，就根据这一点判断在那里有一个暗藏的特务系统，并且说还发展新的特务。

在韦君宜的书上没有提到《实话报》，她在绥德没有看到这份报纸。但是她看到绥德师范的整风领导小组给他们交来了他们“深挖”出来的特务材料，让他们登载。原来绥德还存在着特务美人计。领导人就是杨述所熟悉的一个语言教师，队员是许多女孩子。据说这些女学生竟接受了特务的口号：

“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叫“美人计”，三年级叫“春色队”……当时真把韦君宜吓了一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她不认识那个被称为“美人队”的队长，私下向另一个熟悉的教师打听，他说：“是个二十岁的姑娘，喜欢说笑，哪里想到她会是川岛芳子！”

韦君宜不知道延安有个《实话报》，我可以证明在这方面这是延安、绥德相通的办法。

在韦君宜书里讲到了她把绥德师范的女学生刘国秀写的题名为“我的堕落史”这样的文章登在《抗战报》上，她是深信不疑。而这样的文章一登，后面来稿就越发踊跃，越发出奇。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十二岁的、十一岁的、十岁的，一直到发现六岁的小特务！这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后来，当运动整到韦君宜的丈夫杨述头上，也就等于整到她自己，对整她丈夫的内容她就十分清楚了，这样她才明白很多坦白都是假的，而原先却以为这就是证人。

43·04 西北局宣传部

抢救运动时我在西北局第四局。不知道为什么把我从第四局调去西北局宣传部。

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是李卓然，是个忠厚稳重的老同志。西北局宣传部下设几个科，我分配到的那个科的科长是蓬飞，

他是河北人,高(阳)蠡(县)暴动的参加者。高蠡暴动后,他到了陕北,时间比较早,也是一个忠厚稳重的老同志。蓬飞后来把名字改为陈泽,建国后长期在杭州工作。科里的同志似乎一开始就相信我是没有问题的人。西北局宣传部的同事,现在记得起来的还有董纯才、吴文遴、王文达、王顺桐、周盼、张维明、王茜以及现在还常见面的秦川、柯华等。还有一些人还会记得起来。同志们在一起相处得很和谐。

到西北局宣传部,我以为自己的问题已经解决,便照常工作,照常和同志们一起聊天,照常在窑洞前劳动种菜。

我到宣传科后蓬飞分配我做些工作。只是有一件工作我受到他的批评。当时有一出秦腔《血泪仇》,演出后反响很大。蓬飞要我对这个剧本进行审查,并且让我去看它的演出。我不喜欢看戏,京戏不喜欢看,秦腔更不喜欢看,只是对剧本上提出了一点意见。蓬飞认为我不该凭个人爱好来工作,对我进行了一通批评。这个批评当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这是审干以来领导对我工作的一个批评。它说明党组织已经把我当做一个干部来要求了。

还有一件事使我相信蓬飞对我的信任,这是蓬飞后来告诉我的。有人在假坦白时说我是他的特务上级。这个人交待我是特务,他也是特务,他坦白的时候,还拿出许多文字的东西,说我给他一套特务卡片要他工作。后来他害怕了,把两张有字的一面贴在一起。后来蓬飞曾问我:你写过什么东西,让人认为你做特务的东西?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想起,在光华农场的时候,有个从大后方来的人结婚,拿出一尺左右的

绸子,让大家在上面签名。我说是不是这东西被说成是特务的关系。后来蓬飞告诉我实情,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在抢救中向我提那样的问题。这个情况以后除蓬飞外还没有第二个人告诉我,如果他不讲,也许直到现在我还不明就里呢。这个假特务的同志在“文革”中接受了教训,表现得很不错,能够不讲一句假话。我不愿意讲出他的名字。

43·05 《吴满有》和《寻门户》

我后来离开西北局宣传部到了行政学院,去进行“甄别”。当时延安“有问题”的人的遭遇也分几等几级。头等的去枣园社会部,康生直接管的地方。二等的去边区政府保安处。去行政学院就属于三等的人物了,后来行政学院的性质也就改变了,名义上是个学校,可是并不开什么课,也开不了什么课,成了收准备进行甄别的人的地方。那时候行政学院等待甄别的人很多,于是被分成好几个班,每个班又分好几个组。最先我是在行政学院的一个小组里等待甄别。甄别是背靠背,不要求到行政学院去讲什么事情,人完全是闲在那里。

这时候学校考虑对闲在那里的人怎么办,当时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在一年五个月之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行政学院就要求各班各组搞文艺创作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我们这个组自写自导自演两出秧歌戏,其中一出秧歌戏叫做《吴满有》,吴满有是边区著名的劳动模范。我们这出戏就演他在土地革命前如何贫困,在土地革命

中如何翻身的故事。全剧并不很长。我记得采用的是最基本的歌曲,我还记得第一句是“腊月里是三九,冻破硬石头”。另一出戏《寻门户》是写一对新婚夫妇走亲戚的短剧。同我同一个组有一个袁心湖同志,他在这方面似乎比我在行些。我们两个人是编导。我还记得我画了秧歌里的人从哪里出去,到哪里扭一下。为了当好导演,我想起了1936年在广州我读过一本斯特洛夫斯基的《奥塞罗表演艺术》,当然这是完全两回事,是用不上的。

行政学院有许多组,每组都要出许多戏。各组自编自导自演,然后全校评比。我们这个组的两出戏,《寻门户》连院内也没有评上名次。《吴满有》在院内算是评上了,记不起是第几名。可是没有“出线”,失去去院外上演的资格。我的老朋友,“一二·九”时候的师范大学的学生余修,他也在行政学院,他们组自编自演的《棉花姑娘》倒大出风头,到延安的各个单位去演出,那出戏他编的的确比我编的好,我自愧不如。余修同志解放后在山东,当过山东省的副省长。

在行政学院我记得的、觉得值得说一说的经历就只有这个。

在行政学院,我待的时间不长,大概只有三四个月,就分到设在桥儿沟的行政学院的“特别班”。

到特别班已经是1944年的事了。

43 · 06 有关“抢救”的一个故事

事情发生在甄别的阶段,有一个单位的一位负责人是抢救运动中整人的人。他所在的单位有一个女同志,坦白自己是特务之类的人。当然心情不好,单位也怕她自杀,交待同她一个窑洞住的人特别注意。和这个女同志同住的叫刘敏,后来成为我很熟的朋友王惠德同志的妻子。到北京后她告诉我在整风甄别期间发生的许多情况。

刘敏告诉我,那个坦白了的女同志是有丈夫的,她的丈夫被关在边区政府的保安处。在甄别阶段,单位负责人说,那个坦白的女同志在坦白时讲的话未见得很真实,要她把真实的情况讲出来,才能解决她的问题。但是既然坦白了,要她讲另外的话有很大的顾虑,怕说成是翻案,所以他要做她本人的工作,找她谈话。刘敏说:他先是在上午找,后来是在下午找,再后来是在晚饭以后找,后来是夜里找,而且一直谈到深夜。最初刘敏很受感动,说这位同志真下工夫,真肯帮助人。后来那位负责同志和坦白的女同志就上床了。这位负责人有妻子和孩子。他的妻子人很好,有一次上床的事被撞见了,他的妻子一气之下,再也不理那个人,带了孩子走了,而且报告了组织。事情就揭露出来了。

于是单位就开展了对那位负责同志的批判。在延安还用过这样的名字,叫做“同志审判会”。开会的时候,把原先在这个单位工作,以后调到外单位的同志也请回来。据参加会

议的同志告诉我,开会的时间是在冬天,开会的地点是在那个单位附近的一个大窑洞里。因为参加会议的人不少,窑洞里的人比较多,而且生了炭盆,空气不太好,他还记得清清楚楚。他告诉我,这会开了不止一天,开了两个整天。那次会,主持会议的同志地位很高。两天的会议一直在会场上。又有人告诉我,那位受批判的负责同志说,他宁可做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愿做没有缺点的孔夫子。在批判会上他的这句“名言”受到了一个有名的“理论家”的驳斥。

他们这个单位离我的单位很远,而且我自己也是在甄别之中。当时的这些情况不大了解,后来这件事情传开了,成了延安很大的新闻。在这个批判会之后,主持这个会议的人做结论说,问题的性质是监狱长和犯人的关系,那样关系就不是一般的“男女关系”,而是败坏审干的名誉。开会做结论的时候,那个女同志也在场,而且她自己做了笔记。

后来,那个女的丈夫放出来了,又和那个女的生活在一起。但这个女同志和那个负责人真的发生了感情,因此私下里还有来往。这时有一个相当地位的同志劝那女的丈夫,说你们的感情已经到这种程度,何必还生活在一起?有一位高级领导同志说,不能让他们在一起。而那个女的丈夫发现他的妻子的情绪不对头。问的结果,她向她的丈夫坦白了,并且把那次批判会的结论用毛笔抄成一份,交给她的丈夫。后来组织上就把那个女的分配到离开延安四十里路的一个地方当乡文书。而那个受批评的负责人曾冒充她的丈夫,到四十里堡去了一个礼拜。这也是刘敏告诉我的。

这是一件有人利用抢救运动去做不可告人的事的故事。

关于这件事情我知道得很多,不过,这本书写的是我自己的编年故事,就写到这里为止。

(六) 1944 年

44 · 01 “特别班”

1943 年底或 1944 年初,行政学院分出一个“特别班”。大部分学生留在原来的院址,“特别班”的学员则搬去延安城东十多里的桥儿沟。桥儿沟原来是鲁迅艺术学院的院址,我们这个班是否占用了鲁艺一部分窑洞,我从未去过鲁艺,不知道,反正我们这个“特别班”同鲁艺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

行政学院分出这个“特别班”的原因并没有向我们传达过,大家都心里明白,事实上也早就在行政学院内传开了。问题比较简单的人,经过几个月的甄别,基本上已经查清楚,很快就可以结案,这样的人就留在普通班。问题比较严重一些的或者比较复杂的,就到这个新设立的“特别班”。把这两部分人分到不同的地方,组织上认为有好处,便于管理,也

可以避免情绪上的互相影响。

我被编入“特别班”，行政学院原来同一小组的人一个都没有去。

去“特别班”的人数，比起原来行政学院的人要少得多，大约只有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不过加上做审查工作、做行政工作的人就超过一百人了。

这个“特别班”的性质，大概在我们没有到桥儿沟之前早传开了，而且还被进一步夸大。到那儿不久，我们就听人给这个特别班改了一个字：“特务班”。连特别班对门的延安小学的学生都知道。这些小孩子想对我们进行教育，看到我们走近就唱起歌来：“大汉奸卖国求荣，小汉奸如何如何（原词记不起来了）”，“汪精卫，你也是中国人……”想促使我们悔过自新，听了真是哭笑不得。

在“特别班”是以劳动为主，春耕季节还没有到，就是纺棉纱，一人一架纺车，计件工资，按质论价。班上真有纺得又多又好的，收入很多。我的纺纱质量怎么也提不高，老断老接，数量也多不了。除了纺线，我还用羊拐角捻毛线，原料是旧棉衣里絮的羊毛。这种羊毛质量很差，又粗又硬，连羊粪都没有清除干净。这种棉袄在延安的人一年发一身，不收回。到了天热的时候，我就把这一身棉袄撕开来，把羊毛取出来，洗过，就成了一件可穿的夹袄。人们就把羊毛扔掉了。我想把羊毛扔掉太可惜了，把羊毛在延水里洗了又洗，洗得非常干净，晒干，然后用羊拐角去捻（不知道你们看到过羊拐角没有，我现在也说不清楚是羊腿的哪一个部分，它的形状是有一

个分叉的地方,一头系上一根绳子,把它吊起来,另一头挂上一个纺锤。这样吊起来,用手一拨,纺锤就转起来了,把羊毛捻成线。线又缠到拐子上,一直到缠得很多,不方便再缠的时候,就解下来保存,然后再重复)。我这件棉袄所捻成的线足够织一件毛衣的。特别班有一个朝鲜女同志名叫石瑛,她帮我织成一件毛衣,这件毛衣我至今还保存着,这可以作为纪念物,也可以存放在什么博物馆。这位女同志在抗战胜利后回她的祖国了,据说改回了原来本国的名字。经过审查,当然没有问题,不是什么特务,而且特别班一个特务都没有。听说她回了本国后,就当了一个师长,军衔是少将。又听说有一次在他们党的运动中不幸死亡了。那位女同志的模样和说笑的表情,我都还记得很清楚。

这件毛衣织的式样很好,完全是本色的,没有去染,可以说是天然的羊毛。我一直把它保存着,放在我家的箱子里。它是虫子最好的食物,可是不久前打开箱子一看,非常完整,一点问题都没有。原来我有个心思,把它捐给某一个博物馆。后来一想,博物馆的东西很多,不一定看得起这样一件东西。你给他,他当然会收下,然而不会好好地保存,结果它的命运未见得比我保存好。于是我想把它拍卖,花了钱的东西,人们都会更重视。花钱越多的,就越重视。不过它的卖点怎样说呢?我现在多少是个小有名气的人,是我本人从棉袄中拆出的,是我本人把它捻成了线,这些又是我本人在“特别班”这样特殊的环境中做的事情,这可以算做是一个卖点。而且是一个外国籍的女同志给我织的,这也算是一个卖点。她后来

回国后的命运,本来也可以说是一个卖点,但是这个卖点就不好说了,搞得不好,会发生跟兄弟党的关系。考虑到这一点,在拍卖的时候,就不能说出来了,否则会大大减少这件毛衣的价值。同时,我也没有做过拍卖的工作,不知道什么拍卖行,也不知道要价多少合适。关于拍卖这件毛衣的事情,我在我的个人的网站上告诉上我网站的人,希望他们能给我一个好的意见。不过很久了,没有得到反馈。我在上海也找到了一个拍卖行,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有给我反馈。因此,这件毛衣还在我的箱子里,我的老伴又上街买了很多樟脑,用以保护它。

“特别班”的人情绪普遍地不好,眼看别人的问题解决了,而自己的问题似乎遥遥无期。不知道为什么我却特别高兴。一块儿的人,最初以为我是装的,时间长了就相信我是真的高兴。我给他们讲“顺境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逆境可以锻炼自己的意志”的道理。也有人说我有阿 Q 精神,我说自己就有阿 Q 精神。不过我对我的阿 Q 精神称之为“革命的阿 Q 精神”。我说:在没经过审干之前,组织上也可能对我不太信任,而我自己不知道。现在经过审干,而且正在甄别,经过审干甄别,我相信我的问题会得到很好的解决。既然组织上要进行甄别工作,而且有专门的人在做这件事情,有问题的人解决得越多,剩下的人越少,研究我的问题的力量越强,我的问题就解决得越彻底。因此,我的阿 Q 精神不但是革命的阿 Q 精神,而且是科学的阿 Q 精神。

这个阿 Q 精神也表现在我生活当中。“特别班”每周都

组织舞会,我是每次必跳。只是那儿的女同志不那么多,我在舞场中的规矩是我只邀请每个女同志跳一场。我知道我自己跳得不好,同我共舞,不见得给对方带来愉快。跳一场就让她对我尽点义务,给我一点面子。第二场再找她们跳我就不好意思了。因此,我只请人跳一场,然后坐在旁边“摆测字摊”。没有人找我,我就坐在那里,有人找我,我就跳。同我只跳一场的人名我记不住,找我跳的女同志,我很感谢她们,她们的名字我就记住了。女同志中我记得的除上面说的那位石瑛外,还有后来做邓颖超大姐秘书的陈楚平。她是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中央大学是国民党办的,为了她的这个学历,就到这个“特别班”来了。还有一位叫曹爱华的,高高的个子,舞跳得很好。本来我是不会跳舞,就是在特别班时学的。但只学会了走“四步”,跳 FOX,不会跳什么“探戈”,至今不会。以后的水平一点儿没有提高,因此就请人跳一次舞的规矩一直坚持到最后。

在特别班,生产纺纱有相当高的指标要完成,休息的时间就玩,一天一天的时间过得也很快,转眼就到了春耕季节。

44 · 02 龙儿寺开荒

在“特别班”的事情很多,只写一节,眉目不清,我就分两节来写。多写一节龙儿寺开荒。

春天来了,要特别班的男同志去离延安几十里路的一个叫做龙儿寺的地方开荒。

几十个男同志去了。在那儿已经打好了十来面窑。每人自带背包,到了那儿可以找到足够数量的谷草,厚厚地铺在地上,一面窑十来个人睡下一点也不觉得挤。第一天去把住的地方安顿好,讲了讲开荒的要领和对大家的要求,第二天就上山,一天空闲的时间也没有给。

这次开荒是从刨烧开始的。什么叫“刨烧”呢?就是先把山上的树连根刨掉,再把挖出来的东西烧掉,当做肥料。但是那一次我们挖出的东西并没有烧掉。怎么处理的,我下面再说。刨烧用的工具是镢头,刨烧是劳动量很大的劳动,因为要求把每棵树的根都挖出来。我们一到龙儿寺山上,就看到满山都是树,而且正是野杏树、丁香树、野蔷薇(又叫黄刺梅)等开花季节,真是好看极了。可是人们为了种粮食,决定把一大片树林统统毁掉,要连根挖掉。在挖的时候,就不说好看不好看的话,只说好挖不好挖。别看杏树长得很高,它的根并不深,挖起来很容易。有一种叫做狼牙刺的,矮矮的树身,开黄色的小花。它的根却很深,很不好挖。不论怎么难挖,但是一棵一棵的树都给我们挖下来了。

“刨烧”这个过程把树连根挖起,也还没有完,不能让这些树留在地里。那时候这些树很多,又很湿,不好烧,就要把它扔掉。老百姓一家一户开很少一些地,挖出来树不会多,大概是砍成一枝一枝的作为木柴存放起来。我们要挖掉几百亩烧林,就只有把它扔掉,办法是许多人把树卷起来,最后卷成一大卷,一直推到山边,然后一声“推”,把大卷树枝推到山沟里。把山上打扫干净,然后开始下一步的劳动,就是开荒。

一大片美丽的灌木林,就在我们手里变成了光秃秃的土地。

在龙儿寺开荒,我们成了百分之百的劳动者,而且每天的生活安排得很特别——但我想这也许是老百姓的一般做法:天刚亮,不到五点半起身(不好说起床,因为没有床),不洗脸不刷牙,听哨音在几分钟内集中上山。六点开始劳动两小时,八点下山吃饭。吃的是小米饭。吃完就上山,从九点又劳动四小时。一时下山,吃第二顿饭,也是干饭。吃完干饭又上山再劳动四小时。回来吃晚饭。吃的是稀饭。吃罢稀饭,大家洗脸刷牙,就到地铺上休息。一天紧张地劳动十多个小时,上三次山,路上带在田边休息一下共三小时,吃三顿饭一个半小时,晚饭后洗脸刷牙半小时,还有几小时可休息,中午一个半小时,晚间七个半小时。一天劳动下来也累得实在不行,什么事都不想干,躺下马上可以熟睡。几小时的睡眠质量非常之好。在这次劳动中,我过得很愉快,只是的确生活过分单调了些。人就完全成了一部劳动机器。

这样的生活,我一生只过过这样几个星期。

我从来不怕苦,手上打了泡,劳动起来有点痛,有痛算不了什么,后来长了茧子,更加不痛了。最初劳动的业绩很不像样。陕北农民一人一天可以刨半亩以上,头一两天下来我不知道有没有完成一两分,以后熟练了有了进步,但是还是差得很远。

刨烧完了,翻地这一程序就相对轻松得多了。“刨烧”的过程中有一些地事实上也已经翻了过来,但大部分土地还没

有翻过来,所以这第二步劳动还是翻那些还没有翻过的地。在这里也有一点有趣的事可以说一说。那就是有一种草,长得很密,根缠在一起,也相当深,一镢头下去,会反弹出来。它的名字叫冬青草。我们就谐音称之为“重庆草”,来指它特别顽固。对付这种草,常常采取两个人两把镢头同时下去,才把它翻了过来。

大约这么干了二十多天,任务完成了,播种的任务留给别人来干了。播种的技术性更强,也用不了这么多的劳动力。

任务完成之后就选举劳动英雄。在学员中,我列入了候选名单,但在讨论名单时说,就劳动态度、劳动中的积极性来说是完全够了,但是从体力、从技术上,也就是从劳动业绩来说,还够不上劳动英雄。因此在选举时我没有被选上。

我完全服气。每天的劳动业绩恐怕比不上当地干部的一半,当劳动英雄实在不够格。但是我被列入劳动英雄的候选名单心里就一直是乐滋滋的,一直引以为荣。

当选劳动英雄的人数不多,大概全是当地干部,他们不是学员。在“特别班”接受审查的清一色是国民党统治区(“大后方”)来的知识分子。这些陕北干部来特别班,有的是做审查工作的,有的是做行政工作——这一点前面已经写过了。到龙儿寺开荒时,几乎全体都到了,同我们这些审查对象一起劳动,而且干得很欢,也真有成效。同他们一起劳动,我们在劳动力方面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而他们平等地同我们一起劳动,也使我们这些“特务嫌疑”分子没有一点被强制劳动的感觉。

开过荒又回到桥儿沟，过那样单调的日子。从行政学院开始，审查工作一直是背靠背进行的，从来不找学员谈话。我们只是劳动，我还自己抽空读书，玩的时候就玩。每星期还是照样跳舞。

转眼夏天到了，我们又组成了锄草队。锄草的劳动比刨烧开荒轻得多，只是天太热。生活的规律同开荒差不多，只是起得更早，中午歇息的时间更长。同开荒大不相同的是，这次女同志也去了。她们并不参加锄草，而是做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出了一版地头的黑板报，在锄草休息的时候，她们演唱一些歌曲。还有谁的衣服破了，她们拿去补一补。我记得陈楚平就是来到龙儿寺的一位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编一些黑板报真是大材小用。就是只来了几个女同志，我们干农业劳动的这些男同志的单调生活就再也不存在了。当时我就概括出女同志能够起重要作用的道理。

在锄草期间，我嫌鞋里进土不舒服，有一天我就光脚在地里。这样做的时间是上午八点，光了脚很舒服，后来地温上升起来了，脚底越来越烫，最后达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可是鞋子已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不能去找，真是“寸土难站”。就觉得自己的脚丫子快烤熟了，最后熬到下工穿上了鞋，真是说不出的舒服。这次我对鞋的重要意义有了深刻的体会：不仅防湿、防高低不平，还可以防烫、防冷（防冷这一点，早就懂得）。

锄草完了，大概是接受上一次选举劳动英雄时选出的劳动英雄清一色都是特别班工作人员，而没有学员，未能对学员

起足够的鼓励作用,这次没有选举劳动英雄,而是选举“锄草模范”。这个时候,我不但是候选人,而且当选了。这次学员中当选成“锄草模范”的就有不少人。

收获季节我就不在“特别班”了,甄别完成,分配到延安大学财经系工作。

44·03 从“特别班”到延安大学

没有想到经过抢救和甄别,我没有回到西北局,而是分配到延安大学。

原来我还在“特别班”的时候,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做了个决定:把行政学院、自然科学学院、鲁迅文学艺术院合并建立一个新的“延安大学”。边区政府任命周扬担任延安大学校长,张如心担任副校长。延安大学举行开学仪式,毛泽东在开学那天讲话,指示延安大学应为抗战和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服务等等,都是1944年4~5月间的事情。开学那天的大会举行的地点,是在南门外行政学院那个我很熟悉的地方开的。但开学那天,我大概正在龙儿寺“刨烧”开荒。那些天,大家成天不看一个字。因此,虽然关于重新建立延安大学的许多消息在《解放日报》上都有报道,但是在“特别班”那样特别的环境中,发生在本单位的头等大事,大家竟一无所闻。以后也没有人说起。直到我被分配到延安大学工作的时候,才知道原先是独立的、事实上是处理边区系统抢救遗留问题的特殊机构的行政学院,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被分配到延安大学工作,意味着对我进行的审查这件事已经结束,以后我可以正常地工作和学习了。从抢救开始之后我不能正常工作和学习的时间,算起来有两年左右,比起1966年那次“文化大革命”来说短得多,而且我自己感觉生活也还过得不错。这一点前面我已经描述了不少。现在我讲到自己恢复正常工作时,再总结几句。

我算了一下自己到延安大学工作的时间,应该是在夏后。因为我是在“特别班”第二次上山锄草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才离开桥儿沟,去延安大学报到的。

延安大学有很长的历史,1944年的这次延安大学成立,大概是第二次。以前我曾经到过一次延安大学的,是在北门外的。1941年我为了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工作,去过一次。那时的延安大学基本上是陕北公学型的学校,它在延安的影响也不很大。而1944年决定把行政学院、自然科学学院、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合并重新建立的这个延安大学,它的性质,同以前的不一样。1944年重新建立的延安大学有了三个学院,其中自然科学学院和鲁迅艺术学院比较早就是专科学校性质的,而第三个学院——行政学院,原先是一个甄别被抢救的干部的机构,现在也要改造成为专科学校,则是一件要从头做起的事情。

44·04 延安大学财经系

我到延大分配给我的工作是在财经系。延大行政学院有

三个系,除财经系之外,还有教育系和行政系。我到财经系工作的时候,财经系的学生已经到了一批,但还在陆续到校。系主任已经确定是经济学家姜君辰,他也才刚刚到校。教材还等着编,教员也缺。

要我担任的工作是财经系秘书,帮助姜君辰处理全系的工作。姜君辰这个名字我听说过。他是陈翰笙主持的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成员,和薛暮桥、钱俊瑞等在一起工作。我看过他写的文章。同时还要我负责管系内惟一的一个研究室,它的主要工作是编教材。这个研究室分三个组:工农业生产组,组长由我兼任;商业组组长由陈锡章担任;财政金融组组长由陈应中担任。陈应中是广东人,年纪比我大好多岁,建国后长期在广州,担任广东省统计局局长。陈锡章是江浙人,建国后担任上海市计委主任多年。每个组有五六个工作人员。在我直接管的这个工农业生产组里,男同志中有一位李力行,他是吉林人。还有一位是周龙雏,我不记得他是什么地方人。还有一位名字叫吕潼,他是这几个人中最年轻的。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日本投降后这三个人都到了长春,在东北师范大学工作。以后我都没有同他们在一起工作过。只有一位杨进琳(现改名杨晋),在延安大学去东北的途中组织调他到北平解放报社,又在我管的报社研究室里工作。后来长期在国家航天部工作。前年还到我家聚了一下。组内两位女同志,一位姓冉,后来是国家计委吴俊杨的夫人,还有一位姓高,一直没有听到她的消息。我不直接管的那两个组,只是照管一下,情况记得的就更少了。这两个小组中的工作人员,我只记得有

江剑秋、金禾和后来成为陈锡章夫人的潘萍三个人。

我们那个研究室的三个窑洞，在延大财经系的几排窑洞中是最高的。三个组的男同志，每组各占一个，人都住里面，它也是各组开会活动的地方。女同志不分组，她们合住在一个窑洞里。

财经系的主体是“班”。学生们住的窑洞在比我们研究室低一层的地方，上课是在窑洞前的那块地上露天进行。老师站着，学生坐自己做的马扎上。班主任是谁，我记不得了。

我们研究室的任務主要是编财经系自己用的教材。教材的内容是系统介绍陕甘宁边区经济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它的发展方向与发展措施、政策的科学基础。这样的教材讲义内容和体系结构都是崭新的。因此要作研究，所以叫研究室。教材写起来相当吃力，但是我们还是尝试着这么做。我兼管的生产组的同志，在我的指导下编写多种关于农业和工业生产的教材。其他两个组的同志编教材的情况，我就说不具体了。

(七) 1945 年
前九个月

45 · 01 一个很特别的消费合作社

在我们财经系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有趣的事情要说一说。

行政学院有一个专管杀羊的人,住在山下两间房子里。那两间房也是杀羊的作坊,他每天杀一两只羊。延安人很怪,只吃羊肉不吃羊肝、羊肺、羊心、羊肠,把它们全扔给狗吃。记不清楚我们这个研究室的谁提出,我们的伙食很少有荤菜,经常是“酱油煮土豆汤”,何不与狗争食,增加自己的营养,改善自己的生活。也不记得是谁提议,组织一个“消费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研究室全体参加,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它的工作成员,这几个工作人员的分工是:一个人下山把羊的心肝肺取来(研究的结果羊肠决定放弃——这当然不是照顾狗的利益,而是

吃起来太费时间,要吃羊肠,就要把羊肠里的脏东西洗干净。羊肠很长,也比较细,不是有一句“羊肠小道”吗?洗起来很费时间,只得忍痛放弃);一个人去伙房拣还能燃烧的煤核;一个人生火;一个人掌勺。规定中午下课的钟声一响,各人用飞快的速度把原料、燃料备齐,把火生起来,由掌勺的人把菜做好,同原来大伙房送来的饭菜一起进行“消费”。

在这个合作社中,我分工拣煤核,干的是粗活。分工做菜的是陈应中,那是技术活。他的确会做,做得快,做得好吃,他还自己掏钱去买油盐酱醋。他是我们这个合作社当然的社主任,只是没有进行过选举而已。

我这个干粗活的,对合作社的贡献小,但是我的饭量一点也不比干技术活的陈应中小。那时的延安晚上要用植物油灯照明,我是一个爱看书的人,但从不抱怨灯太暗,只抱怨自己眼睛不好。当时有一个说法,羊肝有明目的功用。陈应中就把吃不完的羊肝烤干,做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弄到一个玻璃瓶装起来,一天吃若干块。我坚持吃了几瓶他制作的“眼药”,也许有一点心理作用,似乎眼睛“明”了一点。而第二年我到张家口和北平,在电灯下,不吃羊肝,目也“明”了。

十多年前,广东省统计局要给陈应中过九十岁生日,我就写了一篇《介绍一个消费合作社》寄给他们。

财经系没有参加合作社的同志,有人也参加我们的会餐,我们也很欢迎他们品尝我们合作社的产品。

45 · 02 五棍同乐

1945年2月13日是乙酉年大年初一,12日就是年三十。我们延大财经系研究室工农业生产组的五个男同志(这五个人的情况前面已经写了一些)商量如何过好这个年。由于这五个人都是在原单位经过抢救后来到行政学院,再经过甄别分配到延安大学来工作的,都曾经有过一个自己不痛快的事情。现在这个不痛快的事已经结束,想在这个中国人的传统节日里自己乐一乐,庆贺一下。可是当时这五个人都是没有“爱人”的光棍,不能和“爱人”一起过节(大家知道在延安不论已婚未婚都叫爱人)。光棍只能和光棍聚在一起。

于是那一天,按照中国人的老习惯,在除夕晚上我们五个人在一起包饺子、吃饺子。

那天晚上,我们在包饺子的时候,触景生情,就有人提出写春联的事。大家七嘴八舌凑成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三十晚上包饺子五棍同乐”,下联是“总有一天煮肉枣大家联欢”。延安红枣的质量很好。青年们结婚的时候,买几斤红枣,割一斤肥肉,煮在一起,很好吃。请人吃煮肉枣,相当于今天的请吃喜糖。

那一天写对联的事是怎么提出来的?怎么凑成这两句?何以红纸会是现成的?谁写了这二十二个大字?这五个人各人都有什么表现?除了那些大字不是我写的之外,其他我完全不记得了。所有问题我都回答不出来。只记得大家都很起

劲,写好后,立即贴到我们那个窑洞门口。

45·03 第一次享受老人权

我在延大财经系时,在生活上有一个“小鬼”照顾。“小鬼”是红军对年纪很小的勤务兵的爱称,这样的称呼就带到延安的机关和学校来了。春节小鬼们放假,本来由小鬼到开水房打水的事,就只好我自己来做。我提了把水壶,走到了开水房,很多人在排队,我就排在最后。忽然听见开水房管灌水的人,指着我大声喊:闪开!闪开!让这个老汉先打!开头我懵了一下,我怎么成了老汉了。转念一想,我明白了。我这个人胡须长得浓,也长得快。1936年7月我正好满21岁。这时候我大学毕业,跟着大家去照相馆,穿着博士服,戴着博士帽(其实连硕士都不是,只是一个小小的学士)去照相,因为没有理发(那时我从来只在理发时由理发师傅给我刮脸,自己从来不刮胡子),加上那时我态度严肃,看上去就像一个四十多岁的博士。这张照片我现在还保存着。

在延安5年多,我自己一次也没有刮过胡子,而且连一面镜子都没有,自己的尊容本人从不关心,也真不知道。水房里的同志的那一声喊叫,可以说是我的一面镜子,使我知道自己模样如何。

在水房前排长队的人们,听到那一声喊叫后,果真给我这“老汉”让出了一条路。我就打了一壶水,一面暗笑,一面大摇大摆地提上那壶水回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享受老人权。

是年我老汉尚未至 30 岁。

45 · 04 给全校上大课讲自然发展史

记不清在财经系工作了几个月,组织把我调到校部的教务科当副科长。科长是林迪生,比我年长好多岁,建国后长期担任西北大学的校长(而且“特别班”陈楚平同他结了婚)。延安大学所属鲁迅文学艺术院和自然科学学院也都设立了教务科,鲁艺的科长是王抗(现在改名为王康),副科长是王宗一,自然科学学院的教务科长的名字叫王甲刚。真的很巧,这三个人都姓王,他们三个人就算是我的下级(王宗一年纪比我小,但是参加革命并不比我晚。1936 他十五六岁就参加了党,文字写得不错。在“文革”前他是中宣部宣传处的处长,“文革”的时候,造反派要我们这些黑帮唱嚎歌,歌词的内容大概是“我是黑帮,我是黑帮,我有罪,我有罪”等等。要自己唱这样的歌当然是对本人的侮辱,就在那一天王宗一受不了这种侮辱,上吊自杀了)。

关于教务科的工作有林迪生在管,不需要我做很多工作。后来我才明白,把我调到教务科,其实为的是要我给延大全校上大课。

在我担任教务科科长后有一天,周扬校长把我找去,张如心副校长也在座,周扬说:“毛主席最近把我找去,提出延大应该开一门大课,这门大课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自然发

展史’，第二部分是‘社会发展史’，第三部分是‘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理论问题’。”周扬对我说：“毛主席讲，‘自然发展史’这门课可以就由于光远来讲，他懂得自然辩证法，现在他不就在延安大学吗。”周扬又接着对我讲：“你去准备一下，你第一个讲，很快就会开课。”周扬对张如心说：“‘社会发展史’由你讲，‘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理论问题’就由我自己讲吧。”本来规定三个学院所有的人都听，不过，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在桥儿沟，自然科学学院已经不在杜甫川，搬到了北门外，离行政学院的校部就比较远，而且校部也没有这么大的教室，容不下这么多人，所以这两个学院是派代表来听，听了回去传达。

延大要求很快落实毛泽东指示，于是我开始准备。没过多久就从“太阳是一个大火球”开讲，一直讲到“从猿到人”。这门大课，行政学院的全体师生都听，听的人也很感兴趣。我讲的虽然都只是一些常识，但是大多数人不熟悉，大家听起来比较新鲜。又因为自然发展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基础，大家又觉得很重要。

我在讲这门大课的时候，周扬和张如心每次都听。后来周扬和张如心讲课时我也是每次都听。在听他们讲课的时候，我有个印象，周扬口才很好，讲的内容也比较深刻。张如心的资格很老，上课多少有点儿教条的味道。

这次演讲后我还编出一本讲义，油印了出来。它的内容建国初期在《中国青年》上陆续发表。

当然在当时延安参考书缺乏的条件下，备课的时间又很

仓促,听众文化水平又参差不齐,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当时所讲的内容就太陈旧和太不充分了。

我在延安大学一直待到日本投降,在1945年11月同延安大学的队伍一起离开延安。

45·05 “于光远吆!在延安时就是我的老对头”

1945年10月26日到28日我还在延安大学时,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发表陈伯达的长文:《近代中国地租概论》。自从1942年到西北局边区问题研究室工作期间,我一直研究土地问题,对这样的文章比较注意。每天都花一点时间去看,一连看了三天。看后,我发现这篇文章有不少错误。论点我倒没有想提什么意见,不同的作者会有自己的观点,而是有一些知识性的错误,比如他就没有读懂《资本论》中马克思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地租率。于是我就写了一封长信给他,列举文章中的错误。信发出后不久就接到他的回信,他约我到杨家岭他住的窑洞里见面。对这次见面,我记忆得很清楚。见面后我没有再说什么,因为要说的都写在信上了,等他先讲。他是这么说的:“我是个小学生,我对《资本论》没有很好学过,我写的东西有错,你指出了我的错误,我非常感谢。这是对我极大的帮助,我终生难忘……”我几乎逐字逐句地记得他那天对我说的这些话。那时我刚过三十岁生日不久,他比我要大十多岁,是个成名的学者,他那席话我听了觉得很习惯。因为按照我的性格,不喜欢听那种空洞的话,而宁肯和

他作实质性的讨论。那一次我提了几个我在研究土地问题时的观点,试图引起讨论,但他不肯发表意见。我感到那次谈话对我来说没有收获。但是作为一个长者,他能够这样“谦虚”地对待我这样的一个人,基本上我还是高兴的。

过后不久,1945年11月下旬我从延安出发步行到张家口。1946年1月从张家口到了北平,在北平办《解放》三日刊。1946年6月这张党中央决定办的报纸被国民党封闭,报纸工作人员被押送出北平,于是我又经过张家口,骑快马回延安,知道陈伯达写完了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并出了一本小册子。在得到这本小册子后,我急急忙忙地把小册子中我提过意见的地方找出来看。令我十分惊讶的是,他竟一个字也没有改。我发现他这个人很假。

全国解放后,陈伯达这本书在北京又出了一版,蒙他签了名,盖了章,赠送了一本给我。在这一版中,在我写信指出书中是错误的、他对我表示感谢的地方仍旧一字未改。我觉得他这个人不仅虚伪,而且毫无“追求真理”的精神。三十年代,他有一本小册子,记得书名就叫《真理的追求》,读这本书时我觉得他写得很好。可是第一次同他打交道,就使我认识到他是一个言行不一的人。

没有想到在这件事发生的20年之后,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的1967年,中国科学院的红卫兵到中宣部找到我这个“走资派”,要我交代反动思想。这时候陈伯达是文革小组的组长,是“文革”中红得不能再红的人。来人对我说:“你在延安的时候就是伯达同志的死对头。”问我“知罪不知罪”,

还要我交代“同伯达同志”作对的事实和当时的反动思想。他那么一说,我心里就明白了。因为在延安的时候,我同他就只有这么一次接触。不过当我知道红卫兵并没有掌握到任何具体材料,没有法子逼我交代什么时,我就很容易地把这次审问“蒙混”过去了。

原来 1965 年,有一天陈伯达找张劲夫去谈话,陈那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还兼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就是以这个身份把张找去的。他对张说,列宁在 20 年代曾经讲了这样一个公式:“共产主义 = 苏维埃政权 + 全国电气化”,他主张把“气”字改为“子”字,以适应 60 年代世界科技的发展水平。要张把他的意见带到国家科委党组去,请党组讨论一下他的看法。这时,张和我兼任科委党组成员。在党组会上讨论时,我发表意见说,列宁这个公式的意思无非是说共产主义的实现,一要靠最先进的政权;二要靠最先进的生产力。在 20 年代,知道的最先进的生产力是全国电气化,现在变了,当然可以改,但改为“全国电子化”不完全,因为还有新能源、新材料等等。张劲夫当时把我的意见记录下来了。我以为事情就到这里为止了。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在这之后不很久就开始了。张劲夫参加党组会后向陈伯达汇报我的意见时,陈讲了这么一句话:“于光远吆,在延安就是我的老对头吆!”被中国科学院的红卫兵听见了,这就是红卫兵到中宣部审问我的来由(不过红卫兵又把“老对头”改为“死对头”,升了一级)。1972 年我被“解放”后,从宁夏中宣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一次在路上遇见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我的清华的同学王天眷。

一见面王对我说：“你的日子现在该过得好多了吧？”我不明白他的意思，问他此话从何说起。他就说：“陈伯达说你是他的老对头，现在陈伯达不是倒台了吗？”我奇怪他是怎么知道此事的。他告诉我，这件事在中国科学院出的“小报”上登过，他是看了小报才知道的。

这样才明白，原来 1945 年陈伯达同我第一次见面时讲的那些话，其他的话都是假的，惟有一点是完全真实的，那就是我对他的那个批评，他“终生难忘”。

话又说回来了，在“文革”中陈伯达做过文革小组组长，掌握了很大的权力，但他并没有给我下什么毒手。我这个他的“延安时候的老对头”，只是受到一次审问，没有酿成什么迫害。这一句话我觉得还是应该讲的，以示公正。



抗議共匪封網暴行

請用代理服務器連接下載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